



彻底的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

我国人民在人民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诬蔑社会主义制度,说它是抹煞个人,消灭个性,但事实上,正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为广大劳动人民开辟个人的全面发展的广阔道路,正是社会主义的集体利益能够充分保障广大劳动人民的个人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积极地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的原因。中国人民早已明确地看出,只有从人民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中才能实现真正的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在集体主义的基础上的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才是有价值的,有利于人民的。中国许许多多知识分子觉悟到资产阶级个性论的反动性质,走向同工农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他们愈是忠诚地为人民服务,就愈感到自己个人的充实和个人前途的远大,愈能够充分发展自己的才能和智慧。

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使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感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是能够支配自己命运的人,是具有庄严的独立的人格的人。当人们把自己的一份力量加入在几万人一起进行着的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事业中时,就真正感觉到生活的崇高意义和对生活的坚强信心。集体主义使人自觉地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公共利益,从而摆脱了剥削阶级认为是天性的自私自利观念。我们的道德观念是和这种自私自利观念根本对立的。毛主席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① 我们的这种高尚的道德是资产

^① 《纪念白求恩》,《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0页。



阶级个人主义者根本不能设想的。

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像我们上面对胡适思想的分析所表明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我国现在社会条件下所起的作用,就是驱使人们去追求同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相对抗的个人利益,去发展同社会主义的集体事业相对抗的个性。这是极端卑鄙的,极端可耻的“人格”和“个性”。如果听任这种思想的影响发展,就是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破坏祖国的利益,也就是破坏了劳动人民自己的利益。

二

个人主义是胡适的人生观思想的主体。胡适所提出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是和他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密切结合着的。

胡适在1923年所作的《科学与人生观序》中提出了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他给吴稚晖的一套“理论”捧场,宣称,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新人生观”;还说:“这种人生观是建筑在二三百年的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我们也许可以给他加上‘科学的人生观’的尊号。但为避免无谓的争论起见,我主张叫他做‘自然主义的人生观’。”^①

吴稚晖是近代知识分子中产生的最下贱最不要脸的一个典型人物。他最早在1903年就在上海的《苏报》案中向清朝官员告密,出卖了当时的革命家邹容和章太炎^②。后来他到欧洲摇身一变而

^① 《胡适文存二集》第2卷,第27页。

^② 吴稚晖的这件丑事是章太炎的文章揭发的,但后来有人认为不是事实。



为“无政府主义者”，说是主张在三千年后实行“无政府”。1925年后，他是坚决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并且成为蒋介石背叛革命的得力策士，以后就一直是蒋家王朝餐桌下啃骨头的一条老狗，直到在全国解放后死在台湾。这个吴稚晖为了粉饰他的寡廉鲜耻的生活，发明了一套所谓宇宙观和人生观。按照他的说法，一切事物都是“活物”，人同苍蝇，同毛厕里的石头都是一样的。既可以说，连毛厕里的石头也同人一样有感觉：“万物的感觉是差等的，不是同等的；差等乃是状况的异同，不是程度的高下”；但也可以说，人同石头一样并没有什么感觉：“毛厕里的石头呀，玫瑰树呀，苍蝇呀，人呀，何尝有什么感觉，什么心理，什么灵魂，止质与力之构造及反应，各各不同罢了”。总之，人同其他一切生物和一切无生物并无两样。因此，世界上有了某一个人就同世界上有了一个苍蝇或一块石头一样。吴稚晖说：“所谓人生，便是用手用脑的一种动物，轮到‘宇宙大剧场’的第亿垓八京六兆五万七千幕，正在那里出台演唱。请作如是观，便叫做人生观。”那么到底应当如何生活呢？答复是，既然“出台演唱”了，就“认真”地唱一场吧。他又补充说：“我却并不以为止有两手动物的新剧该当唱得认真。便是什么木石戏，鹿豕戏，都该一样的认真。我与读者先生们，都不是个木石，都不是个鹿豕，止是个两只手的人，所以我们商量着这幕戏，我们也应当唱得精彩，如是罢了。”^①

这是什么人生观？这是对人的糟蹋，对人生的侮辱。再看看以下两段从吴稚晖嘴巴里吐出来的话，更可表明他所说的人生观的实际意义。“用清水一百一十磅，胶质六十磅，蛋白质四磅三两，纤维质四磅五两，油质十二两，会逢其适，凑合而成一百四十七磅之

① 《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



我。即以我之名义，盲从此物理世界之规则，随便混闹一阵，闹到如何地步，即以我之清水油胶等质，各自分离而后止”^①。——这是他在辛亥革命前(1909年)的自白。“……那么世界一切都是空的，还有什么留恋呢？还要干什么呢？是的，本来是空的，但是不干又做什么？我们干好像是做戏，做戏总要努力，就是瞎闹也要闹一回，人生就是这样”^②。——这样无耻的话是他在1926年说的。

吴稚晖这样的角色一贯地抱着这样的人生观当然是很恰当的。这个活得像粪坑里的苍蝇一样卑贱的人同这种人生观是完全配得上的。跟这种人生观比较起来，某些悲观厌世的思想甚至还要高尚得多。因为某些悲观厌世的人还是因为自己活得无聊而痛苦，但吴稚晖的这种黑暗的人生观却是向人鼓吹：像畜牲一样地活下去吧，人或者不过是这么回事，去当扒手骗子吧，去当杀人犯吧，去卖友求荣吧，去干任何伤天害理的事吧，去“认真”地“努力”地“混闹”吧！人生就该是如此！吴稚晖自称是“人欲横流的人生观”，我们可以同意这个称呼。这种黑暗的人生观在旧社会中对于一些看不清人生出路的知识分子会起什么恶毒的影响是可以想见的。

1923年胡适的一伙人以丁文江为首向张君勱进行了一场关于人生观问题的论战。他们自称为“科学和玄学”之争。其实自称代表科学的丁文江在这场论战中是露骨地宣扬了腐朽的主观唯心主义。吴稚晖就在这时写了一篇真是所谓像裹脚布一样又臭又长的叫做《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的文章。胡适说全靠这篇文章才解答了“科学的人生观”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吴稚晖在这篇文章里恭维胡适是“最近的中国思潮的代表者”。到了1928年，吴

① 《与友人论物理世界及不可思议书》。

② 《科学与人生》。



稚晖已在反共活动中大显身手时，胡适也把吴稚晖恭维做“思想界里一个打先锋的少年”。“物以类聚”，所有的粪坑里的石块都发散着同样的臭味，并互相欣赏，这是一定的。

胡适全盘接受了吴稚晖的说法，并竭力给它加上“唯物的”、“科学的”等等装潢。其实吴稚晖的全套说法里哪里有什么唯物论的气味？吴稚晖说，他的宇宙观可以叫做“漆黑一团的宇宙观”，那就是说，当宇宙万有未生之先，只是混沌沌沌的“漆黑一团”。从“漆黑一团”怎样产生万物？他说：“当漆黑一团之际，自然先有意志，才起变动”。所以照他说来，这“漆黑一团”是“有生命的”，从此产生出来的万物也都是“有生命的”，所以他说，他赞成柏格森的“宇宙为一大生命”之说。这是明明白白的唯心主义，是设想了一种神秘的不可知的意志来作为万物生长和发展的推动力。由这种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的宇宙观，他才推论出了人和其他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无非是“漆黑一团”的子孙，“乃是状况的异同，不是程度的高下”等等荒谬的说法，从而发挥了他的“人欲横流的人生观”。

胡适把他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概括成十条说明^①，其中有些说法很易使人迷惑，甚至使人以为胡适在这里说了一点唯物论。十条中有这么一条：“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正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但这并不表明胡适主张无神论的世界观。资产阶级本来不需要排斥自然科学，它是要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自然科学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可以承认，一般自然现象都能用自然科学知识来解释，并不是每一个自然现象的运行变迁都由所谓“上帝”的意志来决定。承认这一点，并不妨害它从根本上给自然现象

^① 《胡适文存二集》第2卷，第26页。



和自然科学知识以唯心主义的解释,让宗教仍有充分的立脚点。胡适这一帮人都崇拜自然科学,但丁文江把自然科学知识和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相结合,而吴稚晖如前所述是用类似客观唯心主义的说法来给自然现象戴上神秘主义的帽子。胡适对这两者都很赞成。所以上引的胡适的说法和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不相干的。

胡适完全懂得,在现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如果在所谓“宇宙论”上公然提出神啊,上帝啊,意志决定一切啊等等观念是很不灵敏的,所以他常用“存而不论”的方法闪避开去。他的主要任务是否认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在社会观历史观方面给唯心主义敞开大门。所以在他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中至少有四条是直接以混同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为目的的。有一条是:“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这完全是复述吴稚晖的话。还有三条是:“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演进的原因”。“根据于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学,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因的”。“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这三条虽然用了好多“科学”的字眼,但其实这些条文的字面已经表明它们是反科学,反唯物主义的。这里说得很清楚,是要用生物学的知识来解释种种社会现象(包括社会意识形态),而在生物学不够用的时候,再加上资产阶级的所谓“社会学”。资产阶级的各派社会学都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人类社会的演进的原因”和“道德礼教变迁的原因”的。资产阶级社会学不是要去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是否认和蒙蔽客观规律。所以这种社会学完全可以做“自然主义的人生观”的附属物。

所谓人生观,就是指对于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



么等问题的回答。人作为自然界中的一种生物，生命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本来无所谓意义，无所谓目的。但是人不仅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生物。人能够从事有目的的劳动生产，过着社会生活，并且在社会生活中发展自己的主观意识。因此，人才会提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而不同的人对这类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答案，就形成了不同的所谓人生观。

马克思主义决不企图脱离社会阶级关系而为一切人制定一种共同适用的人生观，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事实上，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的人对于自己的生活采取着不同的态度和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重要的是去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不同的态度和观点。马克思主义深刻地分析了社会的阶级关系，因而证明了在阶级社会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和互相对立的人生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它们在根本上是各个不同的和互相对立的阶级、阶层的立场和它们的利益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根据客观的、科学的，而不是主观的、任意的标准来评价各种不同的人生观，这就是，根据历史发展规律而看出在各个具体历史条件下各个阶级、阶层所处的地位，从而指明，这种人生观是先进的，那种人生观是反动的。

马克思主义用自然和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来指导现代以无产阶级为首的人民大众，使他们能够完全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奋斗的目标，并且能够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使人的追求进步的努力有了科学的依据。人们依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就能够对于生活采取积极的、乐观的态度。这种态度是腐朽没落的阶级从他们的腐朽的、没落的世界观出发所不能设想的。

所以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科学地解决被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弄



得混乱不堪的人生观问题。

堕落的资产阶级逃到了自然主义、神秘主义的防空洞里，就是因为他们不敢正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不敢正视各种不同的人生观的区别的阶级实质。他们想用人不过是自然界中的一种动物这种说法来否定人生的意义，而把人引导到在社会生活中盲目的、主观主义的路上去，也就必然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卑鄙的路上去。

胡适在1928年和1929年写过两段总题为《人生有何意义》的短文。其一说：“生命本身不过是一件生物学的事实，有什么意义可说？生一个人与一只猫、一只狗有什么分别？”“总之，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他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另一短文说：“人生固然不过一梦。但一生只有这一场做梦的机会，岂可不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①——这和前面所指出的吴稚暉的那些说法完全是一个调子，同样是反映着没落的反动集团自己的绝望和疯狂的心理，也表现了它想把人民的思想引诱到最肮脏的泥坑中去的罪恶企图。

三

胡适有时又着重地说人对于社会的责任，好像他既不是讲个人主义，也不是讲自然主义。但实际上当他发这种议论时，他仍旧是在发挥他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和他的自然主义人生观。

胡适对自然主义人生观所作的十条说明中第十条说：“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

^① 《胡适文存三集》，第1143、1144页。



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①——胡适用这种说法来使人一下子捉摸不定他的真义，这种说法是有很大的欺骗性的。胡适在许多地方发挥了这种说法，我们需要进一步来做一些分析。

胡适向读者说，一个人的任何行为，都会因为偶然的会而在整个社会中发生无穷无尽的影响，简直不可思议。他举出了好些例：一个瞎子在弹三弦，不料被一个诗人听见，这个诗人就写了首好诗，流传万世；一个穷人病死了，尸首烂在街上，不料被一个王太子看见，王太子心中起了一念，由此就创造了佛教，等等，等等^②。

那么怎么样呢？由此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胡适得意地说，从这里就可以建立一种了不起的人生哲学，叫做什么“社会的不朽论”。胡适说：“我不信灵魂不朽之说，也不信天堂地狱之说，故我说这个小我是会死灭的。死灭是一切生物的普遍现象，不足怕，也不足惜。但个人自有他的不死不灭的部分。他的一切作为，一切功德罪恶，一切语言行事，无论大小，无论善恶，无论是非，都在那大我上留下不能磨灭的结果和影响。他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他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他也许‘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善亦不朽，恶亦不朽；功盖万世固然不朽，种一担谷子也可以不朽，喝一杯酒，吐一口痰也可以不朽。”^③

① 《胡适文存二集》第2卷，第27页。

② 同上书，第4卷，第114页。

③ 《论学近著》，第636页。



那么又怎样呢？由此又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胡适板着脸说，这样就使人知道要对社会负责任了，“说一句话而不敢忘这句话的社会影响，走一步路而不敢忘这步路的社会影响。这才是对于大我负责任。能如此做，便是道德，便是宗教。”^①——上面所说胡适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的第十条也就是由此而来的。

胡适的这套说法的反科学性和反动性，一方面在于，他是用绝对的偶然论来否认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规律性，从而极度夸张个人的作用，宣扬盲目的主观主义。另一方面又在于，他用所谓“大我”的说法来否认社会阶级的区别，好像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都属于同一个“大我”。

胡适关于万事万物都相互影响的说法同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显然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因为在胡适看来，只有纷然杂陈的无数个别的事物，它们之间发生种种偶然的相互作用，因而是没有什么规律性的。从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来看自然界，可以得到一滴水也许可以影响全宇宙的荒谬结论，而用到社会生活上来，也就可以得到吐一口痰也许改变全人类的命运的荒谬结论。照胡适的说法，人在社会生活中一举一动会起什么影响，是完全不确定的，完全是由许多偶然的机会来决定的。那么唯一的结论只能是：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后果不能预知，因而对社会也就不能负任何责任，因而人生就只好像吴稚晖所说，“盲从此物理世界之规则，随便混闹一阵”。

社会历史发展的真实状况并不是这样的。在社会历史发展现象中虽然也有许多复杂的偶然的联系，但是社会历史过程有其根本的必然的规律，这种根本的规律性反映了现象的本质的联系，表现着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真实的基础。偶然性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不

^① 《论学近著》，第636页。



受到历史规律性的限制和支配的。只有掌握了历史规律性，人们才能知道如何有效地进行努力来推动历史的进步。我们决不把我们的努力建筑在偶然性上，决不设想，“也许”轻轻一反掌，结果就使天地变色。只有没落的反动阶级，因为他们的愿望在实际上根本违反客观的规律，才只好像赌徒一样盲目地挣扎，想依靠偶然性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美国的实用主义者詹姆士有一段被胡适多次引用的话，露骨地表明了这种依靠偶然性的赌徒心理。我们不妨也来引用一下。

据詹姆士说，上帝向世人发布了这样的号召：“我给你一个机会，请你加入这个世界。你知道我不担保这世界平安无事的。这个世界是一种真正冒险事业，危险很多，但是也许有最后的胜利。这是真正的社会互助的工作。你愿意跟来吗？你对你自己和那些旁的工人，有那么多信心来冒这个险么？”对于这个号召，詹姆士说，许多人是退缩了，因为“他们不敢相信机会”。但是，詹姆士表白他自己的态度：“我吗？我愿意承认这个世界是真正危险的，是须要冒险的；我决不退缩，我决不说‘我不干了’！”“不赌那会赢？我愿意赌，我就赌，我就大胆地赌去，只当我不会输的！”^①

凶恶，无赖，明知自己没有把握而要蛮干到底——这个50年前的美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口吻，简直是把美帝国主义的全部真面目活生生地表现了出来。请大家再读一下詹姆士的“上帝”所说的话，那岂不就是美帝国主义特务间谍机关的头子在招募党徒时说的话么？采取詹姆士所表示的态度的人，当然就是这些特务间谍机关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徒众。美帝国主义所需要的就是接受这种人生观的人，这种不顾一切的盲目的疯狂的强盗和赌棍。

^① 《胡适文存二集》第2卷，第255—256页。



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胡适向中国读者赞扬詹姆士说：“他这种态度，也有他的独到的精神”^①，而且胡适还把詹姆士的这种看法美其名曰“创造的人生观”。胡适又说：“这种人生观詹姆士称为‘改良主义’。这种人生观也不是悲观的厌世主义，也不是乐观的乐天主义，乃是一种创造的‘淑世主义’。”^②——这里所说的淑世主义和改良主义是同一个英文字的译名。于是我们又看到了胡适在人生观上的另一个主义。这个自称最反对谈“主义”的胡适，自己在人生观上就有那么多的“主义”！

胡适经常宣传的所谓一点一滴的进化的思想同他的人生观思想是有密切关系的，但此地不想全面地分析批判他的改良主义思想。此地只想指出，胡适所推荐的帝国主义的所谓改良主义人生观，不仅使用所谓一点一滴的进化来反对革命，而且反映了在没落过程中作着无望的挣扎的反动阶级的心理；他们当然不会乐观，因为自己也知道赌下去可能输得精光；但也不容许悲观，因为完全悲观，就不用去赌了，“不赌那会赢”？他们只能依靠机会，勉强鼓起信心，一步一步地走他们所不能预测的道路，所以他们把这种态度叫做“改良主义”。胡适解释他们的“淑世主义”，即“改良主义”的人生观说：“世界的拯拔不是不可能的，也不是我们笼着手，抬起头来就可以望得到的。世界的拯拔是可以思得到的，但是须要我们各人尽力做去。我们尽一分的力，世界的拯拔就赶早一分”^③。这里“世界”二字是应该读做“帝国主义世界”的。所以胡适的所谓“一点一滴的改良”其实乃是没落阶级的一种嘶喊；他们面对着决定他们死

① 《胡适文存二集》第2卷，第255页。

② 同上书，第107页。

③ 《胡适文存》第2卷，第107页。



亡的客观规律，妄想用“一点一滴”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用一笔一笔的赌注来赢回自己的本钱。

胡适对偶然性的崇拜的实质就是如此。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胡适的抹煞阶级区别的“大我”观念。

“小我”——个人是要死灭的，而“大我”——人类是永生的。这种说法，表面上看来，好像不过是毫无意义的废话，但是胡适提出这种说法，当然不是没有特殊用意的。我们知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每个阶级、每个社会制度都有发生和衰亡的历史，历史上的一切剥削阶级、一切剥削制度最后一定全部死灭。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当然不能不注意到这一点。胡适的“大我”永生的说法就是故意来模糊这个事实，从而达到资本主义制度永生的结论。

每一时代的人民群众的劳动生产和革命斗争世代地相继承，推动社会历史不断地向前进步，一直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任何时代的任何反动势力都不能扼杀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的伟大力量，即人民群众的力量，也就不能扼杀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如果我们说社会永生，那只能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的这种正确历史观正确地解决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只有同求进步的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个人的努力才是有意义的，才能够对社会历史发展起积极的作用。这种观点是同胡适的资产阶级腐朽观点正相对立的。

胡适使用他的含糊的、生物学的“大我”观念来使人相信，任何人的任何行为，不论善恶，都可能对社会历史起巨大影响，都可以永垂不朽。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个人的社会活动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有无影响和影响的久暂，首先决定于这种活动的性质。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吧。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的发展要靠每一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的努力。每个人的劳动都是对于



整个国家建设有贡献的，因此都是对于我们国家生活的发展起了作用的。如果有某一个人有意消极怠工，那固然可能对某一个车间、某一个合作社、某一单位工作计划的完成发生不利的影晌，但如果这个人竟以为他个人的消极怠工能破坏整个国家建设，那是妄想。因为他的这一点破坏作用被淹没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中，随着整个生活的向前发展而终于是会化为零的。同样的，一切违反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妄图用个人和少数人的力量来对抗人民大众的力量的人，纵然一时能起某种影响，但归根结底，是一点不能改变社会历史前进的基本规律的。

善和恶所起的影响是否像胡适所设想的那样，在社会生活中平行地向前延伸，千秋万岁地共存共荣呢？当然不是的。善和恶在社会生活中不是和平共居，而是激烈地相互斗争的。我们所说的善恶同站在帝国主义走狗立场上的胡适所说的善恶不同：违反历史发展规律，违反人民群众意志的是恶，反之是善。通过激烈的斗争，人民大众的进步的力量一定要，也一定能够抵制、征服和消灭恶的势力。同人民群众的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比较起来，任何恶的势力都是极端渺小的，它想把它的影响永远保存在社会历史生活中是绝对办不到的。

胡适用反科学的论断来煽动反对人民革命的罪恶行为，宣布这一切都能在实际生活这永垂不朽，这不过是他的愚蠢的疯狂的幻想罢了。

事实很明白。难道蒋介石和他手下包括胡适在内的一小撮人能够和中国劳动人民在一起，在同一个“大我”中永垂不朽么？

当然不是的。

这一小撮人的破坏活动固然至今对我国生活的发展还在起着某些影响，但是中国人民将彻底消除他们的破坏活动的影响，并使



这种影响无论在实际生活和在精神生活中最后连一点痕迹也看不见,这是一定的。

而我们的每一个普通的工人和农民为我们的祖国所做的每一件工作,都是永远向前进步发展的伟大的人民事业中的一个部分,因此那才是真正光荣的和真正不朽的。

原载《人民日报》1955年1月7日。



中国近代史绪论

——中国近代史讲座

我今天先一般地讲一讲关于历史科学的问题，然后再讲一讲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问题。

历史发展中的客观规律性

历史研究是一门科学。对于这点，我觉得有必要作一些说明：

历史记载着人类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及其他各方面的社会生活的发展。那么，历史能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呢？曾经在长期间有许多人认为历史不能成为一门科学，不能成为像生物学、化学、物理学那样一门科学。我们现在正在报纸上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就不能把历史真正当成科学来研究。如果说，历史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而这一切事情都是由于人，特别是由于少数人——个别的英雄、好汉、杰出人物任意地制造出来的，他们想把历史搞成怎么样，事情就怎么样。如果历史真是这样的，那么就不可能把历史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了。

有许多人把历史看作是充满了偶然的事件，由许多偶然的原因造成的。好像是由于许多偶然事件错综复杂的关系，就造成了历



史上许多重大的变化。外国的历史学家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如果古代埃及克利奥派特拉女王的鼻子长得高一点，整个历史就会改变面貌。我们现在正在批判的胡适，对历史也是这样的看法。他认为历史充满了偶然的事件，重大的事件的发生都是由于偶然自发的个别的事件引起来的。如果是这样一种看法，历史也就不可能成为一门科学，也就不可能把它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了。

也还有一种人，他们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上的许多事件是由于什么原因产生的，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从表面上看来，他们也研究客观的原因，可是只是从表面现象来看原因和结果。对于一个事件的发生，他可以举出许许多多的原因来，譬如，为什么会发生太平天国那样大的革命运动，追究其原因，有的人说是由于外国的侵略，有的人说是因为农村里有灾荒，也有的人说是因为中国人口增加，又有的人说是由于清朝官员贪污，等等。他们可以从表面上列举出许多原因，列举出许多表面现象，但是毫不加以分析，结果等于没有说明一样。他们把许多根本的重大的原因跟许多非根本的非重大的原因，甚至是一些偶然的因素混为一谈，这些人也不可能对历史作科学的研究。

像胡适这派人，他们研究历史也打着“科学”的招牌，但他们所谓“科学”地研究历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个别的历史材料、古代文献的个别字句加以考证，当作历史科学的内容。这能不能算是对历史作了科学研究呢？他们并没有对历史现象给予说明。他们只是把文献中的个别材料，历史上的个别现象考证一番，而放弃了对历史事实的本质的说明、解释。这种“科学”是假的，是伪科学。

以上这些说法，都使得历史不能成为一门科学，使得我们不能真正科学地来研究历史。所谓科学地研究历史，就是要把过去发生过的繁杂丰富的历史事件、历史事实加以整理，从这些丰富的历史



现象中找出那些可以说明历史过程的根本东西,发现历史发展中的客观的规律性,去说明历史为什么这样地发展下来。历史表面现象看来是很复杂的,的确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有各种复杂的变化;可是历史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有规律性的,找到这种必然的规律性就是历史科学的根本任务。这样我们才能够科学地来说明、解释历史现象。像胡适这派人,他们完全否认这一点。譬如胡适说,一切政治制度都没有什么道理可讲,没有什么学理可言。什么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行得通就算好,行不通就是不好。我们的看法跟胡适完全不同,认为政治制度是有学理可讲的。当资本主义初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合理的。不过在那个时候,资产阶级许多学者不能够正确地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兴起,能够代替封建主义制度。在我们看来,现在世界上资本主义制度正在衰亡下去,社会主义制度正在成长起来。拿我们中国来说,现在正在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切有没有学理根据呢?我们说,有的。什么叫学理?学理就是客观规律。我们不是按主观愿望而断定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社会主义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它的根据就是社会主义客观规律。客观规律就是现在世界上资本主义制度一天一天地没落、衰亡下去,社会主义制度正一天一天地成长起来。昨天的报纸发表了莫洛托夫的报告,他把世界上的变化说得非常清楚,把许多变化从根本规律性上来加以说明。资本主义的死亡,社会主义的成长,就是当前世界生活中的客观规律,不管人们喜欢或者不喜欢,愿意或者不愿意,社会主义历史总是循着客观的规律向前发展。

胡适这派人否认客观的规律性,他们说历史没有什么客观规律性,这是反映了没落阶级的思想。凡是没落的反动阶级总是害怕



客观规律,不喜欢它,于是就否认它,说什么过去的历史就是糊里糊涂过来的,是由于许多偶然的原因,根据某些人的主观想法而来的,是阴差阳错的。今后怎么样呢?他们说,谁也不能预料到,谁也不知道。

在我们看来,过去的历史和当前发展中的人类历史一样,都是有自己的规律的,这种规律是在人类意识之外而独立存在的,不是人们的主观意志所能支配的。正由于历史有这种客观规律性,我们才可以把历史现象当作科学研究的对象,像我们在物理学、生物学中研究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一样。因此历史可以成为一门科学。

当然历史这门科学和自然科学相比,有不同的地方。社会历史现象是有它的特点的。这些特点就是历史事件,历史上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现象,它的发生和发展是要通过人来实现的,而人是有主观意志的,有思想的;不像自然界的现象那样,自然物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从表面上看,历史事件好像是这样的:你想打仗就打仗,你想做这样事情就做。虽然一切历史现象都要通过人的意志来实现,但是绝不能因此说历史不能成为一门科学。那么,人是不是真正能够自由地任意地来创造历史、改变历史呢?不能的。人的想法、人的意志终究是要受到当时客观条件——社会物质条件的限制的。我们现在研究近代史就可以看出来,甲午战争以前最新派的人,不过是主张要外国的科学技术,顶多要求中国有像欧洲国家那样的国会。甲午战争以后,到了戊戌维新运动时期,新派人的想法就比以前高了一些,提出比较完整的关于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一系列的主张。可是隔了几年,经过八国联军之后,革命派就起来讲民主、共和,要求革命了。可见人的思想意识总是要受当时社会条件限制的。在辛亥革命那样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人们能提出我们后来才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



我们还可以看到,人们虽然常常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一些活动,可是人们进行一种活动,往往都是为了应付当前的需要,为了直接的某种利益,长远来看,客观事情的发展并不符合他们的想望。比如,从反动一方面来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它的目的就是要掠夺中国人民,奴役中国人民,使得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这就是为了它眼前的利益。可是,这种侵略刺激了中国的广大人民。在这种刺激之下,引起了中国的社会变化,引起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的广大人民兴起了反抗侵略者的斗争。从这种反抗侵略者的斗争中间,不断地发展起中国人民为争取解放的斗争。这种影响是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时所设想不到的。鸦片战争时代,某些西方资本主义强盗坐着海船到中国来为所欲为,想要中国完全受它支配。可是结果怎么样呢?他们的想望并不能够实现。可见,历史并不是按照帝国主义侵略者所设想的那样发展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人以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改变”历史,完全不管历史的客观规律,认为历史的发展没有它的客观规律性,可以由自己来支配。大家知道,一切违反历史发展规律的反动企图,不论它是怎样完整、怎样系统的一套计划谋略,都是不行的。即使暂时好像能够实现,可是终究是要失败的。这就是说,这种违反历史规律的反动企图,不能不被客观的历史规律所打倒、所推翻。历史并不是可以由人们随意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支配、来改造的。

所以,虽然历史的活动是要通过人来实现,而人这种因素是有意识的、有思想的,这种情形,使历史现象表现得非常复杂,比自然现象要复杂得多,可是,总不能因此就说历史没有什么客观规律性。



马克思主义使历史研究真正成为科学

当然,研究历史科学跟研究自然科学不同,研究自然科学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试验。可是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就不能搞一个小规模的实验室来试验一下。自然科学家可以在实验室里反复进行某种试验,以至几百次,但是对社会历史就不能这样做。我们不可能把社会历史现象重新演习一次,或在实验室里来预演一次。当然由于研究对象不同,研究的具体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自然科学各部门的研究方法就有所不同,不能说任何一种自然科学都可以同样程度地在实验室里工作。在研究社会历史中,我们采取一种概括的和抽象的方法。自然科学也是带有抽象性的,就是说,一种自然现象,在大自然界中间往往有各种复杂的条件,我们现在把它搬到实验室里来,排除掉在自然界中那些跟这种现象没有什么必然关系的条件,这样就可以看到比较纯粹的现象,在比较单纯的条件下面来研究它。对于历史现象,既然不可能把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东西搬到实验室里来,这就需要我们去搜集许多历史材料,加以分析,看哪些材料、事情、条件是偶然的,非本质的东西,不是根本的东西,那么就把这种东西排除掉;把偶然的和必然的区别开来,把根本的和非根本的区别开来,这样,就找到历史发展中最根本的、最本质的东西,看到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要潮流。采取这样的方法,我们才能对历史进行科学的研究。我们刚才说的胡适一派搞材料的方法其所以是不科学的,正因为:他们认为研究历史既然需要材料,那么就把任何材料都拿来考证一番。但这样是不能有科学的研究的。因为在许多材料中有些是很重要的,有些是偶然的東西,有些是根本的东西,有些却是非根本的东西,必须加以区别。笼统地混



杂在一起,便不能说明历史,其结果只能被历史材料搞糊涂,根本看不出历史现象有什么客观规律。

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使得历史真正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使得对历史的研究成为一种科学。马克思主义者从整个历史发展中间指出这么一点:社会历史生活虽然非常复杂,可是归根到底,决定社会的面貌、决定社会的思想观点、决定社会的政治制度的是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作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人的生产、社会的生产、社会的生产方式。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一直到今天的社会,推进社会发展的力量就是生产力一步一步地提高。大家知道,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够战胜、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能使得社会生产力发展得比资本主义更高。人们如果不去进行生产,那就没有什么社会了。在生产、生产方式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一步一步地提高,社会也就一步一步地发展。在各个时代,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形成了不同的生产关系(在生产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称之为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间,所谓生产关系,表现为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即在生产中间,一部分人劳动生产,另一部分人不劳动生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关系,是阶级社会的社会关系中最根本的东西。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成为生产方式,这是决定社会面貌、社会思想观点、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因素。某种生产关系总是适合于某种形式的生产力。封建时代的生产力形成了封建时代的生产关系,即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形成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关系,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生产力总是不断地提高,不断地向前发展的。每一个时代的生产关系起先是和当时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但渐渐地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就造成了



生产关系跟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状况。这就是说,发生了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发生生产关系的变化,在社会生活中,就表现为旧的、反动的阶级跟新兴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新兴的阶级要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使得社会的生产力向前发展;旧的、没落的阶级极力阻止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因为旧的生产关系对它有利。马克思主义根据历史发展的无数丰富事实证明,在发生这样的斗争的时候,取得胜利的是新兴的阶级。马克思主义者从这里找出了社会历史发展中间的一个根本的规律,叫做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关系不能长期处于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状况下。刚才说了,由于生产力向前发展了,旧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相适合了。这种状况是可能暂时存在的,但是不能够长期维持。在这种情况下,要让生产力不向前发展,让它仍旧适应旧的生产关系,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指出,客观的事实不是这样的,历史的发展指出了一条规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关系必然要发生改变来适合生产力的性质。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者从社会历史中间,从生产方式的发展中间,看出了决定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规律。有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想指导,我们就能够去正确地分析和研究社会历史现象,而不致于被所研究的那一堆复杂的历史材料搞糊涂,就能够从大量的、丰富的材料中间找到根本的东西,从而也就能根据这些根本的东西来对社会历史作出科学的说明和解释。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研究是科学,研究历史的根本任务就在于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当前的事实和过去的历史是相联系的。了解了过去历史的规律性,就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当前社会的规律性。懂得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我们就能够正确地来参与当



前的社会政治生活。我们认识这样的规律性并不是为了好奇,而是为了我们当前的斗争实践、当前的工作。我们进行改造社会的革命事业,是以对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性的认识作依据的。譬如,我们规定了总路线,规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并不是哪一个人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有它的客观根据的。所以,研究历史科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进行工作和斗争。

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历史科学,一方面是客观的,一方面是有-一定立场的。历史是一门科学,对于科学就要客观地去研究,不能随意解释历史。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是从客观事实中找出来的,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不论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客观规律总是那样的。研究它就要客观地研究,不能凭空想象,不能我喜欢那样就创造出那样的规律性来,这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就要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去研究。可是,又要站在一定的立场上,这不是互相矛盾吗?我认为这并不是矛盾的。某种立场跟客观的历史发展趋势相违背,那就是反动的立场。刚才说的,胡适就认为历史没有规律性。我们让历史客观规律性暴露出来,他就不愿意,他不愿看见历史的真实规律性的暴露,他总是企图否认客观的规律性。革命的立场,就不怕看穿历史的真相,不怕揭示出过去历史和当前历史的真正的规律性,不怕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建立起来。这样一种规律性,对艾森豪威尔、邱吉尔这样的人来讲,他们是害怕,不愿意承认。但是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可怕,而且我们要利用这种规律性,依据这种规律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说,只有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我们才能正确地研究历史的规律性,才能够深刻地揭示历史的规律性。那么对过去的历史是不是也应该以这种立场去研究呢?过去的历史是过去历史时代的斗争,虽然它是过去的事情,但是,在我们观察过去时代的历史时也应该有一定的立场。不能认为既然是过去的,我们就



应该对它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在历史的不同时代都有进步和倒退的斗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我们要能真正认识和揭示过去时代的历史的规律性,我们在观察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事实时,都应当站在当时革命的进步的那一方面。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发现当时时代的事实真相以及历史的规律性,并且给以正确的说明。

我想,对历史是不是一种科学,能不能把历史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就作这么一点说明。

中国近代史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

以下,我讲一讲关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几个问题。

我们所说的近代史,是指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到 1919 年五四运动时止这 80 年的历史。这一段历史虽然时间不算很长,可是,它在中华民族历史生活发展中间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这一段历史变动很激烈。在这段历史以前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至少延续了两千多年。这两千多年并不是完全停滞不动,最近在讨论《红楼梦》当中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就是明末清初那个时代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不过那毕竟是萌芽,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比明末清初所发生的变化不知要大多少。这种变化虽然没有使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社会,可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却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要从鸦片战争算起,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们把这一段历史划分成两段,以五四运动为界线。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就是研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前一段,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段就叫作中国近代史时期。



这个中国近代史时期同五四以后也有很大不同。五四以后的社会性质虽然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可是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工人阶级独立的力量,有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在五四以前,工人阶级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没有能够在历史舞台上担任主要角色。在五四以后有了工人阶级,有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

所以中国近代史这一时期显然在中国历史发展上有重要的意义。在它以前是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里最多只有资本主义的初步萌芽;而在它以后,就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走向了中国的胜利。这一段历史生活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使得中国从封建社会转变成一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的社会。

这种巨大转变是怎样来的呢?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性质发生了变化。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社会生产基本上分散的小农业、手工业,可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机器工厂。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了变化,随着生产力的变化,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激烈的变化。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阶级状况是很简单的,基本上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两大阶级,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就不这样简单,这时在中国历史里面出现了新的阶级、新的社会力量。这时旧的阶级、旧的社会力量也表现出一种新的面貌。而在这 80 年的社会生活中间又出现这样一种力量,这就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力量、外国帝国主义的势力。这虽然是外部的力量,但它到中国来统治了中国,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起来严重的、恶劣的影响。在这 80 多年中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就因为一方面有了外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势力;而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社会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新的阶级,这



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管开始时资本主义多么微弱,可是,终究是在中国社会里面有了资本主义,并且它在这 80 年中间不断地发展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在这时还没有能成为独立的阶级力量,但终究是在中国开始有了现代无产阶级。这时旧的社会力量、旧的阶级并不是死亡了,因为在没有真正从封建社会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还仍然存在着。所以中国近代社会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充满了阶级斗争,各个阶级、各个社会力量之间不断发生激烈的斗争。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国内农民和地主之间有斗争,地主和资产阶级之间也有斗争。在激烈的斗争中,各种旧的、新的阶级都在历史生活中充分表现出它们的本质。所以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这一段历史很复杂,所以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各不同阶级对这一段历史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和说明。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各种错误观点

从根本上说,在近代史研究中间可以看出工人阶级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资产阶级的观点是对立的。这种对立,我们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例如,如何评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一步一步地侵入中国。对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胡适说中国并没有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国内的军阀混战,中国的贫穷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没有关系。这是买办资产阶级



的观点，是为帝国主义辩护。跟胡适抱同样观点的还有一个人叫蒋廷黻，他在过去中国的大学里讲中国近代外交史时，整个是为帝国主义者辩护。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烧掉英国的鸦片，抵抗英国侵略者，但另外有一些清朝官僚如琦善、耆英这些人，却无耻地投降侵略者。这两种人究竟谁做得对呢？对这个问题，蒋廷黻说林则徐这个人不识时务，把中国的事情搞坏了；说在鸦片战争中间对英国侵略者不抵抗，采取投降态度，甘心订屈辱条约的人是了不起的外交家，是懂得时务的聪明人，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不行，外国厉害。这种观点是很荒谬的，是毒害中国人民思想意志的。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表面上看起来还不是那么错误，就是把中国近代史单纯地写成一部不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它也骂帝国主义，说帝国主义不断欺侮中国，可是同时把中国人描写成是可怜的、卑屈的，逆来顺受、无可奈何的牺牲者。这种观点虽然反对帝国主义，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它完全忽视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历史表明，在帝国主义开始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民就开始了斗争。这种斗争虽然开始时是很小的，比较弱的，可是它是不断地发展的，一直到最后取得了胜利。毛主席说过：“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历史。”这样的说法才是完全的。

再例如，对中国近代史中间太平天国这样的革命运动的评估问题。辛亥革命的革命派对它是赞扬的，孙中山先生就是一个。他赞扬太平天国，并且自认是太平天国事业的继承人。但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一般地并不了解农民革命的意义，他们常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描写太平天国革命。至于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那就完全站在反对太平天国的立场上。蒋介石反动集团崇拜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而极力地贬低太平天国的意义。至于



对义和团那就更是这样了。当时的革命派很多是对义和团采取轻视态度的，只有个别的人赞美义和团。如在辛亥革命以前相当流行的《黄帝魂》一书，肯定了义和团对中国历史有很大关系，它振奋了人心，表现了中国人民是能够抵抗侵略者，认为义和团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影响是很大的。可是解放以前许多历史教科书中把义和团称为匪，说它闯了大祸，没有什么进步意义。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对辛亥革命和辛亥革命以前的革命运动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特别是蒋介石反动集团对辛亥革命，对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作了许多歪曲和抹煞。许多人讲辛亥革命，抹煞了当时革命运动中群众的作用。蒋介石统治集团为了争“正统”，对辛亥革命前所谓非“正统”的革命事实加以抹煞，加以否定。例如同武昌起义有密切关系的文学社（因为受压迫它曾改过很多次名称，最后改称文学会，以避免反动统治者的压迫）。这个集团在两湖一带做了许多军事工作和宣传工作，但这些工作都被抹煞了。又例如湖南省先发动起义的焦达峰（青年，日本留学生）在湖南做了好几年的军队工作，武昌起义时他率领新军发动了暴动。在其他许多省份，起义以后原来的清朝督抚成为新政府的首领，在湖南就不是这样，焦达峰自己作了湖南省的都督。可是焦达峰立刻受到当地地主绅士的攻击，以谭延闿为首的地主绅士组织兵变，杀了焦达峰。谭延闿这个人根本同革命无关系，他是湖南地主绅士的代表人，但是后来蒋介石搞的历史只承认谭延闿，把焦达峰是当时的真正革命派和他做的工作都抹煞了。又如组成同盟会的，除了兴中会以外，还有光复会、华兴会，但蒋介石国民党所写的国民党历史中往往把光复会、华兴会都抹煞掉了。光复会的著名领袖之一陶成章，他们也不承认。孙中山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他自己组织、参与了十次起义，十次都失败了，但最后达到了胜利（见《孙文学说》），这是说他亲身参



与的。可是后来蒋介石国民党党史的写作人，却把这十次活动当做当时整个革命运动中的最主要的，其他就都不算了，或认为不是主要的。大家知道，同盟会成立后，1906年湖南的醴陵、浏阳和江西的萍乡等地群众发动了第一次起义，有矿工和农民参加，同盟会也派人参加了。这个群众性的革命斗争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然不应该低估。在革命中间每一个地方起义，首先都有群众起来斗争。比如上海的光复的确是群众自动起来攻打制造局把清朝官员赶跑，群众斗争胜利了，陈士英却跑出来吞掉了革命果实，并把真正跟群众一起斗争的人抹煞了。辛亥革命显然没有达到革命派所要求的那样的真正胜利，可是它毕竟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刘少奇同志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到这一点，他说辛亥革命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是，对辛亥革命究竟是怎样发动起来的，革命派到底做了些什么工作，如何正确估价群众所进行的斗争，这些一般说是不大清楚的。其所以不大清楚，就是因为过去许多历史用错误观点故意把它曲解了，抹煞了某些事实，又夸大了某些个别事实。这些错误解释使得人们常常以为辛亥革命只是由于少数人跳跳蹦蹦的结果。辛亥革命所以能够在历史上有那么大的意义，归根结底还是群众的力量，但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此外，还有这样的人，他们根本否认辛亥革命的合理性。比如胡适就是这样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帝国主义者的观点。帝国主义者对清政府被推翻很表惋惜。因为在辛亥革命以前，帝国主义想利用清政府搞一点“民主”的外衣来统治中国，但结果被革命推翻了。在它们看来，如果清政府能保存下去是对帝国主义较有利的。胡适的观点就是代表这种观点的。他认为清政府本来是个“社会的重心”，可惜被辛亥革命推翻了，结果弄得中国社会没有了“重心”。在我们看来，清政府的确是反动统治的“重心”，辛亥革命把这个“重心”打垮，以后



反动统治者要重新建立一个“重心”颇不容易。虽然革命派当时没有能同革命力量来建立一个“重心”，致使以后发生混乱，但用正确的观点来看，这是没有什么坏处的，这是中国的进步现象。旧的打垮了，新的未建立起来，当然这中间要有一个混乱时期。胡适这派人的看法不同，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就是没有意义，清政府保持下来对中国有利，它被革命打垮是历史的不幸。由上面可以看出对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和错误观点对立，这种观点上的对立，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观点的对立。

人民是中国近代史的主体

现在说说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首先应当指出，中国近代史是以中国人民为主体的。它不是以外国帝国主义者为主体的历史，那种把中国近代史的主角（即主人）看成是外国侵略者，而认为中国人民不过是配角的看法是错误的。当然中国近代史也不是某些反动统治人物的历史，不是慈禧太后的历史，不是李鸿章的历史，不是袁世凯的历史，它的主体不是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这样的人。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是中国近代史的主角。

在中国近代史中，中国人民是谁呢？我想应该说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工人。农民群众是最大量的，它是在封建社会中本来就有的一个阶级。在这个时期新生长起来了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大体上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站在一起的。工人阶级在这个时期存在着，可是工人阶级在这个时期还没有成为独立的自觉的阶级。如毛主席所说的，在那个时期，中国无产阶级



还没有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还是作为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如果概括起来说，在这时期的人民的主体就是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其中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

农民群众在中国近代史中间演出了轰轰烈烈的历史剧。中国农民大众在中国近代史一开始就表现了他们是和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坚决对立的，他们是和当时中国封建势力坚决对立的。农民群众在中国近代史上独立地进行了大的革命，如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革命的主要锋芒是针对于国内的封建势力，同时也进行了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太平天国以后40年又发动了义和团那样的农民群众斗争，这个斗争的主要锋芒是针对于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者。最后农民又参加了辛亥革命，在辛亥革命运动中起了作用。虽然太平天国、义和团这样的革命斗争都失败了，而农民群众在辛亥革命中间是作为资产阶级所领导的群众力量出现的，但是完全不能抹煞农民在近代历史上所起的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作用。太平天国革命使以清政府为首的封建统治势力遭到严重创伤，没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可以说就不会有辛亥革命的胜利。孙中山先生就自认为是太平天国的继承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不仅大大地削弱了封建势力，同时也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作了一个严重抗议。到了义和团这个农民自发的运动，是直接针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作了斗争。当时，经过甲午战争后，各国帝国主义侵略者企图直接瓜分中国，义和团运动实际上是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作了抗议，至少使帝国主义感觉到直接瓜分中国是不可能的，是会遇到很大困难的，帝国主义者不得不考虑在中国采取另外一种比较隐蔽的方法来统治中国。在这个意义上说，义和团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对中国当时面临的亡国危机，起了挽救作用。所以说，农民群



众在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中间，在无产阶级还没有起独立的作用的年代，是站在最革命最进步的立场上，直接对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封建势力作斗争。农民群众在辛亥革命中好像是个无名英雄。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多多少少地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会党联系了一部分农民群众；农民群众在辛亥革命中也进行了自发斗争。农民群众参加革命和他们的自发斗争对辛亥革命的成功是有作用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过分夸张农民的成就，在那样的时代，农民群众没有工人阶级这样先进的阶级的领导，所以他在革命中所能取得的成就，不能不有很大的限制。太平天国、义和团这样的运动是农民搞起来的，它有什么同盟军没有呢？谁同它合作呢？参加这个运动的除了农民之外，能和它合作的还有些城市手工艺者和城市与农村的游民，也还有一些在封建社会里面社会地位很低的小商人，他们当农民革命进入城市以后参加进来了。在这些力量中间，有一部分力量是增强了农民的革命力量，但也有一些城市游民、小商人起了破坏农民革命的作用，对农民不利。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中，贫农是主体，是最主要的一部分，有中农参加。可是在农民队伍中间还有一些城市游民和由破产的农民而变成的染上各种坏习气的江湖游荡的人，还有一些商人，他们参加到农民的队伍中，也带来了一些坏影响。他们对农民革命来说是阶级异己分子。太平天国从初期的胜利到后期的失败，所谓“杨韦之乱”的内讧是一个关键。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看作是太平天国中个别领袖的冲突，它带有阶级性，是农民阶级队伍中间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叛变。韦昌辉是富农、商人出身，他成了这种阶级异己的势力的代表人。农民群众因为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所以不可能提出一套完整的、有现实意义的纲领来指导自己的革命，同时也不容易抵抗对农民革命起破坏作用的许多坏分子的腐蚀作用。在义



和团运动中间更可以看到清朝封建统治者有意识地采取派一些人到义和团里面当头子的办法,这样就使得义和团的组织受到很大的破坏。我们说义和团运动虽然本身有很多弱点,可是封建统治阶级不可能根本消灭义和团运动的革命性。义和团运动终究还是群众的革命运动。

总之,在中国近代历史中间,农民群众的重要地位是不能抹煞的。

同时,中国近代史中间还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数量不多,可是它是当时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力量。

对近代资产阶级发展历史的科学研究,我们今天还做得很差,所以我现在说的可能有很多不对的地方。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大概有这样几种:一种是买办资产阶级,它是站在反革命方面,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勾结在一起。买办资产阶级大体在鸦片战争时期以后开始形成。鸦片战争以前在广州沿海海口作出入口的商人,财产很多,所谓“十三行”即是,可是这种商人由清朝官方指定,受清朝官员所控制,故称为“官商”。英国人以及其他外国人到中国来做生意,必须同这种官商做买卖,不能和其他商人做买卖。英国人要撤销这种制度以利于自己。鸦片战争的结果实行了五口通商。英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自由地到中国沿海五口来,同时也可以自由地在中国选择它所需要的商人,于是他们就使得中国一部分商人能够直接为它们所控制,这样就产生了买办资产阶级。这种买办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间就显出来了。当时太平天国在战争中占领了南京后没有马上打上海,使上海变成了一个孤立的港口。这个地方清政府的军队开始很少,就跟租界中英国、法国的力量合作守上海。后来清政府把李鸿章的军队从安徽调到上海来,在这里面上海的买办商人起了作用。经过他们跟



英国人商量(因为当时从安徽到上海之间是太平天国占领着,陆路上不好走),搞了英国轮船,从上海开到安徽,把李鸿章的军队调到上海。李鸿章一到上海,便经过上海买办商人跟英国、法国建立了合作关系。所以,这种买办资产阶级一开始在经济上就跟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在政治上也和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在内部则和封建势力结合在一起。

当时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还有一部分人是从地主、官僚中转化过来的。这个阶层的力量,就是维新运动的社会基础。康有为所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少数几个人和光绪皇帝搞出来的,它也有社会基础,没有社会基础是不可能搞出来的。康有为曾作了一些努力来发动这种社会力量,他在各地组织学会,在湖南组织南学会,在广西组织桂学会,以及其他一些学会,参加学会的人主要是地方上的许多新派绅士。他们因为还没有当权,并要求工商业的自由发展,所以与封建统治势力有矛盾,但他们同时又和封建势力有密切联系,所以不赞成革命。在辛亥革命时期,我们看到君主立宪派的活动,君主立宪派就是代表这种从地主官僚转化来的资产阶级。

最后,资产阶级中还有一部分人是同封建地主势力联系较少或没有联系的。他们是从小生产者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性的。这种人在国内很少,而在华侨中较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城市小资产阶级能够参加他们的阵营。他们是辛亥革命中的革命派的社会基础。孙中山开始进行革命斗争时,首先在华侨里面找到了这种社会力量。当时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兴中会的社会力量是怎样的呢?冯自由关于兴中会的记载中提到了279个兴中会的会员的职业和社会成分。从这个材料中可以看到,在这279个人中,华侨有219人,占78%。按社会成分说,这279人中商



业和农业资本家(华侨资产阶级中有一部分是经商的,还有一部分是开农场的)约48%,学生和种各小资产阶级分子占21%,工人占19%,此外有12%的人是会党活动分子。这个材料可以表明兴中会的主要成分是华侨中的资产阶级。到了同盟会时,因为吸收了光复会和华兴会的会员,同盟会的阶级基础、社会力量更扩大了,不但包括华侨资产阶级,而且还包括国内的革命派的资产阶级,还有很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参加进来了。在辛亥革命以前,华侨和国内的资产阶级是在革命运动中间起了作用的。那时资产阶级不仅是从经济上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而且还有些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了革命,推进了革命斗争。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湖南人禹之谟,曾留学日本,戊戌维新以后就趋向于革命,在同盟会没有成立的时候,在湘潭办了一个毛巾工厂,是湖南商会会长,1906年在萍乡、浏阳起义的时候被关起来杀掉了,因为他进行革命活动。另外一个潮州人许雪秋,华侨商人,同盟会没有成立时,1904年就回国在潮州与当地的新派绅士联络起来准备起义,捐了一个道台,又承办了潮汕铁路的一部分工程,招收了一些工人,准备用这些工人作起义的基本队伍,他在潮州一带几次策划起义,同盟会成立以后,他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先生委任他为中华民国军东军都督,1907年黄冈起义就是他领导的。这些材料表明这个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是起了革命作用的。列宁也说过,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产阶级和西方资产阶级有所不同,西方资产阶级是堕落的、完全反动的,中国的资产阶级这时还具有着革命性。

太平天国、义和团两个革命运动都失败了,两个运动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开始酝酿。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五年同盟会就成立了,正式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诞生了。义和团、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表明了单纯农民的



革命不能取得胜利。可是那时还没有工人阶级这样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资产阶级在那时就成为历史发展的中心力量。资产阶级带动了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了这种革命运动，同时联系了一部分农民群众和工人群众。

所以我们说，整个近代史是以中国人民为主体。人民中再加以分析，可以看出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工人。这些力量的对立面就是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和中国的封建势力。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都是反动的势力。在中国近代史开始时它们好像是对立的，因为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不能不损害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既得利益。可是这两种反动势力终于结合起来了，共同来反对中国人民中兴起的农民革命运动，也反对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

中国近代史中的三次革命高涨

在中国的近代史中，我们可以拿中国农民所进行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为主要线索来进行研究。通过农民进行的革命运动和资产阶级进行的革命运动，就可以看到在中国近代史中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以及各个阶级之间如何互相结合，如何互相对立，也就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史的真正面貌。农民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两种力量在中国近代历史中间互相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简单的。通过中国近代史中革命的发展，也可以看到这两种阶级力量间的关系的变化。

据我看，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有三个革命高涨的时期。虽然我们说从外国帝国主义侵略进来一开始，中国人民就不断地进行反抗斗争，在整个近代史中这个人民革命斗争没有停止过，但是在



不断地进行革命斗争中间，可以看出革命形势比较最高涨的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革命。当太平天国时，中国还没有独立的资产阶级力量，这时候只是有了买办资产阶级，他们基本上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站在一起。这时也有少数知识分子带有资本主义思想的倾向，但他们不同情农民革命，而且反对农民革命。例如，有一个人叫做王韬，他有些新思想，甚至还一度跑到太平天国革命队伍中去，但这种人基本上是不能了解农民革命的。王韬跑到太平天国里面去，很快地又跑出来，不承认他自己同太平天国有过关系。又比如冯桂芬，他是当时讲“新学”的人，但这个人是同李鸿章合作反对太平天国的。所以在这时期只有农民是革命的势力。

第二个革命高涨时期，是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的时期。甲午战争以后三年多发生了戊戌变法，然后又发生了义和团运动。这时期的形势很复杂，一方面有农民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同时有了一种资产阶级力量，这种资产阶级力量虽然提出“救亡图存”的口号，但不敢进行革命。当时中国处在危险的形势下，英国、法国、德国都来扩大它们的势力范围，亡国危机就在面前，所以要救亡。他们以为要救亡就要使国家制度有所改变，以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他们看不到、不承认农民革命力量，他们企图用改良主义的办法，依靠清政府本身来逐步改变政治制度。他们跟当时的清政府一样，看到各个地方农民运动起来感到害怕。他们不赞成农民革命运动，相反地向清政府这样说：如果你不进行改良，不把自己的政治制度进行某种程度的改良，那么农民运动就会起来，农民革命会使你受到严重打击。他们是想用政治上的改良来作为抵制农民革命运动的手段。要求“救亡图存”在当时说来是新



的思想,这一点康有为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唤起了社会上的一部分人,主要是新派的地主绅士,特别是一些和工商业有联系的地方绅士,以及一些比较年轻的知识分子,唤起这一部分社会力量来注意天下大事:“中国的事情要改革,不改革不行啊!”可是看不见农民的力量,是他们的致命弱点。所以在这一时期,革命的农民仍然是孤军作战,仍然像太平天国时候一样,不能不陷于悲惨的失败。而那些求进步的改良派虽然抱着资本主义的进步理想,但他们既然跟农民革命完全“分道扬镳”,也不能不陷于失败。这是第二个革命高涨时期。

在第二个革命高涨时期以后,不到几年就掀起了第三个革命高涨时期,就是同盟会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在这一时期跟其他许多分散的革命小团体结合起来形成了整个革命运动的中心力量。这个革命运动不但团结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间的革命派,影响越来越扩大,并且多多少少地也把农民、工人群众带动起来了。他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思想来领导革命运动,这种思想是自发的农民运动不能明确提出来的。农民的力量和资产阶级的力量在辛亥革命中以资产阶级为领导者多多少少联合起来了。因为是由资产阶级领导,所以当时的革命提出的主张、纲领,带有更多的现实性,不像单纯的农民革命提出的纲领那样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现实性不大。资产阶级提出一套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纲领,这个纲领能够把大量的群众鼓动起来,同时这一时期因为资产阶级进行了革命斗争,并且能够多多少少把农民、工人群众带动起来,因此它有了力量,不是少数人的斗争了。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可以从这里得到说明。可是另外一方面,因为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中间不能提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纲领,它不敢或者不能够真正动员最广大



的农民群众和其他劳动人民,对于自发的群众斗争也不敢去真正建立领导,实行领导,这样就不能使得资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得到彻底的胜利。在辛亥革命还没有得到彻底胜利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向帝国主义以及和帝国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封建势力表现了妥协。

从这三个革命高涨时期可以看到当时农民、资产阶级这两种基本的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同时从革命发展中间也可以看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互相结合,看到他们是怎样来进行反对人民革命的,是用什么方法来反对中国人民的斗争的。很明显,每一次大的革命高涨时期都使得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不能不考虑改变它们统治的方法,用新的进攻方法代替旧的进攻方法,用新的统治方法代替旧的统治方法。例如,帝国主义者不能不改变它们直接瓜分中国的方法,他们宁愿扶植一种可以供帝国主义利用的反动统治势力来统治中国,表面上维持中国独立、统一的面貌。帝国主义不能瓜分中国,自然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利害冲突有关,同时也是由于中国人民拒绝康有为一派主张的方法。但随着革命的发展,清朝政府也不断地改变它的统治方法,以至自己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企图以这方法来抵制革命。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帝国主义知道清政府不能再维持下去了,于是就采取用袁世凯来代替清政府这样的方法,来继续保持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统治。

这些,我想都可以表明近代历史的真正主人不是外国侵略者,不是那些反动的统治人物,而是广大的人民。把人民的革命斗争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能比较容易地看清楚中国近代历史中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现象。

我这些意见不一定是完全对的,只供大家作参考。



这是在1955年2月1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组织的中国近代史讲座第一次报告会上的报告记录。当时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曾把这个记录连同董必武副主席在这次报告会开始时的讲话一起印成小册子。

附 记

1955年3月5日易礼容先生把章士钊先生给他的一封信转送给我。章先生因我在全国政协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演讲而在这封信中谈到辛亥革命时期有关《黄帝魂》一书罕为人知的情形。后来在1961年章先生发表的《疏黄帝魂》(刊于中华书局出版的《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册)一文中公布了此书情形。现将我收存的40年前的这封信附录于此,全文如下:

礼兄足下:

上次我听到胡绳先生讲演历史,他曾提到《黄帝魂》一书。我对此书有些回忆可供胡先生参考,特为兄言之。

《黄帝魂》是在光绪二十九年出版。其时我在上海设了一个印刷机构,名曰东大陆图书局。这部书即在该局印成的。书中所收都是当时作者的手笔,惟各未署名,以致后来无从辨认。我有一篇《王船山史说申义》在内,后来编刘申叔遗集者将它列入集内,我无意中发见,不禁失笑。胡先生所提《中国与义和拳之关系》一文是本书编者黄君自撰。黄君名藻,字菊人,湖南善化人。民族观念极其浓重。好饮酒,醉后执笔,往往不能自休。此外他还有一篇《过金陵》,凭吊太平天国遗迹,流连咏叹,信是杰作,可惜遗稿无存了。他是湖南人当中骂曾国藩最激烈的一人。其人又善书,好作北魏体。《黄帝魂》三字作为封面者出彼手书。当时我和他同居在昌寿里,望衡



对字，几乎无日不见面。他虽欢喜使酒骂座，我们两人感情却很好。所以他的著作由我代印的不止一种。我于此人常常回忆不置，似乎值得胡先生在革命史上记下一笔。余续述。

士钊谨启

三月四日



唯心主义是科学的敌人

——论胡适派思想对科学的曲解和诬蔑

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是极端反科学的主观唯心主义。但胡适和他的同伙都吹嘘自己是拥护科学、提倡科学的人。为了用科学的招牌掩盖自己的真面目，胡适经常搬弄“尊重事实”、“跟着事实走”等等说法。人们如果不了解胡适思想的本质，就会以为，胡适也许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唯心主义者；或者以为，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并不妨害人们真正研究科学和坚持科学态度。胡适一伙人的目的就在于混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区别，使科学成为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工具，从而在根本上破坏科学。

为了严格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为了使科学不致被唯心主义引入歧途，为了捍卫只有在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上才能确立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我们有必要来彻底揭露胡适的欺骗。我们要指出，胡适的所谓“尊重事实”，其实不是真正的尊重事实，胡适的所谓“尊重事实”、“提倡科学”是同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胡适按照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而赋予科学、事实、真理等等字眼以特殊的含义，隐藏在他所说的这些字眼下面的是彻头彻尾反科学的态度。



为什么胡适的所谓“尊重事实”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尊重事实呢？

因为，第一，胡适所说的“事实”至多只是个别的材料、个别的现象。胡适所说的“尊重事实”并不是要求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反而是利用个别的材料和现象来混淆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

而且，第二，胡适所说的“事实”并不是在人的意识以外的客观存在。按照胡适这一派人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说来，人所认识的并不是客观的存在，他们所谓“事实”只是主观的产物。

这两点都牵涉到哲学上的认识论问题。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做武器，就可以彻底揭穿胡适的骗术。我们先来说这里的第一点。

胡适经常在他所谓“尊重事实”的名义下反对使用“抽象名词”。从这种说法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胡适是在用一种狡猾的形式来阻止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内在的本质和规律性的揭发。

在1919年胡适写的《问题与主义》一文里，他说，他反对谈主义，特别是反对谈社会主义，就因为主义是一个“抽象名词”。他说：“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①。到了1928年他又写道：“世间的大问题决不是一两个抽象名词（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紧的是事实。现今许多朋友却只高谈主义，不肯看

^① 《胡适文存二集》，第149—150页。



看事实。……拿一个‘赤’字抹杀新运动，那是张作霖、吴佩孚的把戏。然而拿一个‘资本主义’来抹杀一切现代国家，这种眼光究竟比张作霖、吴佩孚高明多少？”^① 在1932年，北京的学生群众为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教育措施而提出了“反对法西斯蒂化教育”的口号，这又惹怒了胡适。当时他写道：“所谓‘打倒教育法西斯蒂化’只不过是一班无心求学而有意捣乱的学生信口编造出来的一种名词新戏法而已。本来是无意义的，我们不必去追求它的意义。”^②

胡适的历年文章中，这类的说法还多得很。在1935年他索性宣布，使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名词就是“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他说他所反对的就是“用一个抽象的名词来替代许多具体的历史事实”，“这毛病是笼统，是混沌，是抹煞事实”^③。

照胡适说起来，他反对“抽象名词”，就因为他尊重具体事实；科学态度就应该是像他那样地尊重具体事实。

胡适用这套说法来把抽象和具体说成是绝对对立的，使人认为只有个别的具体的东西是真实的，而抽象的东西则是虚幻的，是毫无意义的。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无论哪一门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不能不运用抽象的思维。科学的抽象是从许多具体事实中找出它们本质上的共同的东西而加以概括，深入地揭露事物内在的联系和内在的规律性。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性不是人们能够直接看到摸到的，必须通过思维，人们才能把握到。所以科学的抽象就一方面说来，因为是撇开了事物

① 《胡适文存三集》，第63—64页。着重点是原来有的。

② 《独立评论》第8号。

③ 《独立评论》第153号。



的外部现象上的种种非本质的、偶然的因素，所以好像是离开了感性的具体的事物，而就另一方面说来，却是以具体的感性知识为基础，而更深刻地、更真实地反映了客观事物。

所以科学的抽象是不能反对的。排斥科学的抽象就是排斥理性知识，就是排斥对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内在规律性的认识，也就是排斥科学本身。

胡适所反对的就是这种科学的抽象。

我们把胡适所歌颂的“现代国家”用“资本主义”这一个概念概括起来，1932年的学生用“法西斯蒂化的教育”这个概念来说明国民党的反动的教育措施，当然是正确的，必要的。因为这些概念是把事物的本质揭发出来了。

我们现在正在为建设我们的国家而进行着这样那样的无数具体的工作、具体的斗争，把这一切概括起来，就叫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概念从本质上表明了我们所进行的工作和斗争的内容。

胡适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等等名词，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而日益被普遍地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用这些名词来表现具有明确内容的科学概念。这些名词很快地为广大人民接受，就因为它们是历史现象的本质的反映。胡适虽然竭力想排斥，也排斥不了。

胡适向人们介绍他所看到的美国说：“美国人口平均每五个人有车一辆”，“汽车公司近年通行分月付款的法子”，一个劳工代表“穿着晚餐礼服，挺着雪白的硬衬衫”等等^①。照胡适说来，这都是最具体最可靠的事实。他企图使人相信，在美国，社会财富是很平

^① 《胡适文存三集》，第54—60页。



均的，工人生活得像绅士一样，所以美国实在是天堂。至于说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那不过是毫无意义的“抽象名词”罢了。胡适的目的就是想用一些个别的材料来否定那种概括了大量具体事实而达到的本质认识，排斥科学的抽象。

正因为胡适的目的是取消科学的认识，所以他所反对的也只是科学的抽象。胡适既然把抽象性的概念看作不过是虚构的东西，从而攻击科学的概念，于是他就完全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方便而任意地玩弄概念。在胡适的文章中大量地使用了各种含义不定、内容不明的概念，并故意使得本来有明确内容的科学概念成为模糊不清的名词。这里只举一个例。胡适为了反对社会主义曾说：“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① 老实的读者如果以为胡适从此闭口不谈社会主义，那就错了，他不但不拒绝用这个名词，而且大用特用。例如他说：“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②，他说，苏联是在实行社会主义，英国工党政府也是社会主义，而且连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厂视察”，“失业救济”等等都算做社会主义^③，甚至连美国也是实行了社会主义，据说那叫做“自由社会主义”^④。可以看得很清楚，所谓“用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来骗人”，胡适的确是实行了的。

科学的抽象和反科学的抽象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客观事物的本质的反映，是有确定的内容的，是不容许任意滥用的；后者则是对事物的片面的、歪曲的反映，甚至只是虚构出来的，不是为了使

① 《胡适文存二集》，第 150 页。

② 《胡适文存三集》，第 16 页。

③ 同上书，第 18 页。

④ 同上书，第 85 页。



人深刻地认识事物,而只是为了混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利用概念的抽象性而加以颠倒错乱,其目的同样是在于取消科学的认识。

真正的科学态度是在研究任何问题时不但一定要充分地掌握有关的具体的事实材料,而且还一定要力求抓住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发展中的内在规律性。为此,就一定要像毛主席所说的“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①,这才是真正的尊重事实。不这样做,就没有科学。科学的任务就在于发现客观世界的内在的规律,所以科学才能起指导人们正确地进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的作用。胡适反对科学的抽象,就是阻止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发展中的内在规律性,而使人们的认识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的和片面的现象上面,停留在支离破碎的感觉印象上面,从而把人们引导到错误的概念和结论上去。所以胡适的所谓“尊重事实”完全是虚伪的,恰恰和科学态度背道而驰。

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就因为它是从丰富的事实材料出发,而又能彻底揭发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性。毛主席用“实事求是”四个字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是句中国的老话,但毛主席赋予它以新的内容。毛主席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②

当然不能因为胡适有时引用“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就认为胡适的态度同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相同之处。胡适有他自己的解释。例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1页。

②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1页。



如他说：“‘朴学’是做‘实事求是’的工夫，用证据作基础，考订一切古文化。”“人人研究他的小问题……宁可作细碎的小问题，不肯妄想组成空虚的哲学系统”^①。可见胡适所说的“实事求是”也还是要人们只去注意“细碎的小问题”，这是同胡适的根本态度，用片面的表面的知识来排斥对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的根本态度相适应的。胡适又引用过另一句老话“就事论事”，他说：“‘就事论事，细意推求’，这是折狱老吏的态度，是侦探家的态度，也是科学家寻求真理的态度。”^② 这种始终匍匐在个别感觉材料上视之为真理的态度，同我们所主张的根据丰富的感觉材料，发现客观规律的科学态度，是必须严格划分清楚的。

没落的反动的阶级非常害怕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被揭露出来。为了阻止人民群众认识真理，没落的反动阶级的“学者”们就出来叫嚷说，人们只应该把对于事物的表面的零碎的感觉印象当做最高的真实，人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去追求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从对客观的深刻研究中达到的科学的抽象，说成是空幻的、毫无意义的“抽象名词”。这是腐朽资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无赖的手法。胡适又认为，任何事情都不能有根本的解决，根本解决的要求都是虚妄。这种看法也是适合于没落的反动阶级的利益的。只有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才能找到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的正确方法。使人们不可能认识客观规律性，也就是使得根本解决成为不可能。——这就是胡适所谓“尊重事实”，反对“抽象名词”的真正的用意。

但胡适所谓“尊重事实”的反科学性还不仅在于否定科学的抽

① 《胡适文存三集》，第133—134页。

② 同上书，第808页。



象。因为胡适所说的“事实”甚至根本不是指客观的存在。他不仅抹煞了对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而且从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出发而认为,一切现象其实只是主观的产物。——这就是前面所指出的第二点。

通常人们都以为,科学,无论如何总是以客观的事物为研究对象的,是寻求客观的真理的,科学的结论正确与否是有客观标准的;如果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客观的事物,那就会使科学根本不能成立。——这种常识性的想法当然是正确的。胡适这一派人用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魔术来同这种健康的常识作战。这样就把他们同科学为敌的反动面目充分暴露出来了。

为了把主观唯心主义的腐败思想强加于科学头上,他们有一整套的狡猾的手法。我们必须进一步加以分析。

二

在这里,我们要来看一下发生在1923年的所谓“科学”和“玄学”之争。在这场论争中,胡适一伙人自命为科学的保护人,大声叫嚷着拥护科学而反对“玄学鬼”;但从这场争吵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其实是用腐朽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来侮辱和糟蹋科学。

对于这一场所谓“科学”和“玄学”之争,曾经有过一种误解。有人以为当时主张科学的人是用了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同唯心主义做斗争。这是完全错误的估计。胡适一派人在这场争吵中所发表的议论同唯物主义毫不相干,而且他们的反对“玄学”,也并不就是反对唯心主义。

被胡适一伙人称为“玄学鬼”的张君勱固然是个极端反动的、臭名昭著的唯心主义者,他所贩运的是法国的反动哲学家柏格森



的腐朽思想，但胡适一伙人所说的“玄学”并不是指柏格森、张君勱的唯心主义观点。按照他们的用语，凡是对哲学上的根本问题，例如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提出答案的，都叫做“玄学”。胡适曾说，他们实用主义者的态度是把“哲学根本问题一齐抹煞”，“以不了了之”^①。他们把在哲学根本问题上的答案，不管是唯物主义的答案还是唯心主义的答案，一律叫做“玄学”而加以反对，这只是他们回避答复这种问题的卑怯态度的表现。

但是哲学的根本问题是抹煞不了的。在现代思想界中，凡是企图躲开哲学上的根本问题的人，实际上总是在根本问题上采取了唯心主义观点，而且是极端腐败的唯心主义观点。实用主义者正是这样的情形。

在1923年的那场争吵中，代表胡适派出马的主将是丁文江。他避开了正面答复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和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是怎样的根本问题，但他公开招认了他在认识论上的观点乃是唯心主义。在丁文江的题目是《玄学与科学》的文章中，论述了他所谓“科学的知识论”，结论说：“以上所讲的是一种浅近的科学知识论。用哲学的名词讲起来，可以说是存疑的唯心论（skeptical idealism）。”^②从丁文江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所谓“存疑的唯心论”包括这样一些内容：

第一，丁文江说：“觉官感触为我们知道物体唯一的方法。”^③他们把理性思维排斥于认识方法之外，认为知识的唯一内容就是感觉印象。

第二，他们认为人们所知道的物体无非人们的感觉印象，由此

① 《胡适文存》第2卷，第110页。

②③ 亚东图书馆编辑：《科学与人生观》，第12页。



他们进一步说,并没有什么客观存在的物质,物质就存在于人们的
感觉中。丁文江这样说:“我们之所谓物质,大多数是许多记存的觉
官感触,加了一点直接觉官感触。假如我们的觉官的组织是另外一
个样子的,我们所谓物质一定也随之而变。”^①

第三,他们认为,在感觉印象以外是否还有客观存在的世界,
那是不可知的。所谓“存疑”,就是不可知的意思。丁文江这样说:
“离心理而独立的本体”是“存疑唯心论者所认为不可知的”,应该
“存而不论”,那是“不可思议的东西”^②。

第四,既然他们认为,世界的“本体”是不可知的,而物质其实
是人们的主观的感觉印象,那么科学的任务,在他们看来,就不是
去研究和发现客观存在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科学的对象也不是客
观存在的物质。丁文江说,“科学……以心理上的现象为内容”^③。
这就是说,科学不过是把人所有的各种感觉印象加以排比,并且制
造出种种概念和推论来,这一切是否同客观实在相符合是用不着
管的。

第五,他们认为,科学知识能够为人们公认,并不是因为这些
科学知识有客观真实性,而是因为除了疯子痴子以外,一般人的感
觉和想法是相同的。丁文江的说法就是,“凡常人心理的内容,其性
质都是相同的”,所以“科学的真相,才能为人所公认”^④。区别各种
知识的真伪,也不是看它们是否符合实际,而只是看它们是否“自
相矛盾”,能不能“从不反常的人的知觉推断出来”^⑤。

读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人立刻就能知道,

① 亚东图书馆编辑:《科学与人生观》,第7页。

② 同上书,第13页。

③④ 同上书,第10页。

⑤ 同上书,第11页。



这些观点无非是在列宁的这部光辉著作中彻底驳斥了的马赫学派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复述。丁文江的文章也明白地承认，他的说法是根据马赫和在思想上类似马赫的其他一些“科学家”、“哲学家”，包括美国的实用主义者詹姆士和杜威等而来的。

在胡适的许多谈哲学的文章中，虽然竭力把自己的观点说成是超乎唯物、唯心以上的，而且有时还盗用“唯物”做招牌，但是他的哲学观点同丁文江的观点是完全一样的。他们拜了同样的师傅，他们在政治活动上完全一鼻孔出气，所以他们也宣传同样的哲学。胡适在鼓吹他从美国贩来的实用主义思想时，也把感觉看作知识的唯一内容，并否认感觉知识的客观性，而认为这只是主观的东西；他也否认真理的客观标准，也把不可知论当做自己的思想的一个支柱。

为什么这一套观点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呢？

对于感觉，有唯物主义的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了解。

人们的常识总是以为，一定要存在着某种客观的东西，人们的感官中才会有某种感觉印象。外界有个苹果，我们的眼睛看到，才发生了苹果的感觉。这种常识的看法是正确的。从物质到感觉——这是唯物论对感觉的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就是指出客观存在的物质乃是感觉的源泉。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还指出，感性知识有提高到理性知识的必要，理性知识能够更深刻更完满地反映客观存在。哲学史上有一派经验主义者，虽然承认感觉的源泉是物质（因而他们是唯物论者），但他们只承认经验（即感性知识）是可靠的知识，而否认理性知识。这种经验主义的唯物主义不能够完全地解释认识的过程，所以就不能真正战胜唯心主义，反而有陷入唯心主义的危险。

感性知识还不能把客观存在的全部的深刻内容反映出来，个



别的片断的感觉印象时常是皮毛的，甚至有时还会是歪曲的。主观唯心主义这就利用这种情形而把感性知识解释做完全是主观的产物。因为他们否认了物质是感觉的源泉，所以他们就是唯心主义者。他们说，当人们自以为看到一个苹果时，其实不过是人们有了一个苹果的感觉，这种感觉并不能表明外界真有这样的一个苹果。他们说，人们不过是把自己所有的红色的感觉、香味的感觉等等综合起来，就称之为苹果。由此他们达到这样的荒谬的结论：人们的感并不由客观存在的物质引起的，反而是，所谓客观存在的物质其实是由人们的感所组织成功的。这样他们就从认识论方面达到了不是存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存在的结论。因为他们所说的决定存在的意识是每个人主观的感，所以是主观唯心主义。只是为了避免陷入完全无法自圆其说的境地，又用不可知论来补充这种物质由感组成的论点。他们说，人所知道的物质都是由感组成的，至于在感以外是否有客观存在的物质，它们是怎样存在着，那是永远不可能知道的。

胡适、丁文江就是用这样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来根本否认对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

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又敢于自称拥护科学，并且装模作样地出来反对张君勱那样的唯心主义呢？这两派的区别究竟在哪里？他们争吵是因为什么？

为了说明这种争吵的真相，还要从前面说过的抽象和具体的问题说起。原来抽象和具体是个哲学上的老问题，一切唯心哲学总是利用这个问题来制造他们的理论。抽象的概念、法则本来是从具体现象中概括出来的，但各派唯心论者都把抽象和具体看作各不相关的对立体，这样来玩出各种不同的花样。

有一些唯心主义者认为抽象观念并不是从具体事物中概括出



来,而是独立于一切具体事物之外的。于是他们制造出了“绝对观念”、“宇宙精神”、“上帝”这一类神秘的观念,并且宣布世界的本体就是这种超自然、超人类的精神作用,而可以感觉到的物质世界反而是虚幻的,是从抽象观念中派生出来的。

客观唯心主义大体上是走这条路来制造他们的“理论”。在胡适、丁文江看来,这已经是过了时的唯心主义哲学。这种老派的唯心主义在科学面前实际上采取了缩小地盘的政策,他们把可以感觉到的世界让给科学,而自居于所谓“形而上”的神圣而空幻的殿堂里。张君勱所作关于“人生观问题”的文章宣布说,科学虽能处理世间万事万物,但“人生观问题”,因为是“主观”的,是涉及“自由意志”的,所以科学管不着,只能由唯心主义哲学来主宰。这种说法引起了胡适、丁文江的不满,他们想运用另一种形式的唯心主义,采取更狡诈的新的战略,来为唯心主义收复失地,扩大地盘,以至统一天下。

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在欧洲哲学史上开始于古代希腊的柏拉图(公元前4世纪),所以可说是很古老的形式。19世纪初叶的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是个客观唯心主义者。现代帝国主义的反动的腐朽的哲学思想也有采取客观唯心主义的形式,如张君勱所贩运的柏格森的神秘主义思想就是其中之一。但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更流行的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现代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发源于18世纪初叶英国主教贝克莱。19世纪奥国的哲学家马赫在科学的名义下发挥了这种陈腐的思想。这种思想受到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宠信。现代帝国主义国家中的许多“时髦”的哲学流派,包括美国的实用主义,都采用了这种观点。胡适一派人乃是这一种帝国主义的哲学思想的买办。

以尊重经验为名义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也把抽象和具体绝对隔



绝开来,但采取了同客观唯心主义相反的形式。他们首先宣布一切抽象都是虚假的,然后又把具体的东西归结为人的感觉经验,并把感觉经验解释为纯粹主观的东西。他们向科学说:科学不是要取得最实在可靠的东西么?但除了感觉以外,人们是找不到任何物质的,感觉就是物质。科学不是要发现规律性么?感觉的排列次序就是科学的规律性。他们的结论是,科学为了不成为“玄学”,就不应当妄想探究客观世界的真相,而只应当把“心理上的现象”当做研究的内容,也就是只应当按照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世界。

简单说起来,他们就是用这种诡诈的说法来企图使科学变成主观唯心主义的工具,并且利用科学做招牌宣传唯心主义。

他们既然用唯心主义糟蹋了科学,他们就可以放胆地高喊“科学万岁”,宣布“科学万能”了。因为在他们的“科学”所到之处就是唯心主义所到之处。丁文江正是用这种腔调来驳斥张君勱的,他说,人生观固然是主观的,但科学并不因此而不能过问人生观,因为科学的内容本来就是主观的。

所以张君勱和胡适虽然都是唯心主义,但一边的做法是同科学抢地盘,而另一边的野心是要俘虏一切科学,——所谓“科学”和“玄学”之争的真相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胡适一面说“尊重事实”,一面又说,“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①,这两种说法在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下是并不矛盾的。因为“事实”、“实在”和主观的感觉印象在他们看来,是同样的东西。

所以胡适又说,一切科学法则都不过是人们为了方便起见造出来的“假设”,也就是说,都不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照他说来,连

^① 《胡适文存》第2卷,第106页。



地球绕日而行也只是一种“假设的解释”。他说：“科学律例”“不过是人造的假设用来解释事物现象的，解释的满意，就是真的；解释的不满人意，便不是真的，便该寻别种假设来代他了。”^①这种赤裸裸的反科学的说法表明了他所吹嘘的“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的真相。按照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说来，科学法则无非是人的种种感觉的排列次序，所以都只是主观的假设；某种假设能否成立，并不决定于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而决定于它是否能使人觉得满意。

不但在 1923 年的这一次争吵，而且在其他许多场合，胡适都愿意标榜他的思想是同“正统”的唯心主义思想相对抗的。例如他说：“我们人类所要的知识，并不是那绝对存立的‘道’哪，‘理’哪，乃是这个时间，这个境地，这个我的这个真理。”^②又例如他说，清朝汉学家的“科学态度”就在于他们不像宋朝理学家那样“妄想组成空虚的哲学系统”，妄想“那‘一旦豁然贯通’的绝对的智慧”，而是“逃虚就实，宁可做细碎的小问题”，所求的是“这物那物的道理”^③。这一类的说法的用意都是想迷惑人，使人以为他是反对唯心主义的，但实际上，他只是想抛弃掉一种不时髦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形式，而偷偷地输入一种比较时髦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形式。所谓“绝对存立的道”，“空虚的哲学系统”等等固然是唯心主义骗人的魔术，而主观唯心主义者的“感觉”、“经验”同样也是否定客观知识的邪说。

这种时髦的唯心主义哲学乃是唯物主义的更狡猾的敌人，也是科学的更恶毒的敌人。

① 《胡适文存》第 2 卷，第 78 页。

② 同上书，第 81 页。

③ 同上书，第 3 卷，第 134 页，第 2 卷，第 209—210 页。



三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看到,胡适在拥护科学的名义下歪曲和诬蔑科学的根本办法就是:不但抹煞作为客观现实的深刻反映的理性认识,而且取消感性认识的客观内容。这样就从根本上否认了知识的客观性。

在现代的历史条件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特别是在认识论问题上展开了极其尖锐的斗争。这方面的问题,对于科学是有关生死存亡的问题。

自然科学按其本性说,是以自发的唯物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自然界的。自然科学的每一步的进展,不能不是对于唯心主义哲学的驳斥。唯心主义思想总是利用科学不发达的状况,利用科学发展中发生困难的状况而进行欺骗的宣传。由胡适派所贩运到中国来的这一派主观唯心主义的恶毒,就在于它钻到了自然科学的里边,来破坏那种自发的唯物主义倾向;它用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来把人取得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的途径都作了主观主义的歪曲,从而否定了认识客观世界真相的可能,使自然科学自动放弃对客观规律性不断地探求。

不用说得,这种代表腐朽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在社会历史问题研究的领域内,也不能不是真正的社会科学的死敌。

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能够指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向前发展的完整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不断地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成就来充实自己,它是各门科学的成果的哲学的概括和总结,因此它对于任何部门的科



学都是唯一可靠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同研究各种自然界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各门科学相对立,也不代替它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客观规律的,所以是科学的哲学,它同各门具体科学的不同在于它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社会和认识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证了自然界和社会的客观规律性的存在,并且证明,这种规律性,亦即客观世界的本质是人所能够认识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认识的理论,粉碎了唯心主义哲学所布下的用来限制人的认识的各种迷阵,深刻地阐明了人如何一步步地接近客观真理和掌握客观真理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指出,物质是不依赖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存在的物质是人的感觉和思维的源泉,人的感觉和思维是客观存在的物质的反映。感觉是人取得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的最直接的通路。感性知识虽然还不能完全地深刻地反映客观世界,但是感觉是具有客观内容的,感性知识中包含着对客观现实的真实的反映。以感性知识为基础而上升到理性知识,人就有可能取得对于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知识,也就是有可能取得科学的知识。

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的理论进一步粉碎了一切唯心主义者的谎话。人通过社会的实践活动来影响客观世界,促成周围现实中的改变。这种实践活动是认识发展的基础,又是认识的客观标准。实践不但表明独立于人的意识以外的客观世界的存在,而且当人们根据自己对客观现实的科学认识而进行的实践活动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时,就无可怀疑地证明了这种认识的正确性。社会实践的发展保证了人能够一步深入一步地取得对于客观世界的一切方面的本质和规律性的科学认识。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给唯心主义者的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



和不可知论以致命的打击。可以设想，唯心主义者是不会不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拼命的挣扎的。

各派唯心主义者对实践进行各种形式的曲解。由胡适所贩运来的实用主义是采取“鱼目混珠”的诡计，他们企图拿资产阶级的卑鄙的实用的观点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观点。

胡适把实用主义称作“实验主义”。他说实验主义的根本态度就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因此他吹嘘说：“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① 什么叫做“科学试验室的态度”呢？胡适说：“实验主义绝不承认我们所谓‘真理’就是永久不变的天理；他只承认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他能不能发生他所应该发生的效果。这就是‘科学试验室的态度’。”^② 所谓“科学试验室的态度”按照胡适这一派人的解释，就是一切决定于“效果”的态度。

毛主席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③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胡适他们所说的“效果”恰恰不是指客观上的结果，而是指对人有没有用处，亦即人是否觉得有用。——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实用主义者所说的“科学试验室的态度”，其实是，企图用腐朽资产阶级的个人利益来作为“真理”的标准。他们说，要判断一种思想理论是不是真实的，并不看它是否符合于客观事实，而只是看它是不是对人有用。有用的就是真的。胡适说：“真理不过是对付环

① 《胡适文存》第2卷，第83页。

② 同上书，第80页。

③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4页。



境的一种工具”^①；“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②。这就是胡适所说“假设真不真就看他能不能发生效果”的意思。

很明显的，这种态度完全适合于腐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胡适用所谓“应该注意每种学说已经发生的效果”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不问这种学说是否符合于事实，他只是说：“这种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③ 胡适觉得这种“效果”很不好，所以他就认为这种学说是不对的。

实用主义者把这种观点叫做“科学试验室的态度”是对于科学的侮辱。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中的劳动是应该受到尊重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试验、科学观察是作为认识的客观标准的实践的一种必要的形式。当然，人的社会实践是极为广泛的，包括生产活动和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等等，不能用科学试验来概括。但必须指出，胡适的效果论和真正的科学试验也并不是一回事。

胡适在说到灵魂这种“神秘玄妙”的东西究竟有没有的时候，曾说：“既是‘神秘玄妙’，显然不能用科学试验来证明他，也不能用科学试验来驳倒他。既然如此，我们只好用实验主义的方法，看这种学说的实际效果如何，以为评判的标准。依此标准看来，信神不灭论的固然也有好人，信神灭论的也未必全是坏人。……总而言

① 《胡适文存》第2卷，第81页。

② 同上书，第101页。

③ 同上书，第196页。



之，灵魂灭不灭的问题，于人生行为上实在没有什么重大影响；既没有实际的影响，简直可说是不成问题了。”^①这就分明地招认，所谓“看实际效果”的“实验主义方法”，并不是科学试验，而不过是反动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卑鄙利益来颠倒是非的主观主义的方法。依照这种方法，如果不相信灵魂的人都是胡适所说的“坏人”，胡适就一定要承认灵魂不灭了。

这种否认客观真理的资产阶级的“实用”观点，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真理的标准的观点当然绝不是“差之毫厘”，而是根本上南辕北辙，显出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条对立的路线。

由此可见，胡适是为了达到反科学的目的，为了否认知识的客观性，否认客观真理，所以才把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引进了科学里面，对感性知识、理性知识和作为真理的标准的实践作了极大的歪曲。既然如此，当我们看到胡适在认识论问题上有时索性把经验主义的伪装也丢掉，采用了某些更直接地反科学的因素，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

胡适在说明他对于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的意见时说：“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工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②。原来胡适的所谓“科学方法”就是一方面限制于细小的考订工作，这叫做“精密的功夫”；而在另一方面，又容许凭“想象力”来虚构历史的系统，而且认为历史系统是只能靠“想象力”来“构造”的。对于这种虚构出来的“历史系统”，寻找个别材料来“证明”，就是胡适所说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

① 《胡适文存》第4卷，第107页。

② 《胡适文存二集》第1卷，第22页。



学方法”。

胡适又说，他的所谓“科学方法”并不同柏格森一派人所说的那种超乎经验和理性之上的“直觉”相对立。柏格森认为，只有靠这种神秘的“直觉”，人们才能认识世界的“本体”，而胡适说：“近代科学思想早已承认‘直觉’在思考上的重要位置了。”^①

四

如果认为胡适派用主观唯心主义加于科学的诬蔑和曲解，对中国学术界没有起什么影响，是不符合事实的。

不承认客观规律性，不承认科学的任务在于如实地认识对象的本质的这种观点，对于社会历史研究方面所起的破坏作用，是很明显的。

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的发现，对于没落的反动阶级十分不利，所以胡适派思想根本否认社会历史现象有其客观规律性。他们把个别材料的考订和对文献的校勘当做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再加上主观的附会和武断，这就在根本上使得社会历史的研究不可能成为科学。

接受了胡适派思想的影响，就会弄到用零碎的历史材料的考证和堆积来代替对历史的真正科学的研究，他们或者完全放弃了阐明历史规律的要求，或者只是按照自己的方便和需要而任意地“假设”和“构造”历史的规律。

在这里，我想，还应当指出，中国自然科学界中也曾长期地受到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

^① 《胡适文存二集》第1卷，第276页。



在旧中国的社会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对自然科学家还不容易发生直接的影响。许多自然科学家往往不自觉地为资本主义世界中坏的时髦的哲学所支配,因而他们在自然科学工作中的自发的唯物主义倾向在某些方面被他们所接受的唯心主义哲学所压倒,这种情形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胡适一派人在科学界中有意识地宣传腐败哲学思想更加阻止了科学家接近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

在过去的年代里,国内的自然科学方面的出版物中,凡是谈到科学理论的,可以说,绝大部分都是引述马赫、普恩凯莱(法国人),皮耳生、汤姆生、罗素(均英国人),詹姆士、杜威(均美国人)等人的议论。胡适一派人的所谓“科学的知识论”也就是从这一些欧美资产阶级的“哲学家”、“科学家”那里得来的。这些资产阶级学者的思想反映着在帝国主义国家内的科学的危机,他们企图把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把否定真理的客观性的观点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这种腐朽思想在中国的影响是不应当低估的。当然,一般自然科学工作者并不是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积极宣传者,在政治上也同胡适派不同,但他们中的有些人在解释科学知识的性质,因而接触到哲学问题的时候,常常成为唯心主义的俘虏。现在,试从手边找得到的属于科学概论性质的几本旧书中,举出若干实例。

1926年,中国科学社出版了一部《科学概论》,其中讨论了科学真理的意义,并说明是根据了接近马赫学派的法国科学家普恩凯莱的见解。书中说:“科学上的真理不是说实际是这样,而是说大家见得这样。”^①又说:“科学的目的是,把事物的关系做一个简单

^① 任鸿隽:《科学概论》,第54页。



的完全的无矛盾的叙述。”^① 因为是仅仅叙述，所以“就究极而言，科学原来不能解释什么东西”^② 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使自然科学家如此地丧失了对于科学知识的信心。

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已故的科学家王星拱著的一本《科学概论》。从这本书可以看出，作者是接受了把一切外物看作由感觉构成，而人的主体也同样由感觉组成的观点。他说：“现在的科学把许多向来所承认为客观的存体，例如时间、空间，都简约而为器官的感触，即如物质、能力也……并不是客观的实在。外而物是如此看待的，内而我又何曾不可以如此看待呢？”^③ 在这里，同时根据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来企图说明主观和客观没有任何区别。他对于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的思想也表示赞赏：“……所以罗素说：心也不是实在的，物也不是实在的，只是感触是实在的。这才真实物我一体哩。”^④

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列入《百科小丛书》的一小册《科学概论》（已故的科学家郑太朴著），其中认为：“科学中有玄学的成分，并且是不可免的”^⑤，“这些玄学的成分或先天知识，与通常所谓用严密方法求得者不同；他是先乎我们的研究，早已存在，并为我们思想上所时刻不能离的；换言之，这种知识不是求得的，而是先存的，他不是研究之结果，而是研究之先设的基础。所以我们不能把他列在科学知识内，而视为超科学的玄学原则，并因为他是科

① 任鸿隽：《科学概论》，第57页。

② 同上书，第61页。

③ 王星拱：《科学概论》，第269、277页。

④ 同上书，第270页。

⑤ 郑太朴：《科学概论》，第19页。



学之基础,故名之为科学之玄学的成分。”^①这本小册子所表示的态度同主观唯心主义的科学论虽有所不同,但也明显地受了另外形式的唯心主义的影响。这里承认了“先天的知识”,而且认为这种神秘的知识乃是科学的基础。这就向唯心主义做了很大的让步。

以上这几本书可以表明,唯心主义对科学的观点在中国科学界内曾经是颇有市场的。

自然科学家如果为唯心主义哲学所俘虏,不但会使他们对周围的社会环境不可能有正确的认识(这正是反动资产阶级要在自然科学家中宣传唯心论的主要目的),而且也不能不严重妨害他们深刻探索自然界真理的努力。

向一切形式的毒害科学发展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作斗争,就是我们的任务。

原载《人民日报》1955年2月17日。

^① 郑太朴:《科学概论》,第20页。



消除落后推动前进 是领导的责任

近几年来,各工业部门的各个企业在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试制和生产新产品等方面都作了努力,有了进步。但是应该指出,并不是所有的企业的现状都是令人满意的。有的企业进步得很快,有的企业进步得很慢很少;有的达到了较高的指标和定额,有的则达不到,或者差得很远,停留在落后的水平上。这种情形应当引起各工业部门以及党和工会的领导机关的严重注意。

这里举几个轻工业部门的例子:在轻工业部所属各造纸厂中,石砚造纸厂制造胶版印刷纸单位成本为 672.69 元,而吉林造纸厂则为 1104.73 元。在轻工业部所属各造肥皂的工厂中,天津油脂化学厂的脂肪酸回收率是 75.3%(据 1955 年 1 月到 9 月间的材料),而上海各厂却能一般做到 99% 以上的回收率。(天津厂是用皂脚做原料,但回收率也不应相差这样大。)地方国营企业中,苏州玻璃厂所制五磅热水瓶胆合格率为 93.84%,而旅大玻璃厂就只有 81.8%(据 1955 年 11 月份的材料)。

在其他工业部门也有这种情形。如水泥工业增加生产的一个重要方法,是提高水泥窑的安全运转周期。在这方面,国营广州水泥厂从 1950 年到 1954 年底,水泥窑安全运转期最低的为 136 天,



最高的达到 367 天；在 1954 年一年中，这个厂由于长期安全运转给国家增产了 3000 吨水泥，并节省了大量修理费。可是全国其他的国营水泥厂，在 1954 年平均的安全运转周期只达到 43.9 天，1955 年上半年只达到 38.5 天。

对待这种情形，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种态度是容忍落后，找出种种理由来为落后辩护，例如有这种种说法：“这个企业虽然现在落后，但比前几年总算提高很多了”，“按照这个企业的条件，达到这样的指标已经很不错了”，等等。

另一种态度同前一种态度恰恰相反，认为落后现象是可以消除和应当消除的：既然有一个企业的生产能够达到先进的指标和水平，那么生产条件类似的企业也一定能够经过努力达到同样的指标和水平；如果条件不同，那么就应当尽可能改变那种阻碍生产发展的条件，创造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条件。

领导者必须从这两种态度中选择一种态度。这是领导者站在什么位置上的问题。领导者如果看不见或不重视先进的事物，而容忍落后的事物，那就不是把自己的位置摆在先进的水平上而是摆在落后的水平上。大家知道，把自己的位置摆在落后的水平上的领导就是保守主义的领导，也就是取消领导，放弃领导。只有把自己摆在先进的水平上，促进落后的事物赶上并超过先进，才是正确的领导，强有力的领导。在一切工作中都是这样，在领导工业生产中当然也应当是这样。

现在各工业部门的领导并不都能够常常是明确坚定地采取这种正确的态度。事实证明，如果领导者不支持先进的事物，不批判落后的事物，或者虽然支持了，批判了，但支持得很软弱，批判得很软弱，那么落后现象就会长期存在，而工业发展的速度就会受到影



响。事实也证明，如果领导者认真去研究先进企业之所以先进的原因，落后企业之所以落后的原因，切切实实地、雷厉风行地奖励先进，鞭策落后，充分地发扬和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且创造各种条件使落后的能够赶上并超过先进，那么，事情就会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各个企业就会生气勃勃地向前发展，不但落后的能够进步，而且先进的也能够继续争取进步。

造成某些企业中的落后现象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有些企业生产比较落后，可以说是由于一些属于客观条件的因素造成的，例如技术装备较旧、较差，原材料的来源距离远，运费高，原材料质量较差，等等。但是，这些客观条件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为了尽可能改变这种条件，往往需要领导者采取一系列的基本措施，如协同有关方面尽可能地建立距离较近的原料基地和改进原料质量，以及切实研究怎样发挥现有机器的最大效能等，有的并且应当用新机器来代替旧机器，必须有计划地加以改换。在有条件改用新机器的时候不改换，永远使用落后的设备是不对的。有人认为，落后既然是客观条件造成的，那就无能为力，因而明明可以改变的条件也不去设法改变，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

但是，生产上落后的更普遍的原因是在于企业管理工作的落后。有些企业客观条件很好，但由于生产管理、财务管理、技术管理做得不好，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没有发挥出来，以至在生产上落后。有些企业既有客观困难，又放松了管理工作的改进，那就更加深了落后。使管理工作落后的企业都努力提高管理水平，向先进的企业看齐，这是没有理由做不到的。在这方面，各工业部门以及党和工会的领导机关的责任就是要用切实有效的办法来推广先进的经验，有力地督促落后单位去学习，就是要使得落后的单位感到有一种压力，非前进不可。如果落后单位可以心安理得，我行我素，那



就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反之,落后者感到不安,感到如果不急起直追,就有被淘汰的危险,这才正是我们的社会制度下的正常的现象。

为了彻底改变那种好的不奖励、坏的不批评的保守主义作风,所有工业部门都必须对所属企业进行认真的督促和检查。对于在技术改革、生产管理、操作等方面确实是先进的单位和个人,都应当给予适当的奖励;对于一些长期保守落后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必要的批评;而对于坚持落后、造成重大损失的领导者,就应当给以一定的处分。在一个工业系统内发现先进的单位,应当马上进行检查总结,推行这个先进单位的经验,派先进者到落后的单位去传授,或者落后的单位派人到先进的单位去学习,并限期学好。各个工业部门应当立即认真总结出本部门行之有效的先进经验,并且作出规划,分别情况,派人下去帮助,限所属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学好;应当广泛地开展同产业的厂际竞赛和同工种竞赛,把群众性的竞赛作为鼓励先进、消除落后的重要方法。在这些工作中,党和工会组织必须动员群众同各工业部门和企业行政方面协同一致地去做,充分地发扬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各地报纸也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和批判。我们只有抛弃那种懒洋洋的保守作风,而实行果敢的社会主义的作风,才能把事情办得快、办得好。

消除落后,使落后赶上先进水平,这不是一时一地的事情。在社会生活发展中总是经常存在着先进的事物和落后的事物。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在先进和落后的斗争中不断地用先进来带动落后,落后的不断地赶上先进。今天这样高的标准是先进,明天要更高的标准才是先进。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就是这样地一天天向前发展,我们的社会生活就是这样地一天天向前进步。因此不断地推广先进经验,不断地用先进的水平来要求落后者紧紧追上去,这



是符合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领导方法。只有这样的领导才不是脱离群众的领导,而是同群众密切结合、能鼓舞群众前进的领导。我们现在是在为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努力,我们一定要学会这种领导方法。

这是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是根据刘少奇同志的要求和意见写的。原载《人民日报》1956年1月25日。



向列宁学习怎样进行思想斗争

伟大的列宁在他一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同各种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潮和在工人运动中的各种机会主义思潮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列宁在实际问题和在哲学战线上全面地展开了这种斗争。列宁所进行的思想斗争和理论斗争都是从革命实践的需要出发的,是为了划清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为了推进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列宁为了彻底粉碎各种敌对思想,常常在很困难的条件下从事巨大的科学工作。在列宁所遗留下来的许多论战著作中表现着尖锐明确的原则性和使人信服的逻辑力量。通过对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列宁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充分显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永远向前进展的生气勃勃的力量。

列宁早年的著作已经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结合的要求,并且按照这种要求进行了反对民粹主义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列宁一方面驳斥了民粹派的主观主义社会学观点,一方面又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民粹派否认俄国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着的事实,从而否认工人阶级是先进的革命的社会力量;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则在承认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时,站到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立场上面。当时列宁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根据客观事实来立论的,所以可以说,“唯物主



义者贯彻自己的客观主义，比客观主义者更彻底、更深刻、更全面”；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是公开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的，“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在对事变做任何评估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①。

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观点出发，不能解决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结合的问题。小资产阶级革命家把革命性建筑在主观主义的空想上面，而由于他们背离了科学性的原故，他们的革命性也就会变成空谈。同时，那种没有革命性的理论，即使能够如实地承认某部分的事实，也不能全面揭发事实的本质和发展的趋势。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真正把高度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科学性结合起来，而且像列宁所说的，“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② 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目的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是同彻底揭发社会历史的全部真相的科学态度一点也不矛盾的，而且只有坚持高度科学性的理论才真正有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一切思想斗争和理论斗争都不能脱离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结合的原则。如果在要求科学性的名义下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那在实际上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平共处，取消了思想斗争。反之，如果不是把尖锐的思想斗争摆在科学性的基础上，而是用简单的抹杀态度对待思想的敌人，就一定不能取得应有的战果。“不讲道理”的思想斗争从来是不能说服人的。我们

①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363页。

②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91页。



必须反对取消思想斗争,同时必须坚持用真正科学的态度来进行思想斗争和理论斗争。列宁在这方面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这是我们必须认真学习的。

列宁从来不是从什么抽象概念出发来辩护自己的纲领和主张,来驳斥敌人。他所依靠的是客观的事实,是对事实的全面的、科学的分析。例如,大家知道,列宁为了驳倒民粹派的观点,以大量事实材料为依据进行了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科学研究;列宁在《帝国主义论》这部高度科学性的著作中彻底揭穿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的谬论。正确的为什么是正确?因为它符合于实际;错误的为什么是错误?因为它违反实际。这是真正的科学态度。

俄国的民粹主义者曾经想把马克思主义描画成是从某种绝对的抽象的公式出发的理论。列宁坚决否定了这种诬蔑。列宁当时说:“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无疑地只是借用了宝贵的方法,没有这种方法,就不能阐明社会关系,所以他们在评判自己对社会关系的估计时,完全不是以抽象公式之类的胡说为标准,而是以这种估计是否正确和是否同现实相符合为标准的。”^①为了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相联系的科学态度,列宁在反对民粹派的斗争中还特别引用了普列汉诺夫的话:“我们决不想以伟人的威信”(即马克思的威信)“来掩护自己的纲领”。

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做死板的公式是教条主义的态度。教条主义者破坏了理论和实际的联系,也就是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

^①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162、163页。



科学性。教条主义者离开了文献的引证不能走一步路，在思想斗争中至多也只是在所谓“伟人的威信”的掩护下发出不能致敌死命的呐喊。跟教条主义完全不同的列宁的作风才真正是能够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的战士的作风。

列宁在思想斗争中的科学性还表现在他对待各种反动思潮本身，也是采取严格的科学态度的。不论怎样错误的观点，如果成为一种社会思潮，那就决不会是由于个别人的意志而产生。它为什么会产生和发展，一定是能够给以科学的说明的；这种科学说明就会使人们看到怎样去同错误思潮斗争以及怎样才能够把它彻底战败。

列宁把分析各种反动思潮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必然的要求。列宁在跟自称为“人民之友”的民粹派作斗争时曾说：“如果我在批评‘人民之友’的观点时，只是把他们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加以对照，那就会是背离了唯物主义的方法。所以还必须把‘民粹主义’思想说清楚，指明这种思想在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关系中的物质基础。”^① 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后的年代里，列宁展开了对于在俄国和在国际间出现的修正主义潮流的有力的抨击。列宁当时指出：“修正主义的不可避免，决定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根源。”^② 列宁具体地分析了各种修正主义的阶级根源，证明它不是偶然的暂时的现象，使人看到，为克服修正主义，必须进行严肃的斗争。

对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占着统治地位并

①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全集》第2版第1卷，第200页。

②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列宁全集》第2版第17卷，第18页。



在大战一开始后转向社会帝国主义立场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列宁在充满愤怒地揭发他们的罪恶的时候，也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他们进行了分析。列宁在1915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必须认真研究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潮的历史根源、条件、意义和力量。列宁又说：“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①像大家所知道的，列宁深刻地指出在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时期形成了产生机会主义的基础，而在一个新的时期即革命行动的阶段到来的时候，机会主义统治的崩溃也将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不但机会主义思潮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且反对这种思潮的斗争也是有可靠的社会历史基础的。

列宁所做的这些分析，很明显地，是完全有利于展开思想斗争的。反之，如果不做这种分析，各种反动思潮就会成为好像是不可理解的，偶然地出现，也将偶然地消失的现象，因而在实际上就会达到它们是不可克服的结论，只好坐待它们自生自灭。

列宁之所以总是能够对各种错误思想打击得十分准确而深刻，还因为他在驳斥这些错误思想的最后结论的时候，深刻地剖析了这些错误思想所依据的似是而非的前提。有许多错误思想，虽然其最后结论的荒谬程度几乎不值得一驳，但是仍能靠它的片面性的根据而使人迷惑。彻底地驳倒这种片面性的根据，才是真正解除了他的武装。

列宁对于唯心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根源的揭发就是一个榜样。列宁指出，从简单的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唯心主义哲学不过是毫无意义的东西，但辩证唯物主义者却能看出，唯心主义哲学乃是对认

^① 《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64页。



识过程中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片面地夸张的结果。“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①。显然,只有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才能真正给与唯心主义哲学的本质以科学的分析,才真正能给它以致命的打击。列宁的名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是这样做的。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深入到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内部,指出主观唯心主义者怎样地从对于认识过程的片面的了解而构成他们的荒谬的体系,这个体系的内部各个论点怎样地互相矛盾。列宁通过这种批评全面地阐明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一致性,因此在这部著作中,不仅彻底摧毁了唯心主义的体系,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了新的发展。

像在哲学上一样,在实际革命运动中,如果把复杂的实际生活中的一个侧面孤立起来,夸大起来,就会得出各种机会主义的结论。列宁曾指出,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只抓住工人运动中的某一方面,把片面观点发展为理论”^②。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们的骗人本领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变成僵死的教条,片面地夸大个别的合于他们心意的事实和斗争形式。针对这种情形,列宁反复申述,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并且说:“……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③。

在批判错误思想时,揭露其思想方法的根源,就使得批判具有充分的说服力量,使得群众易于摆脱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

① 《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11页。

②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67页。

③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列宁全集》第2版第20卷,第84页。



必须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理论工作,才能很好地进行同错误思想的斗争,这是我们从学习列宁的榜样应当得到的结论。

在我们的理论工作队伍中,教条主义有着重大的危害。我们有些同志在研究问题时,很少从占有大量材料,进行具体分析下手。对于许多实际问题,好像都早已有了现成的结论,人们的任务只是为这些现成的结论填上例证。有人好像认为最有力的论据并不在事实中,而在书本上,因而他们愿意用引证别人的话——权威的以至并不权威的话,来代替从实际出发的独立思考。另一方面,也有些人自以为是独立思考,但他们是脱离实际凭空地揣测和猜想。在教条主义的习气下,必然产生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化、片面化的现象。我们有时不顾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简单化地了解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正确和错误的区别,把这种区别中的个别要素片面地绝对化起来。这样做,只能使我们自己走到错误的路上。教条主义的习气也反映在思想批判工作中。我们近年来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是有很大意义的。但是我们的批判往往还不够准确和有力。我们多半只限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同错误的结论作简单的对比,而没有深入地给错误理论以科学的分析,有时还由于没有充分掌握有关的材料,没有充分研究辩论的对象,因而对于某些有关的具体事实和对方的论点说得不够准确。我们有时把批判的对象说成是既无社会根源又无理论根据的疯狂的呓语,这只能使人觉得进行这种批判是多余的事情。有人好像以为,在同敌对思想作战时,可以不必重视科学性——只要打得狠,哪怕打得不准也可以。但确实要打得狠就必须命中要害,打得不准也就不会狠。如果因为对论敌没有做全面的分析,以至自己正面的论点也陷入一种片面性,那就更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了。

理论必须和实际生活密切结合着,才能对实践起作用。理论也



应当能够随着实践的进展而不断地有新的创造。我们党在理论上提倡的方针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针，这是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在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基础上才有高度的科学性，也才有高度的革命性。按照这个方针，我们就应当像列宁所说的那样，一方面，坚决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拥护这个具有起码理解力的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理论，反对毫无根据的攻击，反对败坏这个理论的企图”；另一方面，“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① 学习列宁的作风来进行思想斗争和理论斗争，并且不断地向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应当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原载《人民日报》1956年4月22日。

^① 《我们的纲领》，《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161页。



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

——论现代中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学
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观念

马克思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应用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来,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发现客观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这样,就使得社会历史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过去有许多历史学家虽然不能建立完整的历史科学,却也提供了具有科学性的研究成果。无论在中国和外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在历史科学的发展中都有重要的贡献。但是处于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资产阶级越来越丧失了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真相的自信,越来越趋向于粉饰和捏造事实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现代欧美资产阶级历史学制造了许多混乱观念,这些混乱观念也反映到了现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中。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就应当一方面很好地继承和吸收以往一切历史学家的工作中的有益成果,一方面要批判和扫除足以妨害历史科学发展的混乱观念。

很多现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著作试图答复历史学是不是一种科学和怎样才能成为科学的问题,但是找不到正确的答案。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几种错误的观点:一种是根本否认在社会历史



的发展中有客观的规律,因而否认历史研究能够成为科学;一种是把历史学说成就是史料学,从而取消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求;还有一种是认为历史学乃是一种“主观”的学问,是没有客观标准的“科学”;最后还有一种观点是企图把生物学引导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来,以为这样就有了历史科学,但实际上却是破坏了历史科学。——在这篇文章中将对这几种观点进行一些分析。

—

社会历史发展中有没有客观规律,我们能不能发现这种客观规律,这是决定历史研究能否成为科学的根本问题。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创始人之一梁启超曾经在这个问题上表示动摇和苦恼,而终于达到否认客观规律的结论。

梁启超早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发表过《新史学》^①一文。在那时,他对于历史有没有客观规律的问题,态度虽然不很明确,但基本上是承认有客观规律的。他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第10页)可是17年后,他在1921年发表的《中国历史研究法》^②中用了极其犹疑不定的口气谈到历史中的“因果律”问题。他说:“说明事实之原因结果,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近世治斯学之人多能言之。虽然,兹事未易言也。……严格论之,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然则吾侪竟不谈因果可乎?曰断断不可。”

① 梁启超的《新史学》最初在《新民丛报》上连载,兹据中华书局刊行的《饮冰室文集》第9册。

②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据中华书局刊行的《饮冰室专集》第15册。



不谈因果，则无量数繁颐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之目的消灭。……”(第110—111页)这段话中的模棱两可，自相矛盾是很明显的。

果然，只隔了两年，他就来修正自己的这段话了。在1923年，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①的演讲中重新提出了“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这个问题，干脆做了否定的答复。他说：“当我著《历史研究法》时，为这个问题着实恼乱了我的头脑。我对于史的因果很怀疑，我又不肯放弃他。……我现在回看这篇旧著，觉得有点可笑。既说‘以因果律驭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何以又说‘不谈因果断断不可’。我那时候的病根，因为认定因果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矛盾不彻底的见解。”(第3页)应当承认，梁启超是如实地描写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历程。像他所说的，他原来是“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第2页)，但又因为感到从社会历史中找不到客观的必然的规律，所以终于认为“把自然科学所用的工具扯来装自己门面，非唯不必，抑且不可”(第2页)。这就是说，他为摆脱那种“矛盾不彻底的见解”而找到的出路就是放弃使历史学成为科学的打算。

由此可见，梁启超在这个问题上走着一步步后退的路，否认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质就是这条路的终点。

表示否认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的，不只是梁启超一个人。我们还可以拿何炳松做个例子。何炳松在《历史研究法》^②这个小册子

① 《饮冰室文集》第40册。

②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中说：“自现代自然科学及社会学发达以来，史学一门颇受影响。世之习史者不谙史学之性质及其困难，妄欲以自然科学之方法施诸史学，以求人群活动之因果，或欲以社会学之方法施诸史学，以求人群活动之常规。其言似是，其理实非。”（第2页）

为什么他们认为在社会历史中找不到客观的规律？梁启超的理由是：“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这是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11页）中的说法，两年以后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说得更明确了：“因果律也叫必然的法则。‘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第3页）同样，何炳松也认为，人心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通史新义》^①的《自序》中说：社会演化之“真因维何？即人类内心之动机是已。”（《自序》，第11页）由于认为内心动机是变化莫测的，所以在这本《通史新义》中说：“……历史性质极其混乱……此种混乱盖足以取消史家提高历史为科学之要求，而阻止历史模仿他种科学而现出科学上之外貌也。”（第96页）

很明显的，否认历史发展中的客观规律，从而否认历史研究能够成为科学，正是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不可避免的结论。当人们把历史发展的最后根源归结于“心力”、“意志”、“内心动机”等等的时候，人们就只能在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面前感到惶惑，只好承认他

① 何炳松：《通史新义》，商务印书馆1929年初版。这本书标明为“何炳松著”，实际上是法国人赛诺波（Seignobos）所著《应用于社会科学上的历史研究法》（1905年）一书的译本，但“自序”则是何炳松的作品。



们对于历史的真相其实是无所知的。

“心”和“意志”究竟是怎样决定历史发展的呢？在阐明他的论点时，梁启超提出了带有神秘色彩的所谓“民族意力”，并且走到了个别历史人物决定历史命运的结论上去。梁启超说：“史迹有以数千年或数百年为起讫者，其迹每度之发生，恒在若有意识若无意识之间，并不见其有何等公共一贯之目的，及综若干年之波澜起伏而观之，则俨然若有所谓民族意力者在其背后。”（《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00页）用这“俨然若有”的所谓民族意力来解释自己所解释不了的历史现象，这同不了解自然现象的人把自然现象的变化归因于冥冥中的天神的意志其实是一样的。

“民族意力”既然渺茫难寻，那么个别人物的心理状况能否捉摸到呢？梁启超说：“心理之发动，极自由不可方物，无论若何固定之社会，殊不能预料或限制其中之任何时任何人忽然起一奇异之感想，此感想一度爆发，视其人之心力之强度如何，可以蔓延及于全社会。”（同上，第116页）这真是可怕的事。任何人的任何“奇异之感想”，只要他“心力”很强，就可以影响和改变整个社会历史的进程！“心力”最强的人大概就是所谓“伟人”了。照梁启超的说法，像在中国近代史中的曾国藩、袁世凯这样的人是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此若干人者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第116页）。“如袁世凯，倘使其性格稍正直或庸懦，则十年来之民国局面或全异于今日亦未可知”（第120页）。根据这种观点，谁能知道那些“伟人”的任何时候的任何一个奇异的感想呢？因此梁启超只好说，“史迹”是“诡异而不易测断”的（第116页）。

在这里，我们想起了列宁说过的话：“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



发展程度看作这些关系的根源。”^①历史唯物主义者当然不否认人们在历史活动中的思想动机,但是决不能满足于用思想动机来解释历史发展过程。如果说,历史发展中的某种结果就是由于某个人或某些人具有这种愿望的原故,这其实是对于事情并没有做任何解释。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某种思想动机在一定时期会成为千百万人的集中的意志并使得千百万人行动起来;为什么这一种思想动机在历史发展中能够起显著的作用,而另一种思想动机则并不起什么作用;为什么在社会生活中,虽然有无数的互相抵触、互相冲突的思想动机,但是历史发展的总的趋势仍然循着确定的轨道前进;为什么某些历史人物的个性虽然能够对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个别事件的面貌起一定的影响,但是他们远不能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趋势,等等。只有做这样的深入的分析,才有可能对历史作出正确的,也就是科学的解释。

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都隐藏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间,要发现它们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由于社会历史现象是由有意识的人参加在内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是通过人们的错综复杂的有意识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所以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科学规律的发现,甚至更难一些。人们在无力克服这种困难的时候就很容易堕入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而许多建立唯心主义的历史学理论体系的人正是利用这种困难,片面性地极度夸大思想动机在历史上的作用,从而在根本上否认历史研究成为科学的可能。

梁启超、何炳松等人为了否认历史发展中有科学规律,还提出了另一条理由,那是说,在社会历史中,和在自然界中不同,同样的现象不会反复出现,只有一个个特殊的事物,没有共相,所以说不

^① 《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59页。



上有什么规律。梁启超说：“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天下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故自然科学可以有万人公认之纯客观的因果律，而历史盖难言之矣。”（《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11页）何炳松的说法则是：“……史家所致意者即此种空前绝后之变化也，非重复之事实也。故历史者，研究人群活动特异演化之学也，即人类特异生活之记载也。夫人类之特异生活，日新月异，变化无穷。故凡属前言往行，莫不此往彼来，新陈代谢。此历史上所以不能有所谓定律也。盖定律以通概为本，通概以重复为基。已往人事，既无复现之情，古今状况，又无一辙之理，通概难施，何来定律乎？”（《历史研究法》，第2页）

这个论点不是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独创的。属于新康德学派的德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里凯尔特(Rickert)就曾在历史学上发挥了这个论点。梁启超承认他受了这个新康德主义者的影响（《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第2页）。为何炳松所依据的赛诺波(Seignobos)也抱同样的见解。在赛诺波和另一个法国史学家合著的《史学原论》^①中说：“研究此各各不同的事实的必要，使历史学不能成为一种科学，因为任何科学都是以普遍性为对象的。”（第208页）

这种说法同样也是历史唯心主义者片面地夸大和歪曲了社会历史现象的一个特点而达到的错误结论。在社会历史中，不会有两个现象完全相同，分毫不差，因此，可以说，历史不会重复。但是，在

^① 朗格诺瓦 Langlois 和赛诺波合著：《史学原论》，1897年出版，李思纯译，商务印书馆1926年初版。这里的引文不是完全依照这个译本，但所记页码是这个译本的。



某些各有特点的现象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共同性,因此,又应当说,历史是会重复的,而且重复的现象是常常有的。何炳松认为,只有对于完全同样、反复出现的现象,才能进行概括(即所谓“通概”),这是完全错误的。进行科学的概括,就是把许多个别事物所具有的互相不同的非本质的特性抽象掉,而根据它们的本质上的共同点建立各种概念和法则。如果只是积累许多完全相同的现象,那就反而不需要什么“通概”。就适用科学的概括这一点而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一样的;这就是说,我们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要从特殊性中找到一般性,从似乎杂乱无章的现象中找到规律,这才有科学研究。当然,在历史研究中,又需要特别注意一般性的特殊表现,需要阐明一般的规律怎样表现为具有特殊性的现象,但是决不能认为历史研究只注意特殊性而不注意一般性。以为历史现象中只有特殊性而没有一般性的这种观点,就会使得历史研究的任务最多只是把历史现象一件件地按照表面状况记录下来,因而排除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质。

庸俗资产阶级学者又常喜欢说,在历史研究中,不能做自然科学的实验室工作,所以社会历史的规律即使有,也无法证明。何炳松说:“史学家所根据之史料断不能应用实验工夫。史家才学虽极高博,终无力可以生死人而肉白骨,使之重演已往之大事,则断然也。……与自然科学家之常能目睹事变而再三实验之者,真有天渊之别也。”就因此,他认为对社会历史不像在自然科学中那样“凡是遇有某种原因即能预断其有某种结果”(《历史研究法》,第4页)。

当然不能用实验室里的工作来研究历史,但这只足以表明历史学家需要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科学研究。人们必须根据各种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而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用一种方法局限自己,以为在这以外寸步难行,这在自然科学上也是不许可



的。而且实验室中的工作其实是实践的一种形式。科学研究需要依靠实践,这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上都是同样的。我们当然不能使历史的事实“重演”,但是我们从历史中发现的规律却可以放到实践中去考验。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正是对于我们所掌握到的历史规律的大规模的考验。我们能够对社会历史作出科学的预见,并且在实践中检验这种预见,这是以为在实验室工作以外没有科学方法的人所不能设想的事。

二

资产阶级历史学界中有很多人说,历史学虽然不能成为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科学,但仍旧可以是一种科学,它之所以成为科学就因为它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史料的考订。梁启超、何炳松的书中一方面说,史学不能成为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一方面又常常用“科学的史学”一类的说法,这所谓科学就是指史料的搜集、校勘、考订等等。例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须知近百年来欧美史学之进步,则彼辈能用科学的方法以审查史料,实其发轫也。……我国治史者,惟未尝以科学方法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即诬之弊,往往而有。”(第99页)

史料考订工作是不是在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无论研究什么历史问题,研究者必须掌握大量的,而且可靠的资料,清除掉前人留下来的许多史料中的蒙蔽史实真相的迷雾,使有关的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显露出来。史料(实物或文献)的考订工作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外形”的考订是区别史料的真伪,确定其时代和作者,对历史文献的版本文字进行研究,使其尽可能恢复原来的面目。“内部”的考订就是辨明史



料的实际价值,把有价值的史料和价值不大的史料区别开来,把错误的记载和正确的记载区别开来。这两个方面的考订工作都是必要的,都需要用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去进行。近代西方的和中国的资产阶级史学都着重地在这些方面做了工作。许多中国的史学家们继承了清朝的汉学家们的工作,并且利用从现代欧美传来的各种科学知识和比较精密的逻辑观念,在史料的考订上,取得了不少成绩。他们的工作成绩和工作经验不应当被抹煞而应当加以接受,加以发扬。今后我们还应当有计划地进行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注疏、翻译(译成现代普通话)等等工作,并且使史料学成为有系统的科学。由于史料工作的繁重和需要各种辅助性的专门知识(如古文字学、年代学、古文书学、古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版本学、印鉴学等等),所以有一批专门的人来担负这些工作是必要的,他们就是史料学家。史料学家是整个史学家队伍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轻视史料学家的工作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的认识必须建立在丰富的确实的史料的基础上,所以在有的情况下,史料学的研究成果,甚至对于解决某个历史问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和史料工作看作是互相对立的。史料学家也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同史料学上的专门知识结合起来,那就能够更加提高史料工作的水平。但是如果以为,不懂得和不能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史料学家所做的工作都是没有价值的,都不能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那是不合乎事实的。如果以为只要根据历史规律的认识,就可以任意地选用史料,任意地判定这种史料和那种史料的价值,而无须倾听一些史料学专家的意见,这更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我们不赞成的。但是在另一方



面,也必须指出,史料工作不应当孤立地进行,更不能代替历史规律的科学研究。

片面地夸大史料学的意义,以为历史学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只是在史料的考订工作上,这种错误观点在中外资产阶级历史学者中都是很流行的。法国史学家赛诺波这样解释历史研究法的意义:因为我们不能亲眼看到已经过去的历史事实,只能通过它的遗迹(实物或文献)来知道过去的事实,而史料又往往残缺不全,所以才产生历史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即研究此种史料之方法,目的在于决定此种留有遗迹之古代事实为何。”(《通史新义》,第3页,参看第123页)这就是在实际上把历史研究法看作只是史料的考订方法,从而在实际上使历史学成为史料学。中国的历史学者中也有人虽然不愿意承认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但又说:“近代史学所以能成为科学的原故,就在于它的方法纯然是属于科学的,……现在历史家的注意大部分都向到‘材料的性质’、‘材料的正确’和‘材料的缺点’方面去。”^①这还是承认,史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就是依靠史料学方面的工作。明白主张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宣传这个论点,使它在中国史学界中起了很大恶劣影响的人,乃是曾主持国民党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②。一文中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他在1930年左右在北京大学的讲义稿《史学方法导论》中也下了这样的断语:“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史学便是史料

① 杨鸿烈:《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初版。这个引文见该书第70页。该书第68页上说:“有的人说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未免武断。”

②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期(1928年)。



学”。

照傅斯年说起来，历史学是能够“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一般的事业”的，也就是说，是能够成为科学的。但是傅斯年把使梁启超烦恼的问题简单地撇到了一边，他根本不管要不要和能不能发现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历史学并不是以历史事实本身为研究对象，而只是以前人留下来的史料为研究对象。看一看傅斯年所说历史学为什么能够成为科学的原因是很有趣味的。他说：“假如一件事只有一个记载，而这个记载和天地间一切其他记载不相干，则对这件事只好姑信姑疑，我们没有法子去对他做任何史学的工夫。假如天地间事都是这样，便没有一切科学了。史学也是其一。”所幸的是“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于是就可以把这个记载和那个记载互相比较，于是就有了历史科学。这就叫做“史学的方法是以科学的比较为手段，去处理不同的记载”（《史学方法导论》）。如果按照这种观点来研究某一时期的历史，那么研究者所针对的并不是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研究任务并不是通过有关史料来认识当时的社会历史，而只是把有关的各种史料互相对照比较。经过这种研究，至多只是从各种分歧矛盾的记载中辨明哪一种记载是比较可靠的，他们的研究就到此为止了。即使这种研究工作做得很好，他们也只是停止在应当开始进行历史研究的地方。如果他们遇到的某种历史现象并没有不同的记载，他们就认为这里并没有什么历史研究工作可做。很明显的，傅斯年所说的历史学乃是没有历史的“历史学”，是在史料研究的名义下取消了历史学。

用史料学代替历史学，既破坏了历史科学，也会把史料学工作引导到错误的路上去。无论是史料的“内部”的考证还是“外部”的考证，目的都应当是提供对历史的科学认识的可靠基础；如果脱离



整个史学的科学研究而孤立地进行,就会迷失方向,无目的地沉溺在史料的海洋中。诱使史学家走到这条路上去是反动史学观点的目的。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中说,历史学和语言学“都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这种观点受到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的支持,当然不是偶然的。

傅斯年自己所做的一个考据可以做为极端无聊的史料工作的代表。1932年傅斯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明成祖生母记疑》。谁是明成祖的生母,这问题有什么意义,这是傅斯年自己也说不出的。但是因为这件事在不同的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载,于是好像就有“科学”工作好做了。据傅斯年的考证,说明成祖是马后所生的记载是不对的,他的真正的生母是像别的记载所说的硕妃。对于这个结论,又有别的学者不同意,一场热烈的“学术争论”至少延续了5年之久。我所看到的傅斯年关于这问题的最后一篇文章发表在1936年。——从1932年到1936年,这是关系中华民族存亡的一个极端严重的时期,而这样的“学者”竟以这样的“科学工作”来为反动统治者“点缀”升平!

在过去的时期,勤恳地认真地从事考据工作的学者们,他们的工作对于历史科学的发展有着或大或小的帮助,因而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像这种引人走入歧途的史料学观点及其具体表现却只能受到唾弃。

我想在这里提一下由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这一命题,这个命题曾经在历史学者中引起过很多争论。我以为,在1925年左右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的名义下进行的一些工作是不应当被抹煞的,在这些工作中表现着的所谓“疑古”精神是当时



的反封建的思潮的一个侧面。但是我们现在来读《古史辨》^①的第一册和第二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许多地方，史料（记载古代历史的文献）和历史（古代历史本身）是被混淆起来了。所谓“古史辨”的工作本是从“辨伪”开始，乃是一种史料考订工作。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只能是史料学范畴内的一个命题，用意在使人不要盲目地信从前人关于古史的各种记载。这个命题对于整理周秦两汉时代的记载古史的文献是有用的。虽然整理文献的结果会有助于了解古代历史，但是当然不能把上述命题当做古代历史本身的规律。《古史辨》的编者说：“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古史辨》第一册，第273页）如果这是说，古代史的研究不在于研究古代历史的真相，而只是研究关于古代历史的传说的变化，那我们当然是不能同意的。固然这样的研究也是需要的，但是如果排斥了对历史本身的研究，研究史料难道会有什么意义么？《古史辨》第三册顾颉刚先生自序中指出，人们有理由认为他的书其实是“古书辨”，而不是“古史辨”，这只是“研究古史的初步工作”。这个意思我们以为是对的。

胡适和傅斯年当时十分恭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这说法。一个说，这是“史学的中央题目”，一个说，“这一个中心学说已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了”（同上，第297、338页）。原来这两个人心目中的历史学就是史料的考订学。他们把整理某一部分史料而得到的史料学上的个别结论夸大为历史学上的根本问题，这种夸大只足以损害历史科学，并且也使得像“古史辨”这样的工作反而不易于得到应有的公正估价。

^① 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册（1926年初版）、第二册（1930年初版）。



三

用史科学来代替历史学的学者中,有的人忠实地进行着史料工作,并且很谨慎地把自己的工作限制在史料考订的范围以内。他们能够提供出某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们的缺点是繁琐,不得要领。但是还必须指出,他们只是在个别史料和个别历史事实的考订中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一到必须提出对历史发展的根本看法的时候,他们就抵抗不了,并且往往会接受主观主义的影响。还有些人则是在重视史料工作的掩护下公开宣扬历史学上的主观主义。他们一方面用繁琐的史料考订工作使人相信他们的态度是真正实事求是的态度;另一方面又告诉人,历史的真相是不可能通过科学的方法而认识到的,在历史研究中可以任意地进行纯主观的猜度和想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经验主义倾向的史料工作,一方面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论,这二者是密切地结合起来了。恩格斯在论到自然科学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时曾指出:“到那种单凭经验,非常蔑视思维,实际上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的地步的派别中去寻找”,就可以找到“极端的幻想、盲从和迷信”^①。在历史学界中也有这种情形。

就拿梁启超和何炳松的书来看吧。他们用很多的篇幅来讨论史料考订的问题,在这范围内他们能够有自信地说出些具体的东西;特别是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应当承认是一部在史科学上有价值的著作。但是一到史学研究的更广阔的范围,他们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除了史料考订以外,在史学研究中究竟还有什么工

^①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页。



作要做？在这问题前面，他们就只能用一些空洞的、玄妙的说法来搪塞了。

症结还在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问题上。通过史料的考据工作，至多只能把一个个的个别历史事实弄清楚，如果停留在这里，那就连任何一本通史都写不出来。要进一步，就不能不注意各个历史事实的相互关系。所以梁启超和何炳松在确定地否认历史发展规律的时候，仍旧说要承认历史现象中的相互关系。梁启超把这种相互关系叫做“互缘”。他说：“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第4页）何炳松则称之为“因果关系”，照他的说法，在历史现象中可以有因果关系，但没有因果规律。他说：“历史与自然科学同，不能有无因之果。然自然科学中之因果本有定律，因果范围必两相等。……探求定律，非史家之责也。史家所求者，因果关系而已。只叙明诸事之前后相生，并依前后相生之理而编比之，即为已足。总期篇中无孤立之事迹，各事有相互之关系，斯则可矣。”否认规律性，而又承认“互缘”，承认“因果关系”，这究竟是怎样回事呢？如果根本否认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那就一定是否认客观规律，但是承认因果关系却并不等于承认客观规律。唯心主义者所不承认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于事物本质中的客观的必然的规律性。在排斥客观规律性的前提下承认各种因果关系，那就只能是沉溺在事物表面现象上的，带有偶然性的，纷歧错杂的无穷联系中间，并且只能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因果关系；不是认为客观的因果关系反映到人们的头脑里面来，而是认为人们把因果关系带到客观现象中去。由这里就产生了主观主义的历史方法论。

关于这一点，何炳松是说得很清楚的。他不是说要“叙明诸事之前后相生，并依前后相生之理而编比之”么？如果所谓“前后相生



之理”是指客观事实本身的理,那么他就是用唯物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编比”,但他的意思并不是这样,它用“前后相生,因果初不相等”这种暧昧的说法来解释他所谓历史上的“因果关系”,意思实际上是说,历史上的因果关系是带有任意性的,是不确定的,不可捉摸的,天大的事情可以由一个无足轻重不相干的小事促成,重大的因也可以“影响杳然”。因此,人们当然不可能按照客观历史本身的规律来进行“编比”了。照他说来,在研究一段历史时,“自何时始,至何时终,去取之权,握诸学者”(《历史研究法》,第57页)。“学者”愿意怎样办就怎样办。在进行“编比”时,应当编进去什么材料,在这些材料中,“孰重孰轻乎?何者应详,何者应略乎?何以某事较重,且应详述乎?凡此皆形而上学中之问题也”(同上,第60页)。原来这叫做“形而上学”的问题,所以是并没有客观标准的。“是故世界史之如何编比,当以著者所抱之人生哲学为标准。……史家所抱之价值观念,当然影响其全部历史之编比”(同上,第61页)。你有怎样的“人生哲学”,你就怎样去“编比”,愿意怎样办,就怎样办,这就是何炳松的“编比”的理论。在这里主观主义的臭味是掩盖不了的。凡是坚持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又觉得不能把历史研究工作仅限于史料考订工作的人,都必然走到这条主观主义的路上来。

主观主义者不是深入历史现象的本质进行艰苦的研究以发现各种现象之间的内在的联系,而是任意地根据表面现象的某一侧面把各个历史事实联结起来,他们所发现的相互联系往往只好算是胡扯。有些评论者认为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的最大优点是承认历史事实的相互联系,承认历史的整体性,反对把一个个历史事实割裂开来叙述。的确,在这本书中这一类说法是很多的。梁启超用他的善于渲染的文笔说:“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



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鳞鳞相衔，如环无端也。”(第10页)但是问题是梁启超所说的相互联系(也就是他所说的“互缘”)，究竟是指什么呢?在他的书中有这样的例子：“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甚至“汉攘匈奴”一直影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等等(第101—104页)。按照梁启超的这种“互缘”的说法，人们可以把任何两件相隔数千年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经过若干中间的连锁而联结起来，只要人们愿意这样做。这只能叫做主观主义的游戏，是没有什么科学意义的。

主观主义者无法说清楚他们究竟用什么方法来看出历史现象中的相互联系，他们只好承认他们所用的方法并不是科学的方法。梁启超说：“一群史迹，合之成为一个生命——活的、整个的，治史者须将此‘整个而活’的全体相，摄取于吾心目中。然兹事至不易，除分析研究外，盖尚有待于直觉也。”(《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18页)这所谓“直觉”，就是许多主观唯心主义者用来同科学认识相对抗的据说是超乎理性以上的本领。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说得更清楚一些。他说的是，“我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然则……我们常说历史是整个的，又作何解呢？你根问到这一点吗？依我看，什有九要从直觉得来，不是什么归纳演绎的问题。”(《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第2页)

在自称有“历史癖”的实用主义者胡适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当胡适说到史料的整理考订的时候，他尽力用“科学”、“实事求是”等字眼来装点自己，但在这范围以外，他就不敢承认还有什么科学方法。他说：“史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古史



辨》第2册,第338页)他又说:“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力。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工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胡适文存》第二集卷一,第2页)这很明显地是说,在叙述和解释历史时是不依靠科学方法的,人们可以靠“想象力”,靠“艺术”的能力来把各种史料组织成为所谓“历史的系统”。

主观主义者尽管天花乱坠地描写历史,但是在他们看来,历史的真相其实是不可知的,因为人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直觉和想象力来描写历史,谁对谁错,并没有客观的标准。有一本讨论史学方法问题的书^①中这样说:“凡解释历史,如自谓能得某种史事之真相,任何历史家皆不能自信。历史家所敢自信者,不过告人以某种史事经过研究之后,在其个人脑中发生之现象如此而已。……考证固为客观的工作,而解释不能不多少带主观的色彩,此实为无可如何之事。”(第77页)

这种主观主义者认为,历史知识并不是客观事实的反映,而是从历史家所抱的“哲学”引申出来的。这就是何炳松所说的“……以著者所抱之人生哲学为标准,……史家所抱之价值观念当然影响其全部历史之编比”。另一个历史学者^②曾这样说:“应该注意到人类生活的全面要点,提纲挈领地构成骨干,以支配这许多史料,使之适合于史学家自己的史意。”(第34页)这就是说:不是从历史事实中得到“史意”,而是以客观事实来凑合史学家自己的“史意”。所以这个作者说:“历史学是介于科学同艺术之间的一种学问。考证史料是一种科学,排比史料却与艺术有莫大的关系。”(第47页)然

① 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独立出版社1945年11月初版。

② 刘节:《历史论》,正中书店1949年5月初版。



后又说：“历史家应该自己造成一套哲学系统，从这套系统以内产生一种历史上的独到见解。……所以历史学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艺术，而总其成者，还是一种哲学呢。”（第 64 页）

每一个历史研究者所抱着的世界观、哲学观点必然影响到他对于历史事实的解释方法。因此，我们认为，历史学者为了能够正确地按照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来研究和解释历史，就应当建立科学的世界观，这种科学的世界观是对自然界和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的综合。但是历史学上的主观主义者却认为，既然如此，历史家就可以自己去“制造”哲学系统，按照自己的“人生哲学”，自己的愿望和好恶（“价值观念”）来解释历史。他们的哲学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哲学，他们的历史方法论也只能是主观主义的方法论。

人们往往这样想，实际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无论如何总是在探求事实，是不容易接受唯心主义的玄论的。但是事实上，探求事实的历史学家失足落到唯心主义泥坑中的情形是常常有的。这里可以举历史学家吕思勉为例。吕思勉先生早年所作《白话本国史》中说：“历史者，研究人类进化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①这是朴素的正确的说法。他在 1945 年发表的一本关于历史研究法的小册子^②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表示了赞成的态度。他说：“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帮助的。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第 67 页）但是就在这本小册子中的有些地方，他又表现了无力抵抗唯心主义的引诱。这主要是因

①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商务印书馆 1922 年初版，1935 年订正四版。

② 吕思勉：《历史研究法》，永祥印书馆 1945 年初版。



为他不能正确解释各个历史家为什么会同一历史现象得到不同的认识,又为什么对同一历史事实的认识会不断地有所发展,似乎永远不能达到真相。这种情形其实正足以证明历史学家必须有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并且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达到对历史事实的正确认识,但唯心主义却根据这种情形宣布客观事实本来是没有的。这本小册子接受了唯心主义的解释,所以说:“一物有多少相,是没有一定的,有多少人看就有多少相,看的人没有了,相也就没有了。”(第 50 页)“真正客观的事实是世界上所没有的。真正客观的事实只是一个一个绝不相联属之感觉,和做成影戏所用的片子一般;不把他联属起来,试问有何意义?岂复成为事实?……其能成为事实,总是我们用主观的意见,把他联属起来的。如此,世界上安有真客观的事实?”(第 51 页)

这里又一次证明了,唯心主义正是利用科学工作进行中遇到的困难而来俘虏科学工作者的。

历史学上的主观主义方法也不是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独创的。我们在这里不来引证专门阐扬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欧美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但是需要谈一下德国史学家伯伦汉(E. Bernheim)和前面提到过的法国史学家朗格诺瓦和赛诺波的著作。他们的主要著作有中文译本,常被中国有些历史学者所称引。这些著作的主要篇幅是史料考据学,在这方面,它们是有科学内容的,但它们的科学性至多只是在这范围内。

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①在欧美资产阶级史学界中差不多被

^① 原书名《历史方法和历史哲学读本》,1890年初版,1908年修订第六版。中文译本题作《史学方法论》,陈耀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这里的引文不是完全依照这个译本,但所记页码是这个译本的。



看作是关于历史研究方法的一部经典著作，并且被认为是真正系统论述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这本书中的确肯定了历史学是科学，并且表示反对那种认为只有考证是科学工作，而进一步的工作就不能用科学方法的说法。伯伦汉认为史学方法有两方面：一是考证，另一叫做“综观”。据他说，考证是用科学方法，而“综观”是同考证结合着的，所以也是科学方法。他说：“如果人们否认综观、考证和史料学之间的密切关系，那就是否认了历史学的科学性质。”（第273页）但是我们应当来看一下，伯伦汉对于历史科学的了解究竟是怎样的，他所说的“综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伯伦汉否认历史现象的客观规律。他说：“史学的目标决不是探求一般的典型或因素，尤其不是探求发展的规律。”（第72页）他以为历史主要由“心理的因果性”所决定，而且充满了偶然性，所以没有客观的必然的规律。因此他说：“历史并不是自然科学或规律的科学，不是所谓精确的科学。”（第123页）但是他认为历史学仍旧可以算是科学，那就因为历史不应当把罗列的事实不相连贯地加以叙述，而要“把个别事实连贯在因果关系之下”，这种因果关系是以所谓“心理的因果性”为基础的（第114—115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何炳松的否认因果规律而承认因果关系的说法的娘家。

照伯伦汉说来，看出个别事实在整体中的联系就是在史学工作中继“考证”以后的“综观”这一步骤的任务。如果是根据客观现象本身的规律而看出它们的联系，那当然是科学性的；但是伯伦汉既然否认客观规律，他就不能不把“综观”这一步骤说得非常神妙了。他说：“在这方面所用的机能是不同于一般的理解能力的一种难以说明的精神禀赋，那就是‘综合的天才’。……这种才能和幻想很相近，而且有相似处。”（第402页）虽然他又再三声明“综观”并



不是完全靠幻想,但同时又再三声明这是要靠“想象力”,靠“直觉力”的,所谓直觉力“不是从学习中得来的,而是出于天赋的”。(第403—404页)——很明显的,伯伦汉在这里所说的意思是已经被前面提到的一些中国历史学者接受下来了。从伯伦汉的“综观”中其实是不能令人嗅到科学的气味的。

法国人朗格诺瓦和赛诺波合著的《史学原论》的基本精神和伯伦汉没有什么不同。值得指出一下的是他们着重地企图从历史研究的对象的特点来证明历史学其实只能是一种主观的学问。据他们说,在历史家面前并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所有的不是事实本身而只是史料,而史料又是前人思想的产物。“由于历史材料的这种性质,所以历史终不免是一种主观的科学。如果把分析真实对象的真实分析方法,用到对于主观印象的内心分析上去,那是不合理的。”(第176页)这真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诡辩。历史学家当然不能像动物学家一样在实验室中把一只青蛙摆在面前加以解剖,历史学家不能不透过掺杂着前人的主观的史料来研究过去的历史,他在研究工作中必须更多地运用思维能力,因此历史学家必须善于排斥前人粉饰和歪曲事实的主观,严格地从客观事实出发来运用思维能力,否则就不能够使历史学成为科学。所谓“主观的科学”势必会变成只是任意的想象。这两个法国历史学家断言说:“几乎一切历史学家都不自觉地,自认为能观察‘真实’,其实一切历史家,唯一所具有者,只是想象而已。”(第178页)“历史学家不能不用一种主观的方法。他想象出一个社会整体或一种进化过程,他把由历史所提供的个别因素排列到这个想象的结构中,所以生物学的分析是由对真实物体的客观分析而来,而历史的分析只能由存在于想象中的主观物而成。”(第183页)

拜这样的欧洲资产阶级学者做老师的人当然跳不出主观主义



的迷魂阵。让我们再引一段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中的话，这段话几乎就是赛诺波的话的翻译：“……人群活动，史家所知者亦仅属主观之印象而非活动之实情。……凡此皆由臆度而来，非直接观察可得。故史之为学，纯属主观，殆无疑义。”（第5页）——既然如此，我们断不能把这些先生们所说的“史学”看成是一种科学，也确是“殆无疑义”的了。

四

在现代资产阶级历史学说中还有一种表面上是维护历史科学，而实际上是破坏历史科学的学说。主张这种学说的人宣称，他们能够发现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从而使历史研究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准确的科学。但他们不是从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寻求规律，而是搬用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某种规律来解释社会历史。他们中有的人说，因为人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所以应当用心理学来解释历史，这样就能够使历史成为科学；有的人说，因为人是一种生物，所以为了科学地解释历史，就应当把生物学的规律用在历史学中。这里，我们将着重讨论这种在历史学中的生物学观点，因为这种观点在中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界中曾有较多的影响。所谓用心理学解释历史，实际上也是把社会历史现象当成生物现象的一种观点。

一般说来，把生物学的观点搬到社会历史中来总是会损害社会历史的科学研究的。社会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作为生物的人，不是人的生理自然现象，而是人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的规律不是生物学的规律所能包括的。在50年前，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最初传到中国，当时新派的人曾利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



等说法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他们用这种观点来反对封建主义的崇拜古老、否认社会的不断进步、否认社会变革的必要的思想；虽然这种观点在当时起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作用，但是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毕竟不能帮助人们真正理解社会历史。现代欧美腐败的唯心主义历史哲学中的生物学观点却并不是把达尔文学说简单地搬到社会历史上来，而是要比这“深奥”得多。那就是先把生物学放在主观唯心主义的臭水缸里浸透，然后再拿来同唯心主义历史观相结合。在近二三十年来中国资产阶级学术界中宣扬什么“生物观”、“生机史观”的人就是西方这种“时髦”风气的追随者。国民党反动派所制造的极端反动的“唯生史观”也利用了所谓生机主义的生物学观点，但在这里我们不准谈当时国民党官方的“理论”。为了分析这一类观点，下面要提到一个属于反动的国家主义派的“理论家”叫做常乃德的议论^①。在中国较早宣传这一类观点的还有朱谦之的两本书^②。朱谦之先生大概早已放弃了这种观点，但为了说明问题，这两本书也是需要提到的。

常乃德的书中说：“在本文作者所拥护的生物史观的立场看来，人类历史与整个生物的历史是离不开的，所以我们讨论人类的历史，不能不牵涉到人类以外的生物学的知识。”（第14页）“文化是一种生物的事实，……要了解文化的根底，必须溯源于生物学。”（第49页）朱谦之的书中说：“历史之意义应该从生物学之进化的解释。”（《历史哲学》，第6页）“历史哲学应该以新生机主义的生物学说为依据。”（第4页）很明显，他们都是拿生物学做武器。他们的

① 常乃德，《历史哲学论丛》，商务印书馆1944年重庆初版。这是一本论文集，其中绝大多数文章均作于抗日战争期间。

② 朱谦之：《历史哲学》，泰东书局1926年初版；《历史哲学史大纲》，民智书局1933年初版。



所谓生物学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生物科学，这是首先应当指出的。朱谦之的书中特别声明，他认为，历史的进化“决不是达尔文主义所能解释，而应该把柏格森、杜里舒的新生机主义来讲明”（第8页）。杜里舒的思想尤其被当做这种历史哲学的依据^①。德国人杜里舒在生物学上发展了一种彻底的唯心主义观点。照他说起来，生物的进化是由一种内在的目的所决定的。朱谦之的书中给以解释说：“新生机主义……以为生物之自体就有一种动力，由这动力向上自由发展，自创新的形状，这就是进化的根本原因。”这种神秘的动力就被称为生机力。据说，“这生机力，凡是生物个个都有，生物即因这生机力的冲迫而分途进行，各有一定的自主律，是万不能用机械的原则说明的”。（第9页）这种生物学观点是完全反科学的，它其实不过是假想生物自身具有一种神秘的意志力量，而把生物进化的根源归于这种意志力量。常乃德虽然没有讲什么生机主义，但他也是把社会历史混同在生物现象中，而且用唯心主义的目的论来解释生物的进化。他说：“人生与国际皆为生物演变之一大阶段，生物之演化通古到今，通万物以至于人，实依一大方向而进行。”（第71页）他又说：“夫生命进化之意义在于扩大其生命力，……宇宙之进化如有目的，似即向此一大目的而进行。”（第80页）这就甚至是想把整个宇宙都说成具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了。

难道可以设想，依靠这种对生物进化的唯心主义的解释，能够建立社会历史的科学么？但是主张“生物史观”、“生机史观”的人却宣布，他们承认社会历史中有科学法则，而他们是能够找到这种法

^① 杜里舒(Hans Dreisch, 1867—1941)德国的哲学家，曾于1922年到中国讲学。朱谦之先生那时曾说：“杜里舒在南开大学讲演，实在给我许多教训，使我知道历史之疑义应该从生物学之进化的解释。”（《历史哲学》，第6页；又见《历史哲学史大纲》，第350页）



则的。常乃德说：“所谓史观，当然不仅是要了解历史事实的真相，并且要就此众多事实上建立起正确的因果和法则来。”（《历史哲学论丛》，第18页）朱谦之说：“我们要问历史是不是科学，应该先问历史是不是与一切科学同样的有一个法则。……须知宇宙间一切的学问不讲便罢，要讲便都是以事实做基础，而寻求他的法则的，不然便不得以 Wissenschaft（科学）看待。”（《历史哲学大纲》，第13页）这种字面上的诺言和他们实际拿出来的货色实在相差得太远了。比较起来，像梁启超那样地承认他不能使历史研究成为发现客观法则的科学，倒应该算是一种老实的唯心主义了。

拿这种生物史观、生机史观所提供的货色来看，其实是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的。他们其实跳不出梁启超所说的历史由人的自由意志所创造，或者民族意力决定着历史发展这一类的说法。生机史观者说：“人类继续不断的历史发展都是从人类的‘生机力’做出来的，有这普遍生力，故常不满意于现在境界，而别求创造其他的新生活形式。……这就是历史进化的原因了。”（《历史哲学》，第59页）生物史观者说：“生物史观者以国民性为一切政治社会活动的总动因。”（《历史哲学论丛》，第75页）很明显的，这不过是在字面上用“生机力”来代替了“自由意志”，用“国民性”来代替了“民族意力”而已，这不过是用生物学的术语来给陈腐的唯心主义观点加上了新的招贴而已。

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和老式的唯心主义不同的新东西的话，那么有一点倒是可以提到的。老式的历史唯心主义往往以为历史的动力在于人的理性和知识。这种历史观点虽然在根本上是错误的，但还表示了对理性和知识的重视。现代欧美的彻底代表帝国主义时期的腐朽资产阶级的历史唯心主义却公然抹煞理性和知识，把某种动物性的本能看作历史发展的动力。从上述讲生机主义的书



中可以看到这种影响。在这书中的许多地方把所谓“生机力”和“本能”等同起来,并且说:“本能在人类历史中是头等的重要的原动力。”(《历史哲学》,第147页)“历史上的种种变动莫不是本能变动的结果,换句话说,只有本能支配历史行为。”(第172页)这种用本能来解释历史的观点更完全杜绝了科学地说明历史的可能。

主张历史学不能成为科学的历史唯心主义者常常起来反对把生物学应用到历史上来。例如何炳松说:“世之学者……将生物学上之方法与定律依据比论而引入历史研究中。殊不知社会与生物间有根本不同之一点焉,即前者具有心理上之性质,而后者则具有生理上之性质是也。”(《通史新义》自序,第12页)这很明显地是为了卫护历史唯心主义而反对生物学观点。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上述的生物史观和生机史观,在形式上看来,好像是同何炳松的主张相反,实际上却是一致的。可以设想,这种生物史观者说:请放心吧!按照我们的生物学看来,连生物进化过程也是一种心理现象;因此,把生物学用到历史上来,只是为了给历史学以科学的外观,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是一点也不会受到损失的。

正因为实际上是完全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所以生物史观者虽然装成是历史科学的拥护者,但终于不能不宣布他所说的历史其实不是客观事实的反映。而只是历史家主观的创造物。常乃德说:“要将零碎的史料排比成史实乃至历史,必须加上点选择组织的作用,而这些作用便是新加上去的。所以新组织成的历史,其中所含的精神不但不能从零碎的史料中求得出来,也未必与原始事实真正相符,因为他已经是一件新产品了。”“历史家永远不会看到事实的真相,等他们将些史料排比成一部像样的历史的时候,他们不是发现过去的事实真相,而是创造他自己以及他的时代和民族的哲学了。”(《历史哲学论丛》,第12页)“根据既成的诸多史实,



以其天才加以联系,组成一完整的系统,使史实与史实间配合成一周密的体系,由此体系表现一种意义,能如此者谓之历史家。”(第26页)这哪里是科学地研究历史?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前面说到的主观主义的历史方法论的宣扬。

在另一种形式下企图用生物学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的还有以所谓优生学为基础的“人文史观”。潘光旦曾经宣传过这种“理论”,这里不打算详细评论,只介绍一下所谓“人文史观”在中国问题上达到的结论大概就够了。潘光旦的“人文史观”的基本原理是说,优秀的人生出来的子孙是优秀的人,劣等的人生出来的子孙是劣等的人,因此一个国家的文化发达不发达要看这个国家中的优秀分子生育的机会多不多。这叫做决定文化盛衰的“生物的原因”。据说,中国的积弱,是“有很严重的生物原因在后面活动的”。解决办法就是“借重目下种种社会制裁的势力,例如教育、宗教、舆论、法律等等,使人口比较优秀的部分可以提早几年结婚,多生几个儿女,同时使比较不优秀的部分减少他们的婚姻率与生育率”^①。——这大概可以叫做生物学救国论。需要补充一下的,据美国学者的“优生学理论”说,所谓“人口中比较优秀的部分”其实就是“上层社会经济阶级”,所谓“人口中比较不优秀的部分”就是“下层”的社会阶级^②。让老爷们多子多孙,中国就能得救,这种奇谈虽在中国也不能使多少人相信,是可以理解的。

总之,各种不同形式的“生物史观”其实都只是反映了历史唯

① 潘光旦:《人文史观》,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初版。这是一本论文集,见该书第6、116、122等页。

② 见《优生原理》第6、19等页。这本书是潘光旦根据美国的普本拿(Popenoe)和约翰生(R. H. Johnson)合著的《应用优生学》编译的,观察社1949年4月在上海出版。



心主义的破产。因为公开否认社会历史科学的唯心主义观点不能立足了，所以有些人竭力用生物学的名义来给它加上一些装点。因为想使人相信他们也是从物质条件出发来给与社会历史以科学的解释，所以他们拿生育、遗传的现象来说明社会的发展。在他们手里的生物学(生机主义的、目的论的生物学)和所谓优生学本身都只是假科学；和这种假科学结合在一起，社会历史的研究是一步也不能前进的。

五

关于资产阶级历史学在历史研究能否成为科学的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的分析就说到这里。这些错误观点在现代中国历史学研究工作中起了很多坏影响，但是应当指出，有许多诚恳地做学问的历史学者，虽然沾染到这种坏影响，但是他们的实际研究工作并不是完全在这些错误观点的支配下面进行的。前面曾说过，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对于历史科学的发展是有过重要贡献的。中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至少在下列几点上比封建时代的历史学有进步：第一，打破了越是古代社会政治各方面越好，把远古当成黄金时代的迷信；第二，扩大了历史研究领域，改变了历史只是“帝王家谱”的状况，使社会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都成为历史研究的内容；第三，注重叙述的真实性，否定了那种认为历史家为了进行“褒贬”，可以在叙述中修正事实的看法；第四，因为扩大了历史的领域，注重真实性的原故，就提高了对史料(文献和实物)的收集、整理和考订工作的重视。在这几点上的进步，固然在封建时代某些先进的历史学家的工作中已经可以看到，但是真正确立这些观念，使之成为公认的准则，则是资产阶级历史学出现了的时候。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吸收了资产阶级的历史学以及封建时代的历史学中的一切积极的因素，并且克服了以往历史学中的唯心主义的反科学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代表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为基础，所以能够彻底地揭露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也有人看出了物质生产条件对于整个社会生活的决定作用，也有人看出了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但是他们总是不能在全部研究工作中正确地贯彻这种观点。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才能全面地建立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的理论，制定科学的研究社会历史的完整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后，开始有了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真正科学的研究。当然，这决不是说，一切历史问题因此立刻都得到了解决。由于中国历史的庞大和复杂，由于史料工作的不充分，还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工作中的缺点，对于许多历史问题还远没有达到成熟的科学结论。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已经表明只有它能够引导人们走向正确的结论。在革命胜利以前的中国学术界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断地扩展着。有不少历史学者，虽然因为没有摆脱资产阶级历史学的偏见，对马克思主义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在他们的工作中也可以看到不同程度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例如，他们在解释历史现象时较多地考虑社会经济条件，考虑由经济地位而形成的阶级关系等等。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更多的历史学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是偶然的。

在这里，讨论一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科学的历史学的一些怀疑，我想是必要的。

攻击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常常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是和一定的政治立场相联结着的，而抱着政治的立场，那就必然使科学



性受到损害。下列这个论调可以举出来做代表：“新史学的开宗明义第一章，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历史不是附属的，它是浩然独立，无所偏党的历史科学。……马克思学派亦欲借重历史为阶级斗争的宣传利器，倡所谓一元论的史学，皆不是史学的真面目，都足以蒙蔽史学的独立精神。”^① 这一类看法在历史学界中曾是颇有影响的。

对于这类看法，我们首先要指出的是，有些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所标榜的“浩然独立，无所偏党”的态度事实上只是欺人自欺之谈。可以举梁启超的话做证明。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了“为历史而历史”的口号，认为不应当再有其他“更高更美之目的”。但是他说：“欲为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第 32 页）很明显的，梁启超在这里也是陷入了一种困境：一方面，他认为，历史研究者必须没有什么主观态度，不抱任何目的，以求“纯客观的史”；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们对于历史不可能没有一定的态度，所以只能要求“在可能范围内裁抑其主观”，因此事实上能否达到“纯客观的史”，“吾未敢断言”^②。

人们在研究社会历史中的各种矛盾和斗争的时候，总是有他自己的态度的，总是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① 胡哲敏：《史学概论》，中华书局 1935 年版，第 66 页。

② 梁启超又在 1926 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专集》第 23 册）中说：“无论研究任何学问，都要有目的”（第 5 页）。“现在人很喜欢倡‘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其实‘学以致用’四字也不能看轻。……学问是拿来致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第 10 页）。这更是回过头来打了自己一棒。



的。在这点上,以“人事”为对象的科学研究和以自然为对象的科学研究是有所不同的。关于这一点,清朝的史学家章学诚说得好:“夫史所载者事也。……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文史通义》)。人们在研究过去的历史时,又总是要着眼于当前的社会政治问题的,如果不是有助于当前的社会政治生活,对过去的研究就不可能吸引人们去从事,这正好像如果不是有助于利用厚生,人们不会建立对自然的科学研究一样。我们不是无所选择地去研究一切自然现象,而总是按照实际生活的各种需要来确定研究什么。同样的,以往的社会历史中包含着无限复杂的内容,我们也只有从现实生活中的需要出发才能确定哪些方面、哪些问题是应当着重研究的。从来的历史学家都是抱着一定的态度和目的来进行历史研究,不同的是有的公开表示出来,有的隐藏起来,有的甚至自己不自觉其态度和目的。自认为消除了主观,“浩然独立,无所偏党”,自以为是“为历史而历史”的人,其实往往也还是抱着某种历史和目的的。

是的,科学研究是要求客观的态度的,就是要求严格地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说明事物的。那么,在社会历史研究中人们站在一定的历史上并抱着一定的目的,是不是就必然不会有科学的客观态度呢?梁启超以医生诊病为喻,他说,医生应当只是认真医病“而无所谓恻隐之心扰我心曲也”。但是事实上,一个医生抱着对病人的同情,对社会健康负责的态度,当然不会妨碍一个医生的工作,而只会使他更加认真。反之,如果是一心一意只为自己的名誉地位着想的医生有时就不会认真地对待他的工作。重要的是要分别出怎样的立场和目的推动人们去科学地客观地研究历史,怎样的立场和目的使人们粉饰、曲解和修改历史。为了达到客观的科学的研



究,应当“裁抑”的是那种使人们走向片面化的观察和武断的“主观”,而不是任何“主观”都要“裁抑”。

在历史研究中的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是资产阶级历史学所无力解决的。它在有的时候,像前面所指出的,公然宣扬主观主义,而有的时候,又高谈什么纯客观的态度。它往往用主观主义来为自己的非科学性辩护,而用所谓纯客观态度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解决这个主观和客观关系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武器来指出历史学上的主观主义的论点是站不住的。历史科学的任务是要通过现象(史料工作提供了历史现象的知识)来认识本质,这不是一个很轻易地就能完成的过程;由于对研究对象不能直接观察而需要间接地通过史料来认识,这个认识过程就更显得复杂。对某一历史现象的科学研究,常常会有新的判断来代替旧的判断,这正是表明认识的逐步深入和逐步完备,而不应当因此得到真实是永不可知或者根本无所谓客观事实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使高度科学性和高度革命性结合起来,从而指出了必须清除一切主观才会有科学研究的说法是站不住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并且明确地宣布,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阐明历史的规律,是为了一定的目的,即为了无产阶级自求解放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目的。这样的立场和目的不同于各种以狭隘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主观;从这样的立场和目的出发,我们无所顾忌地揭开一切历史事实的真面目,而且一定要做严肃的科学工作,来透彻地揭露历史过程的本质。所谓主观妨害科学的客观性,无非是指,把客观事实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来描写,或者是不愿揭露自己所赞成和喜欢的某种对象的短处和缺点。站



在革命无产阶级立场上，我们连自己的短处和缺点都不怕揭露，当然更用不着为历史上的某种现象做不合事实的辩护；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愿望都要以客观的发展规律为依据，而屏弃那种违反客观规律的愿望，当然更必须按照事实的本来面目去说明过去的历史。我们常常要由于适应当前的实际生活的需要而在不同的时候着重研究历史现象中的不同方面和不同问题，但这绝不是说，容许按照主观愿望来曲解历史和做出片面性的结论。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中，革命性和科学性是完全一致的。以为为了科学性必须牺牲革命性，或者以为既保持革命性就必然丧失科学性，都是完全错误的。

这里应当指出，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来从事历史研究的时候，必须充分注意科学性和革命性相一致的问题。有人好像以为，历史研究的任务只在于收集一些美丽的字眼来歌颂在历史上各个时期起进步作用的力量，同时把一些辱骂的词句加于起反动作用的力量，越歌颂的响亮，越辱骂得有劲，就越能显出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实际上，这种看法将只会引导人们离开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历史上的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赞成谁和反对谁的态度应当是很明确的，但空洞的歌颂和辱骂并不能表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在这里宋朝史学家郑樵的话不妨引用一下：“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行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通志》总序）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认真地收集材料，进行科学的研究，不是通过具体的全面的分析来使人心服地表明我们对历史的判断，而是使歌颂和反对都成为空话，那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如果为了表现立场的鲜明，甚至



走到了曲解事实的地步,使歌颂和反对都达到夸大的程度,那就更是彻底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了。这样做,不但没有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科学性,同时也就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革命性。所以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一书的序言中批评雨果的著作《小拿破仑》说:“雨果只是对政变负责的发动人作了辛辣的诙谐的詈骂。事件本身,在他的著作中,好像是晴天霹雳。”雨果不能给事变以科学的说明,他的詈骂也就不能达到他所想要达到的结果,“他没有看到,他赐予这个个人以世界历史上空前的个人发动力,并不使这个个人成为渺小的,反而使这个个人伟大起来。”同时,马克思也批评了蒲鲁东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的“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因为“他想要把政变叙述成为以前的历史发展的结果,可是,在不知不觉之间,政变的历史的说明,却转化成为对于政变主人公的历史的辩护了。”马克思的这种批评生动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相一致的要求。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还有人从另一方面来提出怀疑。他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把理论和方法混淆起来了。在他们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只好算是从研究历史中达到的一种结论,但决不是方法。以结论为方法,那就是“本末倒置”,因而是科学的。

这种论调排除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方法的意义,其用意仍然在于把史料的收集、鉴别、考订的方法当作全部的科学研究方法。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马克思主义是重视史料工作的,但是在历史研究工作中,史料考订工作终究只是一部分的辅助性的工作。要从庞杂的史料所表现的历史现象中发现规律性,并使一切历史现象得到本质性的说明,就必须有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历史唯物主义的各个原理是从研究历史中所达到的一般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反过来就成为指导人们进行具体研究的方法。一切



部门的科学研究总是如此的。在科学上总是依靠已经达到的理论成就来指导对新的事物的研究,而研究新的事物的结果反过来又使一般的原理更加丰富起来。

当然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了解理论和方法的关系。恩格斯说:“至于谈到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那末,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① 教条主义只足以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这也是我们应当警惕的。

在资产阶级历史学者中又曾经有过种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内容的误解或曲解,这就是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一种片面性的理论,似乎它在从社会物质条件来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时候,完全否认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似乎它在指明生产方式在社会中的决定作用的时候,完全否认其他因素的作用。如果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它当然就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指导原理。

社会历史是人的活动的历史,如果以为马克思主义者竟否认人在历史中的积极作用,那么未免太可笑了。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是那种以为历史是由个别“英雄人物”的意志所决定的观点。自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以来的不少讲历史学的书都喜欢引用据说是英国现代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的话:“一部世界史,试将其中十余人抽出,恐局面或将全变。”这只是对于历史发展的一种极其肤浅的观察。马克思主义由于阐明了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的历史,因而从根本上阐明了作为劳动生产者的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并

^① 《致保尔·恩斯特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10页。



且也阐明了个别伟大人物为什么能够起显著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而是给与这种作用以科学的说明。

庸俗的资产阶级历史学者常常由于无力进行科学分析的原故,为了想说明某种历史现象,就只好把一切似乎起着一定作用的大大小小的因素全部平列起来,表面上好像说得很完备,实际上和不说没有什么不同。马克思主义既要反对任意地把某种因素当成决定因素,也反对这种平列一切因素不加分析的做法。马克思主义从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指出了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并且在此基础上要求按照事实来指明地理条件、人口条件、种族等等因素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一定的作用,也要求按照事实指明政治关系和思想意识对于经济关系的反作用。马克思主义和片面的经济决定论是没有相同之处的。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使历史研究真正成为科学,就因为它是彻底消除在历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保障人们无病无灾的灵符,而是引导人们克服各种困难而正确地前进的指针。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研究中的各种困难曾经使得以往历史学者跳不出唯心主义的迷障,唯心主义历史学利用这些困难来构成他们的“理论”。应当知道,这些困难同样也横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前进的道路上。这些困难不是不可征服的,但是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也同样会失足落到主观性和片面性的陷阱中去。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地克服唯心主义理论和主观主义方法的影响,不断地克服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偏向,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的指导下进行艰苦的科学工作,才能真正保证历史科学健康地向前发展。



第 三 辑

(1957—1961)



关于哲学史的研究

最近在哲学史研究工作者中间，提出了一些有关哲学史研究的目的、范围、方法、观点等方面的问题。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今年（1957年）1月里还为此召开讨论会。在这里，我想对讨论中涉及的几个问题说一些意见。

应当承认，近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是有成绩的。虽然还少有篇幅较大的新著作，但是有一些论文表明，不少中国哲学史专家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进行研究工作中已经取得新的成就。同时也应当指出，在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工作中还存在着教条主义习气。近来在报刊上有些哲学问题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一种情形：所讨论的问题明明是一个有实际内容的问题，但是人们却不去具体分析这个实际内容，而只是从权威的或其实并非权威的著作中寻找一个有关的定义，好像不同的意见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对同一个定义的不同理解，好像只要人们对这个定义找到了正确的解释，就能够解决问题了。不能不说，这种做法正是毛主席所批评的“从定义出发”的做法。把这种做法用在哲学史研究上，只能得到所谓“简单化”的结果。

有些文章指出在哲学史的研究和教学中存在简单化现象。例如，在进行阶级分析的时候，只是根据某种一般的原则把“阶级的



帽子”套在各种哲学思想的头上；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某种“表格”，把各家哲学著作中的有关语句分别填写在“表格”中，以代替具体的分析研究。这种情形的确不能算是科学地研究了哲学史。有人说，学生在听了哲学史的讲授以后，只觉得所有的唯物主义者好像是完全一样的，所有的唯心主义者也好像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是用这样的方法写出来的哲学史，虽然也写到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一定是使人觉得，哲学史上的所有这种斗争几乎也完全是一样的。人们不可能依靠这样的哲学史著作来真正具体地掌握思想斗争的规律，并吸取丰富的经验教训。

在哲学史研究中产生教条主义的、简单化的倾向，是同对于研究哲学史的目的和任务的不恰当的、不完全的了解有关系的。

在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中，概括地从基本规律上说明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世界观同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区别和斗争，说明了哲学思想领域内的斗争同现实生活的关系。但是正像列宁所说的，“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现象比规律丰富”^①。研究哲学史是直接面对丰富的现象，要通过这些现象来具体说明哲学的斗争和发展中的规律。所以科学的哲学史能够使人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地继承过去一切哲学思想中的优秀遗产，同时克服过去各种哲学中的错误和片面性，而达到高度的科学性和高度的革命性。如果在哲学史研究中只是简单地套用哲学教科书中的原理，而不能用活的血和肉来显示这些原理的丰富的表现形态，那在实际上是取消了哲学史研究。

哲学史研究不只是提供现成的结论，而是要帮助人们锻炼理

^① 《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27页。



论的思维能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不是停止不动的，是要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运用理论的思维能力来总结社会实践中的新的经验，总结对于自然和科学的科学知识的新的成就，并且进行对各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思想的批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旧序》中曾说，为了锻炼理论的思维能力，“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历史上争论过的哲学问题往往会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出现，历史上反复进行的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斗争会以新的形态继续出现。哲学史中不仅有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经验，也有某种粗糙的唯物主义为唯心主义战胜，以及唯物主义者由于某种片面性而在某些方面陷入唯心主义的经验。总结这一切经验对于我们都是十分有益的。

研究哲学史还不仅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是为了正确地评价过去时代的其他一切文化思想遗产，以帮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我们需要对以往一切时代的文化加以批判、改造，吸取其菁华。为此，就需要认真地研究各个时代的哲学——各个时代文化思想的最集中的表现。

研究中国三千年来哲学思想发展历史，对于我们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不仅因为我们为了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认真地对待中国的丰富的文化遗产，也不仅因为我们所要进行的思想战线上的斗争，还会覆盖着中国过去时代的哲学投下的影子，而且因为中国的哲学历史远没有经过充分的科学研究，这种研究将能够在有些方面更加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

既然我们研究哲学史的主要目的就是这些，那么，很明显的，如果不是用真正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哲学历史，既阐明哲学发展的规律性，又对哲学史中的丰富内容做具体的、深入的分析，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就不能够达到。



教条主义的、简单化的方法是同我们研究哲学史的目的不能相容的。在最近发表的一些讨论哲学史研究工作的文章中,虽然未必都是指明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正确道路,但是在反对教条主义,并且寻求克服教条主义的办法这一点上,它们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

教条主义在表面上好像是维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却是歪曲和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在这里要特别提到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极端地简单化、漫画化的倾向。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原理实际运用来考察社会生活的时候,不能容许任何简单化的做法。恩格斯曾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①马克思主义并不忽视在社会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经济因素是通过这种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对于社会上层建筑起着决定作用的;马克思主义也要求看出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在其发展过程中,对于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它们对经济的反作用。

有人以为,历史上每一种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都应当能够直接从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上得到解释,甚至好像认为,各种哲学思想在内容上以至形式上的一切特征都是由经济决定的。应当指

^① 《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60页。



出,这一类看法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的误解。

哲学,作为上层建筑,是和经济基础相距很远的,所以恩格斯曾把哲学列为“高高凌驾于空中的思想部门”。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只能是透过复杂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而曲折地反映到哲学领域上来。所以在哲学领域对经济基础的反映,常常不会是十分确切的,倒是由于经过许多中间环节而显得模糊和参差。同时,哲学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又是决不能忽视的。一个时代的哲学所采取的具体形态,总是同在它以前的哲学传统有关的(就一个民族说,外来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有时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思想资料作为前提。”经济发展对于哲学也就只能在哲学本身发展规律所许可的范围内起着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它却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情形”^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历史就可以用来说明这种情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当然是和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密切相关的,但是如果认为只是从现代无产阶级的斗争中,就自然会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完整理论,那是不对的。我们还必须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唯物论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人类以往一切哲学思想遗产中的有价值的东西接受过来,加以改造。离开一切前人留下来的思想资料,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世纪中叶的出现是不能设想的。

但是如果只从哲学本身发展的规律,也决不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现代资产阶级的各种腐朽的唯心主义哲学也应当

^① 《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89—490页。



说是利用了前人留下来的许多思想资料,由此出发,构成自己的体系。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者这里,已有的思想资料中的这一部分特别被重视,并且对于这些思想资料作了这样的改造和发展;而在现代资产阶级那里,被重视的是那一部分思想资料,所作的是那样的改造和发展呢?这就不是思想发展规律本身所能说明的了。

所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既要求我们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找到决定哲学的发展趋向的根本原因,又要求我们充分考虑到影响哲学发展过程的一切因素,特别是哲学本身的继承和斗争的关系。在这里,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反对退回到单纯用思想来说明思想的老路,这是唯心主义的老路,又要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变成粗陋的经济决定论。

在我们的哲学史研究中,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简单化的倾向,还由于对哲学家的思想和生活的一种不合实际的设想而更加强。有人好像在研究中有一个预定的出发点:在一个我们称之为哲学家的人那里,他的世界观和他的方法论、伦理观等等,他的哲学观点和他的政治态度,他的认识和实际行动,以至他的阶级出身和他一生活活动中的阶级路线都应当是完全一致的。当然,这样的完全一致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和在历史上都是有的,但是在历史人物中间,可以说,更多的倒是存在着这一种矛盾或那一种矛盾的人。对于历史上的哲学家说来,除了有些站在彻底反动的方面以外,在思想体系中的某种矛盾以及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某种矛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更不用说一个人在他一生的不同时期中的思想矛盾了。哲学家身上存在着的各种矛盾,一般说来,也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不是不可理解的事。研究者的任务就在于指出和分析这种矛盾,达到应有的结论。例如,我们看到,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18世纪的法国唯物论者在社会历史问题上陷入了唯心主义的



观点,而19世纪初期的社会主义者只能在空想的形式下表现他们的进步思想,把社会主义说成是绝对的理想和正义的要求。过去的唯物论者和社会主义者身上的矛盾和弱点使我们看到,必须把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到社会历史方面去,使社会主义建筑在科学的唯物主义基础上面。当然,我们不能设想,总结人类社会生活中认识和实践的全部经验而达到的结论,完全地体现在历史上的每一个思想家身上,而一看到不符合这种设想的情形,就以为出现了破坏某种“规律”的“例外”。——其实这样的规律是本来就没有的。

应当打破诸如此类的一些不知从何而来的“教条”。例如朱伯昆先生的文章中指出,“有人曾经认为,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农民是被剥削的阶级,因此反映农民的哲学观点,应该是唯物主义的”,于是,“既然肯定古代道家是唯物主义流派,那么就應該想法证明他们代表农民的利益”^①。难道可以设想有这种规定么:封建时代的农民应当产生唯物主义哲学观点,而封建时代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代表农民利益?我想,任何人都说不出,这种武断出于何“经”何“典”。事实上,虽然农民从实际的劳动生产出发而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但是由于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和农村文化生活的闭塞,封建时代的农民虽在发动武装革命的时候,也往往不能摆脱唯心主义的束缚,而且通常都是借宗教的幻想来表达自己的斗争理想。对于这种事实,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会觉得不可理解的。

把自己束缚在一些脱离实际的简单的公式中间,这样就会妨害对具体情况做具体的分析,用这种办法决不可能给哲学历史以科学的说明,当然也不可能克服在哲学史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观点。

^① 朱伯昆:《我们在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4日。



三

从克服教条主义的要求出发,我们需要来考虑一下如何估价唯心主义哲学以及如何说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的问题。——在这问题上,现在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

把唯心主义哲学估价高一点,多研究唯心主义哲学,这就是克服教条主义的办法么?

针对那种把唯心主义哲学简单地看作胡说八道而认为用不着加以研究的想法,我们应当说,必须重视唯心主义哲学在哲学发展史中的作用,认真地加以研究。一定要懂得唯心主义,人们才能成为完全科学的自觉的唯物主义者;一定要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研究唯心主义哲学,人们才能成为唯物主义的哲学研究工作者。但是如果认为,我们的研究工作中之所以产生教条主义,只是因为唯心主义学习得不够,那就不合乎事实了。人们也可能是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研究唯心主义哲学,那是决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当然我们更不能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唯心主义哲学。

把一切哲学,归根结底,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大阵营,这是否会造成在哲学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呢?

当然,如果认为我们只要把某种哲学思想划进了唯物主义阵营或唯心主义阵营之内,就不必再去对它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那是不对的。事实上,不经过详细研究,对于许多哲学家的思想也不可能作出判断。唯心主义哲学曾经有各种不同的形态,唯物主义哲学也曾经有各种不同的形态。并不是每一个哲学家都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世界观的实质。许多哲学家在这一方面采取唯物主义观点,而在另一方面又抱着唯心主义观点;而且哲学史上还有不



少人企图在二元论的形式下寻求第三条道路,或者缺乏理论的贯彻性,始终徘徊于唯物唯心二者之间。经过全面的研究而判断一个哲学家在基本上是唯心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这并不是所谓贴标签的工作,而是对这种哲学家的思想的本质的揭发。郑昕先生的文章中说:“不将哲学史局限于唯物唯心斗争的框子里,而给它以丰富的内容”^①。不能不说,这种说法的含意是不明确的。我们应当反对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的丰富历史作简单化、公式化的描写,但是按照事实而把哲学史看作基本上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绝不会使哲学史丧失丰富的内容。

有一种看法,由于担心哲学史的简单化,认为虽然要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但最好不要断定唯物主义是正确的,而唯心主义是错误的。

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并且把哲学史看作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还不一定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哲学史。唯心主义者也可以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哲学历史上的相互斗争是一个客观事实。唯心主义哲学史家实际上也不能不以这种斗争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虽然唯心主义哲学史家常常不愿意公开承认这种研究对象,并且他们总是歪曲地、片面地反映这种斗争。

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哲学史的时候,明确地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并且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要站在唯物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来论述这种斗争,通过这种斗争来反映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萌芽、发生、成长和发展的历史。站在卫护唯物主义传

^① 郑昕:《开放唯心主义》,《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8日。



统的立场上,决不是要把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一笔抹煞,而是要真正给以科学的估计。

应当指出,一方面,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是正确的,而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点是错误的,这种区别是绝对的。另一方面,唯物主义哲学观点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者常常因为缺乏辩证法的思想,因为不能在各方面贯彻唯物主义观点而又陷入错误;而唯心主义哲学观点虽然是错误的,但在哲学发展史中,唯心主义哲学所积累的大量的思想资料,对于唯物主义的发展有重大的作用;各个时期唯心主义哲学曾经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也刺激了唯物主义的发展;唯心主义哲学中不能不反映到客观实际的某些方面和某些片段,虽然这种反映总是片面的、歪曲的,并且被附加上错误的解释。正因为这样,我们决不能用一两个简单的基本公式来代替对哲学史的复杂内容的具体分析。同时,我们也不能笼统地说,“唯心主义中也有好处”,这种未经分析的命题不能带给人以确切的观念。贺麟先生的文章中说:“曾经或多或少地为封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哲学思想,现在或今后……还可以替工人阶级服务”^①。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工人阶级可以从对于古往今来的各种唯心主义哲学的研究和批判中得到好处,这是一定的。但是,如果混淆了唯物唯心的界限,离开唯物主义的立场而倒向唯心主义的立场,那就只会是有害无益的。

还有一种看法,鉴于政治上进步的人不一定是唯物主义者,唯心主义者不一定是抱反动的政治观点,所以认为最好是用进步和反动(或保守、落后)的标准来划分各种哲学思想,以代替唯物

^① 贺麟:《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人民日报》1957年1月30日。



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我认为,这样做对于科学地研究哲学史是没有好处的。

一般说来,哲学唯物主义对于在历史上起着进步作用的社会阶级、集团是最有力的武器,是符合它们的需要,能够反映它们的利益的。但是并不是在历史上的一切进步的阶级、集团在任何时候都能有系统地运用这个武器,还不成熟的阶级往往反而用唯心主义观点来表达他们的革命要求。这除了因为它们进步的进步性的不彻底以外,还因为:第一,一个进步的阶级或集团要能明确认识在哲学领域内对自己真正适用的武器是什么,并不是很简单的事,经过一个摸索的过程常常是不可免的。第二,仅仅从进步的政治倾向中并不就能产生完整的唯物主义哲学,还要有许多必要的条件,已有的哲学资料的准备和科学知识发展状况是有重要作用的。另一方面,对于反动的、保守的阶级说来,唯心主义是他们所能利用的最方便的武器。事实上,社会上一切反动的剥削阶级总是把唯心主义哲学当做自己的工具。但是决不能断定,不能从历史上的任何反动阶级思想武库中发现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武器。这是因为,唯物主义在其没有充分展开的状况下,对于反动阶级的危害性并不是一目了然的;而某种片面性的唯物主义观点也可以被赋予反动的内容。至于说到个别的哲学家,像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他的哲学思想倾向和政治倾向发生矛盾,那更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这种矛盾可能暂时还是哲学家自己所不自觉的,但它的发展却必然地要求一种解决,而解决这种矛盾有时不是在一个人的这一生中所能完成,而需要经过好几代的时间。

从哲学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唯物主义和进步的革命的倾向相结合,唯心主义和保守的反动的倾向相结合的事实;还可以看到,某种唯心主义哲学虽然暂时地同一种进步的政治倾向相结合,但



它终究不能很好地为进步的政治倾向服务；反动势力虽然有时利用某种唯物主义观点，但是它终究只能畸形地、片面地利用唯物主义；而越到近代，哲学上两大阵营的斗争就越加明显地反映着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不能承认这样的“公式”，好像在人类历史上，凡是革命者一定都是唯物主义者，而保守者一定都坚决地维护唯心主义。人们如果在研究哲学史的时候，竟以某些小册子中的粗糙定义为向导，那是十分有害的。

所以，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各种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起了什么作用和怎样地起这种作用。把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直接等同于政治上的进步和保守，是过于简单的做法，我们应当拒绝这种做法。但是如果我们为反对这种简单做法而撇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看成同样地是既可以为进步政治倾向服务，也可以为反动政治倾向服务，那么结果必然是只能导致在理论原则上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模糊哲学的党性。

四

在哲学史问题的讨论中，提到了哲学上的继承性的问题。问题是这样地提出来的：一方面承认哲学有阶级性，一方面又承认哲学有继承性，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在承认哲学的阶级性的前提下，究竟怎样说明哲学的继承性？

要说明哲学的阶级性，不能离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说，现代哲学上的党派“归根结底是表现着现代社会中互相敌对的阶级的趋向和思想体



系”，而自古以来互相斗争的哲学党派“实质上就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由此可见，所谓阶级性和继承性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敌对、互相斗争的哲学史上，如何全面地了解哲学的继承关系的问题。

有一种简单的答复：唯物主义继承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继承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继承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因素和辩证法因素。——这个答复还不能表明哲学思想的继承中的全部复杂内容，而且唯物主义怎样继承唯物主义也还有待于说明。

冯友兰先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对哲学命题要区别其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的说法^①。按照这种说法，一个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是不可以继承的，其“抽象意义”则是可以继承的。而且“哲学史中的某些哲学命题，我们若专注重于其抽象意义”，那就是“对一切阶级都有用”的。冯先生认为，因此可以“说明哲学思想中，有为一切阶级服务的成分”。——根据这种说法，似乎哲学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关系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哲学思想中有阶级性的部分是不能继承的，但只要把哲学命题的抽象意义从它的具体意义中区别出来，就是找到了哲学思想中没有阶级性的成分，那就是可以继承的。

我们认为，冯先生提出了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但是他所设想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趋向于一个错误的方向。其所以是错误，就因为在应当实事求是地作具体分析的时候，却采用了一种最省力的办法。从主观出发在头脑里做一次简单的抽象，这是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光明日报》1957年1月8日。



不能认为一切抽象都是空话,但也不能认为一切抽象都是科学的。有科学的抽象,也有非科学的抽象,其区别就在是否抓住了对象的本质内容。阶级性对于哲学思想是一种本质的属性,这就因为,一切哲学思想,归根结底不是唯物主义的,就是唯心主义的。如果任意地把各个敌对阶级的哲学思想拿来,在我们的头脑里把它们的本质属性抽象掉,把它们之间的其他某种相似处概括起来,就以为由此可以反过来证明有一部分哲学思想没有阶级性,这只能说是一种概念游戏。

用这种办法,是“消除”不了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的。例如,有许多哲学家提出经验是知识的来源这一命题。他们说的不是唯物主义的**经验**,就是唯心主义的**经验**。但是如果我说,不管唯物主义的**经验**还是唯心主义的**经验**,总之都是**经验**,于是抽象掉唯物主义的特征和唯心主义的特征而得到了“**经验一般**”(“**抽象意义**”上的**经验**);哲学的党性难道就会因此而消除么?这种既不是唯物主义的也不是唯心主义的“**经验一般**”,事实上在任何哲学体系中都是找不到的。没有一个哲学家把这种“**经验一般**”看作知识的来源。这种“**经验一般**”诚然也概括了唯物主义的**经验**和唯心主义的**经验**中的某种共同性,但这种共同性并不包含各种哲学思想的本质属性。当然不能由此证明在唯物主义**经验论**或唯心主义**经验论**中间包含着一个既非唯物主义又非唯心主义的“**成分**”。

让我们从实际出发来考虑这个问题。从哲学史上看到的继承,大体上有如下两种情形。

第一,属于哲学根本观点的。在这个范围内的继承,事实上,只能是唯物主义继承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继承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原则和唯心主义原则是根本对立的,它们在互相斗争中会刺激对方



前进,但是相互继承是不可能的。

就唯物主义继承唯物主义来说,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抽象方法是否适用呢?试举一例:古代唯物论者把万物的本源看作是水,或看作是火,或看作是“五行”,或看作是“气”,用冯先生的说法,就是他们对万物本源的命题均各有其“具体意义”,但他们的命题都包含着以物质而不是以精神为世界实体的意思,这可以说是他们的命题的“抽象意义”;由此可见,现代辩证唯物论者在这点上是继承了这些命题的抽象意义,而不是继承其具体意义。——如果这样的例子符合于冯先生的意思,那么可以承认,冯先生的说法在这种场合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这例子中所做的抽象是一种科学的抽象。后来的唯物论之所以能在根本观点上继承先驱的唯物论,就因为它们在本质上的共同点。

但是还必须指出,就在这种场合,也不能依靠冯先生的说法来完全解决如何继承的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者用这办法来对待古代唯物论,即专注意于“抽象意义”,而把“具体意义”撇开,那么所得到的结论无非是,我们和这些唯物论者在根本原则上是完全一样的。前面说过,用教条主义态度研究哲学史,把一切唯物主义者都说成好像完全一样;这恐怕就是因为没有把抽象和具体、一般和特殊结合起来的原故。

后来的唯物论者之所以要继承先驱的唯物论,固然因为他们之间有在本质上的共同点,但也因为他们之间除了共同点以外,还有所不同。如果完全相同,就无所谓继承。继承的意思不是照样拿来,而一定要加以发展。古代唯物论者为阐明自己的思想时,常常有一些独到的,为群众易于理解的论证,就像列宁对于欧洲 18 世纪的无神论者的作品所说的那样,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当然,古代唯物论者也有他们的缺点,那就需要在某些方面给以纠正,克服



其某种片面性,使之得到更完满的形态等等。因此,对待前人的优秀遗产,也必须把它的一般意义及其具体特征结合起来研究,才说得上继承。

第二,在哲学的根本观点以外,还有一般的思想资料的继承问题。前人在哲学根本观点上的遗产是一种思想资料,但是还有很多思想资料,本身并不就是哲学的根本观点,它们可以吸收在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中,成为唯物主义的思想资料;也可以吸收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成为唯心主义的思想资料。在这方面,唯物主义哲学不仅可以继承前代的唯物主义哲学,而且也可以向前代的唯心主义哲学批判地有所继承。

属于这类思想资料的,最容易看到的就是哲学中的各种概念、范畴。每一个哲学概念,在唯物主义那里和在唯心主义那里的含意有原则上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一切哲学概念获得了以往任何哲学思想所不能比的完全科学的内容,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重新提出来整套的哲学概念和范畴,而正是继承了以往的哲学。因为每一个哲学概念的形成,其内容的发展和变革,都反映着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如果同这个认识过程隔绝开来,人们就不可能进行哲学的思维。

既然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也不能不包含着对于客观实际和人的思维活动的某些片面的反映(这片面是被夸大了,并且被加上错误的解释),既然唯心主义哲学也曾经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问题(但它不能解答这些问题或作了错误的解答),那么唯心主义哲学也就提供了许多为唯物主义者所可以吸收,也应当吸收的思想资料。唯物主义驳斥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提出与之对立的观点,但同时又利用对方所提供的某些思想资料,加以改造,这种情形在哲学史上是常有的。



冯友兰先生在另一篇文章(《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3日)所说的王夫之经过程朱而继承张载的情形就可以这样来说明。张载把物质性的“气”看作万物的本源,而程朱则说“气”之如何形成万物是由“理”来决定的,认为“理在事先”。张载的哲学思想中已经有“理”这一概念,程朱在唯心主义观点上发展了这一概念。后来的王夫之等人继续探讨“理”和“气”的关系,发挥了“理在事中”的主张。王夫之等人是在根本原则上驳斥了程朱,而又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利用和改造了程朱提供的思想资料,所以他们能够比张载的唯物主义走得更远一点。冯友兰先生说得好:这里是王夫之“经过程朱,而又撇开程朱,经过程朱,而又继承张载”的辩证过程。

有人说,王阳明的“良知良能”学说包含着要求人不盲从、独立思考的意思。对此,我们应如何估价呢?对于独立思考,有唯心主义的了解,也有唯物主义的了解。在王阳明那里,独立思考的命题浸透着主观唯心主义的气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从唯心主义出发的独立思考的主张也可以起打破传统束缚的作用。但是以所谓发自内心的天赋观念为是非的标准,那么独立思考实际上必然会转变为其反对物——盲从。所以唯物主义者既不抹煞某些唯心主义者提出独立思考的历史意义,也不能简单地接受唯心主义的独立思考的命题,而必须加以根本改造,使独立思考建立在承认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面。

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资料,这对于唯物主义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所以前代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越是广泛地讨论了各种问题,那么反对这种唯心主义哲学而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内容也常常能够越加丰富。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一种原则性的对立,所以辩证法不能够



在根本观点上继承形而上学，正像唯物主义不能够在根本观点上继承唯心主义一样。但是在哲学史上辩证法曾经同唯心主义体系相结合而成为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者在批判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时，可以吸取其辩证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认为十分重要，必须批判地吸取的思想资料。

有人说，唯心主义哲学中的可供吸取的合理要素是同客观实际相符合的，所以就应当把它看作唯物主义。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固然在有的唯心主义哲学中，可能包含着同它的体系相矛盾的在个别问题上的唯物主义观点，但是在唯心主义哲学中所包含的各种片面地符合实际的思想，已经被加上了唯心主义的解释，浸染了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那就决不能认为是唯物主义的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里所说的哲学思想资料的继承问题，就可以用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抽象方法来解释。只要把这些思想资料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关系隔绝开来、抽象起来看，它们正是在哲学思想中能够为一切阶级服务的、无党性的成分。继承就是继承这个成分。冯先生的文章中说，马克思从黑格尔接受辩证法就是接受辩证法的抽象意义，黑格尔说的发展是绝对观念的发展，我们则“取其发展的抽象意义，而不是取其具体意义，就是说，‘取其发展’而不取其‘绝对观念’”。

我们认为，这种简单化的解释是不能成立的，它并不能帮助我们实际处理继承问题。

唯心主义哲学中之所以有一些思想资料可以让我们吸取，并不是像上面所说，因为在那里面有唯物主义的成分，也不是因为在那里面有既非唯物，又非唯心的成分。在程朱哲学中并没有既非唯物，又非唯心的“理”的观念，在王阳明学说中也没有这样的中性的独立思考，同样的，要在黑格尔体系中找到既不唯物又不唯心的辩



冯友兰先生在另一篇文章(《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3日)所说的王夫之经过程朱而继承张载的情形就可以这样来说明。张载把物质性的“气”看作万物的本源,而程朱则说“气”之如何形成万物是由“理”来决定的,认为“理在事先”。张载的哲学思想中已经有“理”这一概念,程朱在唯心主义观点上发展了这一概念。后来的王夫之等人继续探讨“理”和“气”的关系,发挥了“理在事中”的主张。王夫之等人是在根本原则上驳斥了程朱,而又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利用和改造了程朱提供的思想资料,所以他们能够比张载的唯物主义走得更远一点。冯友兰先生说得好:这里是王夫之“经过程朱,而又撇开程朱,经过程朱,而又继承张载”的辩证过程。

有人说,王阳明的“良知良能”学说包含着要求人不盲从、独立思考的意思。对此,我们应如何估价呢?对于独立思考,有唯心主义的了解,也有唯物主义的了解。在王阳明那里,独立思考的命题浸透着主观唯心主义的气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从唯心主义出发的独立思考的主张也可以起打破传统束缚的作用。但是以所谓发自内心的天赋观念为是非的标准,那么独立思考实际上必然会转变为其反对物——盲从。所以唯物主义者既不抹煞某些唯心主义者提出独立思考的历史意义,也不能简单地接受唯心主义的独立思考的命题,而必须加以根本改造,使独立思考建立在承认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面。

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资料,这对于唯物主义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所以前代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越是广泛地讨论了各种问题,那么反对这种唯心主义哲学而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内容也常常能够越加丰富。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一种原则性的对立,所以辩证法不能够



其某种片面性,使之得到更完满的形态等等。因此,对待前人的优秀遗产,也必须把它的一般意义及其具体特征结合起来研究,才说得上传承。

第二,在哲学的根本观点以外,还有一般的思想资料的继承问题。前人在哲学根本观点上的遗产是一种思想资料,但是还有很多思想资料,本身并不就是哲学的根本观点,它们可以吸收在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中,成为唯物主义的思想资料;也可以吸收在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成为唯心主义的思想资料。在这方面,唯物主义哲学不仅可以继承前代的唯物主义哲学,而且也可以向前代的唯心主义哲学批判地有所继承。

属于这类思想资料的,最容易看到的就是哲学中的各种概念、范畴。每一个哲学概念,在唯物主义那里和在唯心主义那里的含意有原则上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一切哲学概念获得了以往任何哲学思想所不能比的完全科学的内容,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重新提出来整套的哲学概念和范畴,而正是继承了以往的哲学。因为每一个哲学概念的形成,其内容的发展和变革,都反映着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如果同这个认识过程隔绝开来,人们就不可能进行哲学的思维。

既然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也不能不包含着对于客观实际和人的思维活动的某些片面的反映(这片面是被夸大了,并且被加上错误的解释),既然唯心主义哲学也曾经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问题(但它不能解答这些问题或作了错误的解答),那么唯心主义哲学也就提供了许多为唯物主义者所可以吸收,也应当吸收的思想资料。唯物主义驳斥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提出与之对立的观点,但同时又利用对方所提供的某些思想资料,加以改造,这种情形在哲学史上是常有的。



冯友兰先生在另一篇文章(《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人民日报》1956年10月23日)所说的王夫之经过程朱而继承张载的情形就可以这样来说明。张载把物质性的“气”看作万物的本源,而程朱则说“气”之如何形成万物是由“理”来决定的,认为“理在事先”。张载的哲学思想中已经有“理”这一概念,程朱在唯心主义观点上发展了这一概念。后来的王夫之等人继续探讨“理”和“气”的关系,发挥了“理在事中”的主张。王夫之等人是在根本原则上驳斥了程朱,而又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利用和改造了程朱提供的思想资料,所以他们能够比张载的唯物主义走得更远一点。冯友兰先生说得好:这里是王夫之“经过程朱,而又撇开程朱,经过程朱,而又继承张载”的辩证过程。

有人说,王阳明的“良知良能”学说包含着要求人不盲从、独立思考的意思。对此,我们应如何估价呢?对于独立思考,有唯心主义的了解,也有唯物主义的了解。在王阳明那里,独立思考的命题浸透着主观唯心主义的气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从唯心主义出发的独立思考的主张也可以起打破传统束缚的作用。但是以所谓发自内心的天赋观念为是非的标准,那么独立思考实际上必然会转变为其反对物——盲从。所以唯物主义者既不抹煞某些唯心主义者提出独立思考的历史意义,也不能简单地接受唯心主义的独立思考的命题,而必须加以根本改造,使独立思考建立在承认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面。

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资料,这对于唯物主义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所以前代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越是广泛地讨论了各种问题,那么反对这种唯心主义哲学而发展起来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内容也常常能够越加丰富。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是一种原则性的对立,所以辩证法不能够



在根本观点上继承形而上学，正像唯物主义不能够在根本观点上继承唯心主义一样。但是在哲学史上辩证法曾经同唯心主义体系相结合而成为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者在批判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时，可以吸取其辩证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认为十分重要，必须批判地吸取的思想资料。

有人说，唯心主义哲学中的可供吸取的合理要素是同客观实际相符合的，所以就应当把它看作唯物主义。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固然在有的唯心主义哲学中，可能包含着同它的体系相矛盾的在个别问题上的唯物主义观点，但是在唯心主义哲学中所包含的各种片面地符合实际的思想，已经被加上了唯心主义的解释，浸染了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那就决不能认为是唯物主义的了。

也许有人会说，这里所说的哲学思想资料的继承问题，就可以用冯友兰先生所说的抽象方法来解释。只要把这些思想资料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关系隔绝开来、抽象起来看，它们正是在哲学思想中能够为一切阶级服务的、无党性的成分。继承就是继承这个成分。冯先生的文章中说，马克思从黑格尔接受辩证法就是接受辩证法的抽象意义，黑格尔说的发展是绝对观念的发展，我们则“取其发展的抽象意义，而不是取其具体意义，就是说，‘取其发展’而不取其‘绝对观念’”。

我们认为，这种简单化的解释是不能成立的，它并不能帮助我们实际处理继承问题。

唯心主义哲学中之所以有一些思想资料可以让我们吸取，并不是像上面所说，因为在那里面有唯物主义的成分，也不是因为在那里面有既非唯物，又非唯心的成分。在程朱哲学中并没有既非唯物，又非唯心的“理”的观念，在王阳明学说中也没有这样的中性的独立思考，同样的，要在黑格尔体系中找到既不唯物又不唯心的辩



证法也是找不到的。当我们把这些思想资料从唯心主义体系中解放出来以后,也不是使它变成既非唯物又非唯心的成分,而是要给以唯物主义的解释,使它和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结合起来。

唯物主义者吸收唯心主义哲学所提供的种种思想资料,绝不是很简单地好像从旧房子上拆下砖瓦来安到新房子上一样。旧房子上的那块砖瓦的确就是新房子上的这块砖瓦,但某种思想资料从唯心主义大厦上移到唯物主义大厦上来,必须经过批判和改造。要给它唯心主义体系中所受到的歪曲、变形、限制改正过来,然后才真正对我们有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黑格尔决不是抛弃其唯心主义而照原样地取其辩证法,抛弃其绝对观念而照原样地取其发展观点。他们再三强调不要忽视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时指出了“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所遭受的神秘化”(马克思),“这个方法就它在黑格尔那里所具有的形式来说,是不适用的”(恩格斯),等等。

因此,唯物主义要从唯心主义哲学中取得为自己所需用的思想资料,决不能靠头脑中抽象一下的办法,而必须切实地对这些思想资料进行鉴别、审查、剖视,并从而进行修正、改造、发展。

唯物主义者如果能够这样做——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是应当能够这样做的,——那么,历史上一切唯心主义哲学家遗留下来的著作对于我们就会是重要的财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超过过去的一切唯物主义者而把唯物主义哲学推向前进,其重要条件之一是善于从唯心主义哲学中批判地吸取各种有用的思想资料。恩格斯曾这样说:“古代希腊人和我们中间存在着两千多年的本质上是唯心论的世界观……要知道解决问题决不是把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一笔勾销就算完事,而是要批判它,要从错误的但在当时的历史发展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唯心论形态中、从这个暂时



的形态中剥取有价值的成果。”^①

只要能够这样做,我们甚至也能够从现代腐朽的资产阶级哲学的著作学到点东西。列宁把现代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称作“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而经济学教授则是“资产阶级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并且认为,他们“在一旦谈到哲学问题的时候,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相信。”但是他又说:“无论在哲学上或经济学上,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汲取和改造这些‘帮办’所获得的成就(例如,在研究新的经济现象时,如果不利用这些帮办的著作,就不能前进一步),并且要善于消除他们的反动倾向,贯彻自己的路线,同敌视我们的各种力量和阶级的整个路线作斗争”^②。列宁的这个指示,对我们现在也是适用的。郑昕先生在《开放唯心主义》一文中曾提到“对现代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者的估计”的问题。暂且把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阵营的动摇和分化的情形除外,只就列宁所说的“帮办”而言,那么我们对这问题的答复就是:如果只看到他们的“帮办”的身份,而忘记了他们是“有学问的帮办”,他们的学问中有许多内容值得我们来汲取和改造,那是错误的;同时如果在我们进行汲取和改造的时候,不能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善于破除他们的反动倾向,善于坚持自己的路线”,那也是错误的。

关于哲学上的继承问题,我以为,可以由此得到比较完全的看法。

因此,在继承哲学遗产的问题上,我们断不能把接受和批判这两件事绝对地对立起来,不经过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而一概否定,这

① 《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3页。

②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359页。



种粗暴的态度是我们所不取的。不经过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而谈接受,这种囫圇吞枣的办法也是我们所不取的。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的成绩,一般说来,还是以单纯描述前人的哲学思想为多,而真正做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评论的很少。我们应当继续反对反历史主义,不能以现在的标准要求古人,但这并不是说,不要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眼光来评论前人的思想。这种评论不仅是要指出错误观点的本质,揭发思想体系内部的矛盾,而且要点明使前人失足和迷途的陷坑和关键,要把有价值的论点从各种神秘的烟幕和片面性的歪曲中挽救出来,要阐明过去的哲学家虽然能够提出却不能解决的许多问题。如果只是在叙述了一家哲学思想的合理因素以后,再说几句由于时代的限制,所以还有某种缺点,未可深责等等,这说不上是科学的分析和评论。只有在我们真正对于各种哲学思想作了科学的研究,作出正确的分析和评论的时候,继承问题才能真正解决。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吸取前人思想斗争的经验,并且能从大量遗产中取其菁华,而不是像拣垃圾似地只是拣来几块破铜,几只朽烂的铁钉。

五

上面关于继承问题的说明也可以用来说明哲学史的民族特点的问题。

各民族的哲学史,归根结底,都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但是不仅斗争的深广程度不会完全一样,而且所着重的具体问题也会不同,对同样的问题还会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更不用说所提出的论证和表现形式的不同了。哲学史的民族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这一民族在历史上所经历的思想斗争的具体形态和所积累



的思想资料的具体状况有关的,而这些又和这一民族的政治斗争的历史和各部门科学的知识的发展状况直接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在浸染着民族文化传统的社会生活中从事思想工作,从更好地进行当前的思想斗争这一点上来看,也必须对本民族哲学史上的各种哲学倾向表示态度,必须答复本民族哲学史上提出的各种问题,必须善于继承本民族哲学史上的一切优秀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的)传统,并且善于利用先人留下的可以利用的一切思想资料。只要这种民族的特点,的确是有现实的基础的,那么它能够反过来丰富作为进步人类的共同财富的马克思主义宝库。

中国哲学,在其三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曾经同东方的有些邻国有密切的交往,但是大体上说来,是长期同欧洲的哲学隔绝着的。这就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有责任更多地注意哲学史的民族特点。而科学地、深入地研究中国哲学史,也一定能够对于论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有所贡献。至于那种认为中国哲学同西方哲学彻头彻尾地不同,甚至根本没有什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一类看法,是我们所不同意的,因为那是同事实不相符合的。

对中国哲学史的科学研究的初步成就,至少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基本原则对于中国也是完全适用的。但是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只靠原则“吃饭”。马克思主义原则对我们起着指导的作用,但它也只能起指导的作用。它提供了正确的观点和方法,使我们在深入到大量的纷繁复杂的具体材料中的时候,不至于迷失方向。它决不代替具体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从来没有预约过任何简易的公式,而且总是同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可以套用的公式的倾向做斗争。事实上,凡是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人一定会弄到使马克思主义变形、歪曲,而破坏了马克思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



创始人强调的是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把理论当做行动的指南,而在科学工作上,就是要大量占有材料,进行艰苦的研究工作。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①。“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的历史资料,才可解决这样的任务。”^②

有人提出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范围的问题。如果说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所应当注意的范围,那么,这个范围不是很窄,而是很广的。对于一个思想家如果只注意他的明显地属于哲学性质的一部分著作,而不管他对各种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反映,是不可能把他的哲学思想说清楚的。对于一个时代,如果只注意用比较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哲学思想,而不管当时表现在科学、政治理论、社会观点、文艺理论中间的哲学思想,也是不可能把当时的哲学思潮说清楚的。哲学思想斗争常常是同时代的各方面思想斗争的集中表现,如果不了解当时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状况,当时各阶级和阶层的政治、思想各方面的动态,哲学领域内的斗争是不会得到真正透彻的说明的。一本哲学史教科书中所说的范围当然不能不是有限的,但是一个哲学史家在研究过程中所注意的范围,一定要比哲学史中的有限范围广泛得多。我们都不满意于在教条主义习气下的简单化。真正克服简单化的方法就是掌握丰富的材料,并且抵

① 《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2页。

② 《卡尔·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7页。



制各种把马克思主义原则片面化的倾向,认真地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指导下,从实际材料出发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除此以外,任何捷径是不会有。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9、30日。



正确地对待善意的批评

我们的党从来都教育党员经常重视群众的批评。最近期间，我们的党为了开展整风运动，特别向党外人士广泛地征求批评。从中央到各省市、各机关、各高级学校的党组织都召开了座谈会，或者采取其他各种措施，听取党外人士和广大的工作人员的批评和建议。党外人士对党的批评，一般工作人员对领导人员的批评，正在全国范围内活跃地展开。

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以外，我们的党没有，也不应当有任何私利。我们身上的任何缺点和错误都会造成对人民不利的结果，我们必须坚决地加以消除。我们知道，广大人民对我们的党的信任之所以毫不动摇，就因为我们能够不断地消除自己身上的缺点和错误而前进。党外各方面对我们党的工作的意见，是我们所不可缺少的镜子，从这里常常可以反映出有些我们自己一时还看不到的东西，使我们的工作更容易改进。我们愈是虚心听取党外群众的意见，并且努力改正自己的错误，党和群众的团结就能够愈加巩固。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党在开展整风运动的时候，决定放手地发动群众对党进行批评。

事实证明，党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绝大多数群众对党是信任和热爱的，他们对党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就目前的情况看来，各方面对党组织和党员的批评，绝大部分是好的、



正确的、对党有益的。的确，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下，也出现了一些仇视社会主义、仇视共产党的恶意的破坏性的言论。少数右派分子企图把群众的批评引入歧途，利用批评运动达到削弱社会主义事业、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削弱党的领导的目的。因此，我们必须对右派的言论给以坚决的回击，使群众的批评得以健全的发展。但是，毫无疑问，我们绝不能够因为出现了右派的错误言论，因为对于这些错误言论进行了反批评，就放松对于一切善意的批评的鼓励和支持。我们决不能够混淆广大群众的善意的批评同少数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批评之间的根本界限，尤其不能够容许某些觉悟不高、作风不好的党员借口对右派分子的回击，就不理睬群众的批评，甚至对批评者施行打击和报复。相反，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继续鼓励和支持广大群众的批评，继续认真地解除他们的一切可能的误解和顾虑，并且坚决依靠广大群众的监督和帮助，改正错误，改进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决不能有任何的动摇。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会使是非混淆，就会使整风运动半途而废，那就恰好达到了右派分子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所谓善意的批评，是否必须是完全正确的呢？当然不是如此。批评者即使由于情况了解得不完全、不确切，因而提出的意见不完全正确，但是只要他是本着改进工作的积极目的而提出意见，这至少对于消除相互间的隔阂是有好处的。我们必须把这种批评同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的批评严格地加以区别。这种批评虽然是不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仍然必须首先注意它们的合理的方面和正确的部分，不要因为它们有些错误，就一概加以抹煞。但是，这种批评既然有不正确的方面，也应当在适当的时机用适当方法向批评者进行必要的解释和批评，使批评者了解事实的真相和全貌。

群众的批评采取了尖锐的形式，这好不好呢？这没有什么不



好。我们应当善于冷静地分析这种尖锐的批评，不要因为尖锐就受不住，就暴跳如雷。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尖锐的批评可以是完全正确的，温和的批评也可以是完全错误的。当然，有些批评者片面地追求尖锐，不免使批评带了片面性，但是只要这种批评在根本上仍旧是善意的批评，那么我们就仍然应该肯定它们的正确的成分，心平气和地同批评者进行讨论，也一定能够达到相互的理解，并且逐步地帮助批评者克服片面性。

如上所说，由于善意的批评有时也是不正确的，而且这种批评者由于立场不坚定，认识不全面，甚至会在短促的时间内附和右派的言论，所以人们有时不容易一下子就区别出善意的批评和右派分子的恶意批评。因此，为了区别这两种批评，我们必须采取谨慎态度，进行全面分析。我们不但要自己学会作好这种区别，而且要帮助一切善意的批评者也学会同右派划清界限。

我们已经说过，在广大群众的批评中，绝大多数都是正确的，至少是部分地正确的。这些批评帮助我们揭露了我们的工作中的许多缺点和错误。凡是正确的批评，我们都应该勇敢地接受。谁要是为了面子、架子而不接受正确的批评，谁就不能作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应该毫不踌躇地承认那些被群众正确地指出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且迅速采取实际办法来实现他们所提出的一切合理的要求和建议。凡是能够马上改正的错误要马上改正，能够马上解决的问题要马上解决。各级党组织根据中央整风指示中所提出的边整边改的原则，已经接受党外的批评而开始解决了一些问题，但是总的说来，在这一方面做得还很不够。在我们已经开始对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论进行回击以后，我们应当很快地腾出手来，认真地解决一切需要马上解决、也可以马上解决的问题。当然，也有一部分批评和建议是否正确，一下子不容易弄清楚，或者问题比



较复杂,牵涉的方面比较广,不应该轻率地作出决定。这些是完全可以同群众讲清楚,并且得到群众的理解的。但是很多批评和建议的正确性是很明显的,接受这些批评,实现这些建议,并没有什么困难。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一定要马上行动起来,加以解决,至少开始动手去解决,而不要拖延搪塞,让缺点和错误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让群众帮助党整风的宝贵热情受到挫折。

少数右派分子尽管想用他们的破坏性的言论来扰乱我们的整风运动,但是我们的整风运动一定要继续进行到底,吸收党外群众帮助我们整风这件事也一定要继续进行到底。我们愈能够坚决地接受一切善意的、正确的批评,愈能够迅速地改正错误,改进工作,党和广大群众的团结也就愈能够巩固,而右派分子也就愈陷于孤立。反对和孤立少数右派分子,同时同一切向我们的党善意地提出批评的党外人士和广大群众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手携手地为改进党的工作、加强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这是保证我们的整风运动健康地发展的必要条件。

本文是《人民日报》1957年6月12日的社论。



从“不满”说起

当人们从事一种改革的时候，总是对原来的某种情况感到不满。由于不满，就要改革；由于改革，就有进步。这样说来，不满正是进步的推动力量。

但是，只要是不满，就能推动进步么？不是的。对于任何事情都要分析，对于“不满”，也要分析一下。

究竟对什么事情不满，这当然是应当首先弄清楚了的。看起来是对于同一个事情表示不满，但出发点完全不同，所希望达到的结果也完全不同，这种情形也是常常可以看到的。

举一段历史做例。50多年前，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君主立宪运动受到了当时顽固的封建势力的反对，要砍他们的脑袋。但另一方面，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在成立后就展开了对立宪派的批判。——顽固派不喜欢康、梁，是因为康、梁要求太多的改革；同盟会批判康、梁，是因为康、梁所主张的只是那么一点改革。顽固派企望压碎康、梁的运动，使一切事情照旧不变；同盟会是要跨过康、梁而更往前进。

在思想斗争中常常有这种情形。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受到来自两方面批评。辩证唯物主义批评它，是因为这种唯物主义缺乏辩证法，这种批评的目的是要使唯物主义摆脱形而上学而向前发展。但另外也有一种人，他们反对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是利用这种唯



物主义的缺乏辩证法的低级状态来反对唯物主义；他们的目的不是使唯物主义成长起来，而是用唯心主义来代替唯物主义。同样的，教条主义也受到两方面的批评。我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僵死的教条，要克服教条主义而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生动活泼的战斗力量。但也有人反对在反对教条主义名义下反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他们硬说，承认马克思主义原理就会成为教条主义者，要反对教条主义就得抛弃马克思主义。对于有教条主义习气的人，我们不满，因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太少；修正主义者也表示不满，因为在他们看来，教条主义者手里的马克思主义留得太多了。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提到“从左来的和从右来的康德主义的批判”。康德是二元论者。对于二元论，彻底的唯心论者和彻底的唯物论者都不会满意。但是在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批判。列宁说：“马赫主义者批判康德，是因为他是过火的唯物主义者，而我们批判康德，却是因为他是不够格的唯物主义者。马赫主义者从右边批判康德，而我们左边批判康德。”^①两个不同的出发点，必然带到两个不同的结果上去。创立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的德国教授阿万那留斯自命为批判康德而创立了哲学上的“新”方向。但列宁指出：“他不像唯物主义者那样从左边同康德进行斗争，而是像怀疑论者和唯心主义者那样从右边同康德进行斗争。他自以为前进了，实际上他后退了。”^②

同盟会是从左面来反对康、梁的立宪运动，而封建顽固派是从右面来反对。我们是从左面来批判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而唯心主义者是从右面来批判。这种区别十分重要。

① 《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第205页。

② 同上书，第203页。



一个出发点是左面，一个出发点是右面。出发点相反，方向也就相反。一个是把事情往前推进，一个是往后拉。

在我们的国家里，已经基本上完成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事业正在继续向前推进。对于现在的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两种不同性质的不满，从左面来的和从右面来的。

社会主义制度好不好呢？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认为：好得很。第一，消灭了剥削；第二，造成了社会生产力大踏步前进的可能。我们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了从私有制社会到公有制社会的大变革，对于这，我们是完全有理由感到满意的。但是我们并不以此为满足。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不等于这个制度已经完全巩固了。新的社会制度在各方面完全巩固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还需要人们做很多努力。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更不等于一切事情都办好了。要利用新的社会制度所提供的一切可能性，来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使我国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需要作更长期的努力。我们现在所正在建立起来的是低级阶段的公有制社会，就是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我们并不以此为满足，我们准备用更长时期的努力来把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推进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如果我们满足于现状，满足于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起来的状况，满足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就不能前进。而且在我们的以往和现在的工作中间，由于工作者缺乏经验，还没有充分了解新的社会制度下的客观规律，或者由于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1页。



到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种种腐朽的思想作风的影响,而发生了种种缺点和错误,对于这些缺点和错误,感到不满意是应当的。从左面来同这种缺点和错误做斗争,就是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为目的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从左面来的批评是我们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表现。

还依恋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不愿意放弃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的人,对于当前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感到不满,而且很强烈的不满,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是从右面来的不满。许多事情不能使从右面来的人感到满意,并不是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刚刚建立起来的阶段,因而显出了某些幼稚和不成熟的状况,而是因为我们居然已经在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由于这个新社会还不免保留“其所由脱胎出来的旧社会的痕迹”,而是因为这已经是在原则上不同于旧社会的一个崭新的社会;也不是由于我们在工作中还有不少缺点和错误,而是因为虽然有这些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已经在建设新社会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从右面来指摘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其实是利用这种缺点和错误来反对社会主义,它所指向的目标乃是退回到旧社会去,退回到少数特权者压迫多数人的社会去。

一个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这里的区别本来是很明显的。但因为从这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的不满和批评有时似乎针对着同一的现象,在这时候,有些人就感到不易区别了。例如,对于在民主集中制下的某些不必要的过多的集中的现象,我们提出批评,我们坚决维护为建设社会主义所必要的集中而在此前提下主张扩大民主。可是有人却认为,既然过多的集中不好,那就根本不要集中。他们事实上是从资产阶级民主观点出发



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这是从右面来的批评。从右面来的批评常常用这种方法来造成混淆。有些对于某种不好的现象怀有正当的不满，但同时对于自己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还不够明确的人，就往往会被从右面来的批评所迷惑。

我们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因为这些坏思想、坏作风是同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不相容的，是同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6亿人民共同奋斗的要求不相容的。社会主义不是在什么绝对纯洁的“天国”里建设起来的，这里有种种污秽的垃圾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我们深信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具有战胜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力量，我们坚定地把社会主义事业向前推进，不断地同在工作干部中的一切足以损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坏思想、坏作风斗争。

从右面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人，把自己打扮成是“反三害”的彻底而坚决的战士。他们反对得甚至比我们“彻底”得多呢！他们是这样地“彻底”，以至于他们不能忍受任何一句赞美社会主义制度的好话，因为据说，说一句好话，就会妨害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斗争。他们是这样地“彻底”，以至于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存在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要比一切坏的东西更坏，所以“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坏”。他们是这样地“彻底”，以至于他们认为必须断定，既然在这个新的社会制度下还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就应当抛弃这个社会制度。

所以对于“不满”必须分析。事实上，有种种不同的不满，而这里所说的左面和右面的区别是最带根本性的区别。

既然有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不满，两种不同立场的批评，那么应当怎么样呢？我想，应当这样：



第一,不要因为从右面来的批评就不敢从左面来进行批评,或不理会从左面来的批评;

第二,必须严格地区别从左面来的批评和从右面来的批评,揭露从右面来的批评的真面目,不让右面来的声音混淆我们的方向;

第三,但也不妨听听从右面来的声音,只要我们自己立定脚跟,从右面来的声音也可以让我们学到点东西,使我们更聪明一些。

对于不满的分析,除了来自左面的和来自右面的区别以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谈一下,这就是从实际出发的问题。

不真正接触实际,也不企图真正了解实际生活中的复杂内容,是很容易这也不满,那也不满的。为什么不满?因为他脑子里有一个极端“圆满”而“美好”的图案。这个图案不是从现实中来的,现实生活也永远不会完全符合于他的图案。

要求从实际出发,并不是要人安于现状,不是要人承认实际存在着的一切都是绝对合理的,都是不可改变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客观地全面地了解事实,研究事实,掌握客观的规律,根据客观规律来看出何者应兴,何者应革,如何兴,如何革。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尊重客观事实的人,同时又是最不怕变动,最敢于、也最善于进行变革,推动社会前进的人。不认真地看实际生活的人,虽然好像有什么美好的理想,但从他们的虚构的理想出发,除了得到对现实的不满以外,是什么结果也没有的。因为不能拉着自己的头发升空而愤懑,因为现实生活并不像“天国”中的“乐园”一样而不平的人,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家。

饭是要一口一口吃的,路是要一步一步走的。因为才只走了几步,前面路还长而不满足,要继续走下去,这是好的。如果因为不能一步跨到将来,硬要拿将来的远景衡量今天的事情,于是愤愤不



平,这难道有什么意义么?大家知道,如果用现代的标准来看过去时代的人类文化,认为一切都是荒谬无稽,这叫做反历史主义。那么,一个人生活在现实中,却用他所设想的将来社会中的标准来看现在的生活,对一切表示不满,这叫做什么呢?大概可以叫做反现实主义。

对我们工作中存在着的缺点和错误应当不满意,但是在这里也有是不是从实际出发的问题。真正从实际出发,人们就能够恰当地估计这些缺点和错误,看出它们产生的根源,从而找到克服它们的途径。反之,不从实际出发的人,对于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好像是深恶痛绝,但是并不了解。这些缺点和错误对于他们是不可理解的怪物,从而也成为不可克服的东西。

从一种虚构的幻想和脱离实际的主观愿望出发,而对现实生活表示不满,这种情形在有些青年知识分子中常常会发生。由于缺少社会生活的实际知识,缺少阶级斗争的经验,他们有这种缺点是可以理解的。应当帮助青年人学会马克思主义的从实际出发的态度,使他们的求进取的可贵热情建筑在承认社会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面。

还必须指出,是否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其实仍旧是同上面所说的左面和右面的区别相关联的。

真正的左一定是从实际出发的:要向前看,同时不脱离当前的实际。那么,从虚构的图案出发来提出种种不满的人是右还是左呢?说他是右,他大概是不肯心服的。他总想使人相信他决不是向后看的右,而是向前看的左。但是要知道,不能真正看清楚现实生活的人也一定是看不见真正的将来的。他所看到的不过是他自己制造的幻影。他既然不是依据生活发展的客观规律,他就只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来虚构他的美好的幻影;而在知识分子中间有很深



影响的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就在这种情形下很自然地成为他的依据。用绝对自由的概念来反对任何集中的人,自以为提出了比民主集中制更远大的“理想”,其实不过是接受了关于个人自由的资产阶级观点。凭借这样的“理想”来对社会主义的现实表示不满,这难道可以叫做左么?

所以脱离实际,要求一步登天的想法,貌似很左,其实是必须加上引号的“左”,这种“左”是很容易引导到右去的。鲁迅曾经说过:“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①。鲁迅讲的是30年前国内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时期的情形,但这话对于今天仍旧是适用的。

因为一些缺点而否定一切,这看来是很“彻底”了,但这一来,恰恰“彻底”到了反对社会主义,企图退回资本主义去的右翼阵营里去了。这里仍然可以借用鲁迅的话:“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晒。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鲁迅认为,这种高谈阔论的“貌似彻底的革命者”,其实呢,恰恰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②。

既然“左”可以引导到右,所以自觉地从右出发的不满往往也利用“左”的形式来俘虏那些“关在房子里的高谈彻底的主义”的人。前面我们也已经说到,右派分子有时这样表示,好像他们并不是不要社会主义,只是因为太痛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

①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233页。

②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鲁迅全集》第4卷,第226—227页。



主义了,以至他们宁愿抛掉社会主义。他们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是反对得这样地“彻底”、这样地“左”,——右的声音和“左”的声音也就这样地混合到一起去了。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16日。



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 输入中国的意义

—

资产阶级社会学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到中国来的。中国的社会学家一般是抄袭和复述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的议论。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严复翻译了斯宾塞的《社会学导言》一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在《国闻报》上发表。以后他译完了这本书,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出版。当时他把社会学译作“群学”,书名称为《群学肄言》。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就在这开始传入中国。

斯宾塞(Spencer, 1820—1903)和比他略早的孔德(Comte, 1798—1857)被认为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创始人。他们之所以取得这种地位,不仅是因为他们开始使用社会学这个名称,而且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的时期,他们所提出的社会学学说是适合于这个时期的资产阶级的需要的。孔德和斯宾塞表面上好像是要使社会学的研究成为科学,实际上却是在科学的名义下为资本主义辩护,企图借助于伪造的科学来稳定资产阶级统治秩序。斯宾塞建立了在资产阶级社会学中有名的“社会有机体论”。他所说的社会的改进,就是使“社会有机体”的各



个部分得到“均衡”；实现了这种“均衡”，照他的看法，资本主义社会就能永远存在了。

斯宾塞的学说在 20 世纪初年输入中国起了什么作用呢？严复为什么对斯宾塞的学说发生兴趣呢？也许有人认为，当时正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在那时候介绍这种社会学大概就是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严复是在 19 世纪 90 年代提倡资产阶级的“新学”的人们中的一个。当时提倡“新学”的人想使中国做到西方资本主义式的富强，而且要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式的政治。这是代表当时中国初兴的资产阶级的主张。但是如何实现资本主义呢？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分歧的主张：有一派人主张走改良主义的路，90 年代进行的所谓“变法”运动就是这一派人主持的。另一派人主张走革命的路。经过 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的百日维新的惨败，经过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以后，主张走革命道路的人渐渐地多起来了。有些主张走改良主义道路的人，这时因为看到革命潮流的兴起而感到害怕，就更加坚持改良主义道路；甚至为了“防止”革命，他们连改良也不要了。严复到了 20 世纪初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改良主义者。

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出版的那一年（1903 年）正是革命思潮开始高涨的时候。在这时候，严复反对革命的态度是很明显的。在他同时翻译的《法意》一书里，他所加的按语中有这样的话：“不佞非曰吾法不当变，特变之而无其学识，姑耳食而盲随焉，其后患且烈于不变。沮吾国之进步者，必此耳食而盲随者矣。”^① 1905 年，

^① 《法意》第 20 卷，第 12 页。根据商务印书馆《严译名著丛刊》的本子。



严复在伦敦遇到孙中山，他向孙中山表示：“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之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①这种否定革命的必要和可能的“教育救国论”，同当时正在积极鼓吹革命的孙中山，是正相对立的。

为了抵制资产阶级革命的学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竭力为自己的立场寻求理论根据。严复介绍斯宾塞的书，就是这个目的。为什么斯宾塞的书适合这个目的呢？这里可以从《群学肄言》的结论一章中引录一段话来看看，这段话是这样的：

“通夫群学之道，则门户异同之争可以息已。政制之主于君民，宗教之标夫新旧，自吾学以观之，要皆天演之一时已耳。群众者，兼谋新率旧而并存之者也。以言其谋新，虽今之极意更张者莫能过也。以言其率旧，虽今之力为墨守者莫与京也。使知群者乃天演之委形，其强弱文野，虽万不齐，而法制功分之间，各有其时地之相得。故以义观之，虽极其所谓恶，而是恶者亦必有其所以存，故不恶者转以不宜而莫用也。故愤愤于专制压力之感情，虽救时悼世者之所为，而无所容心于吾学。又使知群之演也，若骤若驰，遽古以来，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迁，虽至于今，成而不恃，所谓进者，非有迟也，且加疾焉。则虽生人祈响之最隆，以其不息之行，将有时而自至，况其演进之度，将或出于今人之所不期者耶，则深根宁极俟焉可耳。由前之说，虽率旧者，有不能也。由后之说，虽谋新者，有不逮也。……”^②

① 严复：《严复年谱》。

② 《群学肄言》，第361—362页。商务印书馆《严译名著丛刊》的本子。下同。



这段话意思主要是说,对于旧的事物用不着去反对,对于新的事物也用不着努力去争取。你以为旧东西很坏么?但既然它存在着,它就有存在的理由,你反对也没有用。你祈望新东西么?该来的新东西自然而然就会来,甚至还会比你所料想的来得更快。这在表面上好像是对于社会采取客观的、科学的态度,实际上是模糊了新和旧的区别,否定了人在社会生活中革旧创新的主观能动作用。所以,严复所加的批注认为这段话是说,“通群学则可以息新旧两家之争”,就是说,懂得了社会学,就可以停止在新旧之间的斗争了。这段话接下去又说:

“得吾说而存之,彼两家之难可以解。夫维新之急者,有所祈也,守旧之笃者,有所惧也。惟群学通,则祈与惧皆可以稍弛。盖深知夫群之差数功分,皆取决于其民德之何如。使本弱也,而忽强;本贫也,而忽富;本僿野也,而忽文明,必无是也。民德未孚,虽以术为之,久乃废耳。又使知政刑礼俗,所以成其如是者,一一皆有其本源。则图进步者,知旧法皆有一时之最宜;言率由者,知成功者之宜退。如此则公输之攻可以稍缓,而墨翟之守亦可以息肩已。是故用天演之说以言群者,将所以除愤解器,而使出于中庸之道而已。”^①

这里说的,正是上述严复向孙中山讲的意思。当“民品”劣、“民智”卑的时候,根本不应当妄想什么革新。弱的穷的人只能永远是弱的穷的,或者只能慢慢地强起来,富起来。主张革新的人不必着急,守旧的人也不必害怕。一切事情都是自然而然地向前进化的。所以说,这种社会学说的目的就是要“除愤解器”,就是要熄灭新旧之间的斗争,要熄灭社会阶级间的斗争。

^① 《群学肄言》,第362页。



这些话虽然是翻译文章，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严复是把自己的感情和思想写进去了。为表明他翻译斯宾塞的目的，严复说：

“窃念近者吾国，以世变之殷，凡吾民前者所造因，皆将于此食其报。而浅謏剽疾之士，不悟其所从来如是之大且久也，辄攘臂疾走，谓以旦暮之更张，将可以起衰，而以与胜我抗也。不能得，又搪撞号呼，欲率一世之人，与盲进以为破坏之事。顾破坏宜矣，而所建设者，又未必其果有合也。则何如稍审重，而先咨于学之为愈乎？”^①

这段话正是针对着当时的革命派而说的。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大多是年轻小伙子，在旧社会里没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严复用了一种老爷的态度来教训革命派：你们根本不懂得社会进化的道理，你们没有学问，你们只会盲目地进行破坏，你们应当好好求学，然后你们就知道革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学问，在严复的手里，成为吓唬革命派的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当时的革命派的学问可以说不如严复，因为严复能够翻译赫胥黎，翻译斯宾塞，翻译孟德斯鸠。但是真理究竟是在谁的手里呢？是在当时的革命派手里呢，还是在当时的改良派手里呢？革命派主张用革命的方法推翻封建统治政权，在这点上，真理是在革命派手里。按照严复所夸耀并用以吓唬人的学问说来，革命是不可能的，是困难得很多的，是只会有害处没有益处的。

显然，在严复看来，把欧洲资产阶级社会学介绍过来，就是为了证明中国不应当革命，而只应当慢慢地改良。所以在《群学肄言》中，严复反复地加上按语说：“呜呼！此吾国变法之所以难也”，

^① 严复：《译群学肄言序》。



“呜呼！观于此而知吾国变法当以徐而不可骤也”等等^①。

斯宾塞的社会学，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起抵制革命的作用，这不仅是严复的看法，其他许多人也是这样看的。

在《群学肄言》出版的这一年，斯宾塞死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为表示哀悼发表了《大哲斯宾塞略传》一文，其中认为，斯宾塞的学派“为英国民族之产物，以其兼进取与保守两主义而调和之也”^②。文中又解释说：

“先生以天演言群治，极言天下无不果之因，亦无不因之果，故急激之破坏非先生所赞也。破坏旧瘤，曷为不赞？先生以为是固终不得破坏也，破于此而复现于彼，坏其一而复造其二三也”^③。

《大哲斯宾塞略传》一文中还根据严译本引用了《群学肄言》中论及法国革命的一段话。在这段话里，斯宾塞对法国 1789 年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了攻击，认为那种激烈的政治改革只能造成恶果。《新民丛报》是当时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最主要的杂志，对于这种议论当然是十分欣赏的。

当时上海出版的一种《中国白话报》杂志，内容比较倾向于革命。在 1904 年初，这个刊物上说：“现在还有一种治新学的人，看了几部《群学肄言》等书，便满嘴说平和的好处，看见激烈的人便说他不晓得进化的层次”^④。可见由严复从西方贩运来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在当时所起的就只是阻挠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作用。

在辛亥革命以前，除了严复介绍资产阶级社会学以外，还有人

① 《群学肄言》，第 53、58 页等处。

② 《新民丛报》第 38、39 期合刊，第 95 页。

③ 同上书，第 113 页。

④ 《中国白话报》第六期，1904 年出版，第 59 页。



以日本人的著作为蓝本编译了几种社会学的书。他们已经开始用“社会学”这个译名。资产阶级社会学在法国和英国创立后,在美国特别兴隆。经过日本人的手,现代美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这时开始输入中国。贩运这些货色的人也明白地说,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推动革命,而是为了反对革命。可以举1911年,即辛亥革命爆发这一年出版的《社会学》一书为例。这本书以日本人远藤隆吉的论述为依据,远藤隆吉则是祖述现代美国社会学家季廷士(Giddings, 1855—1931)的,而季廷士一类人的“学说”无非是斯宾塞的社会学加上一些花样而已。在这本书里,也对欧洲18世纪末叶到19世纪初叶的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了斥责,认为“扩张民权,颠覆政府”的“欧洲大革命”,虽然“卒收现今世界文明之幸福,影响大矣”,但是,“其说固由急谋改革而出此过激之论……流血惨剧亦非政治之正则也”^①。究竟应当采用革命的方法,还是采用改良主义的方法呢?这本书答复说,革命太“痛苦”了,虽然“结果非无利益”,但也不宜采取。这本书认为,既不能任其自然,也不能靠革命,“任自然与革命既皆不可恃,于是乃注重于学。盖社会学者直接而发现学问真理者也。真理研究之结果,知改良社会之所在;而其应用于社会者既非任自然,亦非全恃革命,乃由学术的方法以计其进步也”^②。这也还是在“学问”的招牌下反对革命的调子。

到了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初年,西方资产阶级为要全力反对无产阶级向他们进行的革命,所以连他们自己的先辈所进行的革命,也不能不加以诋毁了。按照这个时期的西方资产阶级利益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学,传到中国来,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时期,也就只能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用以反对革命的武器。

①② 欧阳钧编译:《社会学》,商务印书馆1911年版,第16页。



二

帝国主义国家很热心地要把这种社会学输入到中国来是可以理解的。美帝国主义特别着重从文化教育方面实施对中国的侵略，它为了在中国推广资产阶级社会学，花了不少力气。

在中国的大学里，在 20 世纪初年开始设立社会学课程，建立社会学系，这是和美国人有关系的。1908 年，上海的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创设社会学课程，由美国人亚塞·孟 (Arthur Monn) 讲授。1913 年，上海的沪江大学也开设了这种课程，并于 1915 年成立社会学系，讲课的也是美国人，即葛学溥 (D. h. Kulp)、白克林 (Bucklin)、狄来 (Dealey) 等人。北京的清华学校 (后来的清华大学) 在 1917 年设立由美国人狄德曼 (Dittme) 讲授的社会学课程。美国教会在北京办的燕京大学在 1919 年成立社会学系，系主任是美国人步济时 (Burgess)。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在一个长时期被认为是中国各大学中最强的一个社会学系，对于宣扬资产阶级社会学起了重要作用。

从美国的大学中“培养”出来了一批中国的社会学家，他们在回国以后成为推广美国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忠实的宣传者。在 1930 年左右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了一套社会学的丛书，共 14 册，由 9 个作者执笔，其中有 8 个人是从美国的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出来的博士和硕士。

前面说过，美国的社会学最初是经过日本人而到中国来的。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已经是从美国直接输入了。这时有美国人在中国讲社会学课程，也开始有从美国译来的社会学书籍出版了。如果说，在辛亥革命以前，严复和其他改良主义者介绍西方的资产阶级



社会学,是为了抵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那么从五四运动的时期开始,就是另一种情形了。中国无产阶级已经走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一天天发展起来了。抵制这个革命运动,反对马克思主义,就成为资产阶级社会学在中国所企图担负的任务。

为了说明自五四运动以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输入中国的作用是什么,在这里只举几个标本来看一下就可以了。

这里想提到美国一个资产阶级社会学家爱尔乌特(C. A. Ellwood, 1873—1946)的三本书,这是在五四运动后最初介绍到中国来的一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书籍中的主要的几本。它们的中文译本在1920年到1922年间出版,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这三本书的原著出版时间,一本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年,另一本是在战争期间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的那一年,还有一本则是在战争结束后。从这三本书中可以看到,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在世界历史已经进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很明确地把反对这个革命当成自己的任务。这也就决定了它在这时期输入中国所要起的是什么作用。

爱尔乌特和其他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一样,也是想把“科学”当做自己的旗帜,在“科学”的名义下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他在《社会学及现代社会问题》一书^①中这样说:“我们在用科学方法改造社会的时候,应当舍去马克思所提倡的社会革命,

^① 爱尔乌特:《社会学及现代社会问题》,赵作雄译,陶孟和校,商务印书馆版。原著1913年出版,中文译本1920年出版。



而别筹改良社会的正当方法，足以代替社会主义，以求良好的社会生活”（第 319 页）。又说：“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就是去考求怎样才能使人类全体能共同主宰生活的情形。社会主义家打算用经济革命的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社会学及社会科学打算用间接的科学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第 321 页）从这些说法中可以看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已经暴露，由于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在被压迫人民中间有了广泛的影响，所以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学的真实目的虽然是维持资本主义的现状，却也要用“改造社会”这一类的幌子来遮掩自己。照爱尔乌特一类人说起来，他们的社会学和社会主义不同的只是方法，只有根据他们的社会学，才能找到“正当”的和“科学”的方法。他们的所谓“科学”的方法，其实就是承认现状；他们的所谓“正当”的方法，就是不违反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用这种“科学”、“正当”的方法，来“改良”或“改造”社会，当然就要把“马克思所提倡的社会革命”“丢开”了。

这里的问题就是用革命的办法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在所谓“改良”的名义下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爱尔乌特在这本书中说，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的“穷人能掌有政权”，“把私有的生产资料变成社会公有”，“废除阶级，使世人经济的状况，一律平等”，等等，都是必须排斥的妄想（第 313、314 页）。

爱尔乌特所主张的“方法”，具体说来，到底是什么呢？据他说，一切社会问题都要从三方面去解决：第一，“从生物的方面，就是身体的遗传方面”，用“淘汰的方法，灭绝一切有犯罪趋势的人，使之不能繁殖”。也就是说，把一切在资产阶级统治者看来根本不应当存在的人，“劣等”的、“不适宜”的人消灭掉。第二，“从社会构造方面，就是改良社会的环境”。这就是说，要资产阶级统治者实行一些



“社会改良”的政策。第三,据说这是最根本的方法,“从个人的性质方面,用教育方法使个人在心理上适宜于社会”,要训练个人的智力、个人的性格,使个人完全能顺应生存的需要”,能“尊重社会制度”。这就是说,要把一切人训练得完全遵守资本主义的道德和法律(第 324、326 页)。爱尔乌特为资产阶级统治者设计的这种方法是各派资产阶级社会学者共同的方案。他们以为,在他们的方案中,既有“生物学”,又有“心理学”,所以他们完全有权利自称为真正的“科学”了。其实,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这种主张,不过是不惜用一切野蛮和欺骗的方法来维持自己的地位的资产阶级统治者的观点的集中反映罢了,哪里有一点科学的气味!

上面所说到的爱尔乌特的这本书,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版的。我们这里要谈到的另一本书《社会心理学》,出版于 1917 年^①。爱尔乌特的这本书明确地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面临着革命危机的恐慌心理。他说:“革命的结果既然不啻是社会的毁灭和灾难,那么去指出比革命更好的谋社会进步的法子,这件事就成了读人类史者第一个最应该负担的责任。”(第 169 页)所谓“比革命更好的法子”是什么呢?爱尔乌特劝告统治阶级,在革命危机迫在眼前的时候,应当善于“让点步”,“自己重新去整理各种制度”,这样,“阶级间公开战争可以免除,所谓和平的革命也就可以实现”(第 162 页)。爱尔乌特痛心地说:“拿革命去谋社会进步的主张,在西方文明各国现在已渐见流行了”(第 171 页)。他把抵抗这种“流行”的主张,当作自己的任务。他认为,社会学的“价值”就在于使人们懂得以革命来求社会进步是“代价太大的法

^① 爱尔乌特:《社会心理学》,金本基、解寿缙译,商务印书馆版。原著 1917 年出版,中文译本 1922 年出版。



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中，西方资产阶级所竭力想“免除”的无产阶级革命终于爆发起来了。此地要谈到的爱尔乌特的第三本书^①出版的时候，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在这本书中，一开始就指出了当时西方资产阶级所感到的“惶恐和悲观”。爱尔乌特说：“并不是惶恐没有根据。实在是今日世界的空气好像弥漫革命的精神。现在希望无产阶级革命可以整顿一切的人，不独在俄罗斯，即在各文明大国亦日见增。我们要想于此分裂的世界，重新树起和谐和好意的基础，但是因为有权阶级中的昏盲及利己心，和无权阶级领袖的阶级仇恨与狂妄急进主义，恐怕一切企图都要归于无效。”（第2页）

爱尔乌特在这本书里重复了那一套革命是应当力求避免的灾祸的论调。他说：“阶级斗争在组织适当的人类社会里不是常态，但是现在西方文明各国到处有阶级斗争的先兆。我们若不能胜过正在发生的阶级的仇视，那么，西方文明，迟早一定要有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间公开的血战。我们已经说过，那种冲突不会产出高尚巩固的文明”（第119页）。无论如何要阻止革命的蔓延。但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严重，怎么办呢？这是爱尔乌特这样的资产阶级学者所面对的问题。

为了抵制革命，资产阶级社会学者把自己装成好像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者。爱尔乌特说：“现在社会通行的资本主义，有些特点，可以深为指责，凡对于社会状态最有思想的学者，都是同声致讨”（第114页）。但是他劝告人们不要性急：“我们自然不能

^① 爱尔乌特：《社会问题——改造的分析》，王造时、赵廷为译，商务印书馆版。原著1919年出版，中文译本1922年出版。



希望四五代所养成的资本主义的罪恶，能殒灭于一日，实行平等自由的新产业组织能成功于一夜。总而言之，现在要忍耐，并且要试验着进行，不要忙着进到急就的社会变动，因为革命的变动的效验，不能预测”（第124页）。这就是说，资本主义虽然不好，但是人们必须忍受，因为革命会带来更坏的结果。而且照爱尔乌特说起来，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是有点毛病罢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是好得很的东西，无论如何动摇不得。他说：“私人所有权和私人企业心，亦有他们的益处，就是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家，只要稍微明了人类天性和人类社会，一定会承认的。私人所有权，有些地方好像私有家族对于社会的需要一样。史麻耳教授^①说，‘无论哪个细心读过十诫的，就知道私有财产是夹在字里行间’。私有财产制度是文明自身的基础之一，私有财产的成训，一定要当做社会秩序的基石保存着”（第125页）。他们知道，尽管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有一万种罪恶，但是只要把私有制度保卫住，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就还是能存在下去的。为什么私有制度万万不能动摇呢？因为这是符合于“人类天性”的，因为这是基督教《圣经》上的“十诫”所承认的；谁要是破坏私有制，谁就是破坏家庭，破坏人类的“文明”。这班资产阶级社会学者为了给私有制度辩护，的确已经绞尽了他们的可怜的脑汁了。

同前两本书一样，爱尔乌特在这本书中也断言：“革命不是社会变迁的常法。……社会科学（应读作“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引者）的职务就是去发明一个较好的方法”（第192页）。应当说，这种“较好的方法”的确是很不容易“发明”出来的。如果这个

^① 史麻耳 (Small, 1854—1926)，美国的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中的一个“先辈”。爱尔乌特是他的学生。



资产阶级学者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变动后，仍然不能向他的主人贡献出什么奇妙的灵方，他恐怕是不应当受到责备的。在这本书中，爱尔乌特说：“免除革命的责任特别是在社会上的治者阶级”，他要求资产阶级统治者注意“从遗传、社会环境和个人的教育”这三方面来“控制”“个人的性质”（第194页），这样来使被统治者都成为不想闹革命的安分守己的人。这仍然是上面说过的《社会学及社会问题》一书中所提出的“方法”。

爱尔乌特的这几本书，因为恰好产生于战争和革命的重大历史时期，所以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政治目的，赤裸裸地表达出来了。从五四运动以后的30年间，输入中国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虽然自称为有各种派别，在形式上也有各种不同的花样，但是它们的根本的目的并没有什么不同。爱尔乌特的这几本书在这一点上是有充分的代表性的。

这30年中间，在中国，正是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斗争的30年。在这期间，虽然中国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已经是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个部分。在这时期，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自己任务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输入中国，为了什么目的，难道还用得着说么？

三

在这里，还必须指出，现代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还具有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侵略和统治政策服务的职责。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所谓“文化学派”，特别露骨地表现了这一点。



资产阶级社会学中的所谓“文化学派”算是一个“最新”的“学派”。它和资产阶级的所谓人类学结合在一起，所以又有“社会人类学”这样的称呼。资产阶级的“人类学”也有种种“学派”。以美国人鲍曷士(Boas, 1858—1942)为首的一个“学派”就是社会学中的“文化学派”的依据。孙本文是在中国介绍这种文化学派的社会学的较早的人。他说：“新派人类学，发源于美国，故亦称美国学派。……大概文化学派社会学家之学说，都根据新派人类学家之论点。所以谓文化学派全系由人类学脱胎而来，亦无不可。”^①这种“新派的人类学”和社会学中的“文化学派”，特别有兴趣于“研究”殖民地附属国的落后民族，名义上叫做研究各种类型的文化，实际上是研究用什么办法统治落后民族。

现代资产阶级的所谓新派人类学家并不讳言，他们的研究是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服务的。英国学者菲司(R. Firth)著的《人文类型》有中文译本^②。这本书中表明他们的人类学所特别注意研究的就是“土著文化和西洋现代文明的接触现象”(第147页)。这本书中如此直率地说：“理论人类学，和其他科学一般，有它实际的应用。……在对付土人的问题时，以了解土人的习惯和信仰为目的的科学自应当有它的用处。殖民地政府、传教团体、教育机关，已逐渐知道利用现代人类学的训练、人类学家的著作，以及聘请人类学家参加他们的工作，藉以得到关于土人生活的正确知识和推行他们的方案”(第152页)。

在1935年，北京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聘请过美国芝加哥大学的

① 孙本文：《社会学上之文化论》，世界书局1927年版。

② 费孝通译：《人文类型》，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甲集第三种，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



一个教授来“讲学”，此人叫做布朗（A. R. Radcliffe—Brown）。当时在燕京大学教书的吴文藻介绍这个布朗说，他是“英国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他的主张是“人类学与社会学合一论”。吴文藻还把布朗的学说称为“功能学派”的人类学和比较社会学^①。这个布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学者呢？看一看他的履历就可以大体知道。原来他自从25岁以后，有20多年一直活动在各个殖民地：1905年，在南非；1906—1908年，在安达曼岛、印度、缅甸；1910—1914年，在澳洲；1916—1918年，在南太平洋东加群岛；1919年，在南非的巴苏托兰、脱兰斯瓦尔、普利托里阿；1920—1926年，在南非的好望角；1926—1931年，在澳洲。这个人类学家的著作有《安达曼岛人》、《西澳的两个部落》、《南非的母舅》、《澳洲诸部落的组织》等等^②，原来他就是以“研究”澳洲、非洲的“土人”而成专家的。

那么，他为什么对于澳洲、非洲的“土人”发生兴趣呢？对这点，向中国推荐布朗的学说的吴文藻是很了解的。他说：“在英国，人类学较社会学为发达，与帝国领土之扩张实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奉经验主义为成训的英国学者，自与其殖民地的土人发生直接的接触以来，没有不注意到科学研究的实用价值的。剑桥探险队^③的组织，在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上间接地负有相当的使命。功能派以前的英国人类学，不论其为进化论派或播化论派，都与实用无关。惟有功能学派，因其极重视原始文化的实在运用及其

①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辑的《社会学界》第9卷，《纪念布朗教授来华教授特辑》，第1、16页。

② 同上书，第18页。

③ 所谓“剑桥探险队”是指1898年以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人类学家赫腾（A. C. Haddon）为首的一个到澳洲做调查工作的组织。



机构，遂为应用人类学供给了正当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功能人类学因起始即兼顾行政实际问题的研究而得了迅速发展的机会。”^①这就是说，布朗这一派的所谓社会人类学，彻头彻尾地是为了实行殖民统治而研究许多地方的“土人”的。吴文藻在30年前表扬布朗的功绩说：他早在1920年在南非好望角时，“就为殖民地文武官员及传教士开设了人类学讲习班”，后来在澳洲悉尼大学又“曾为新基尼委任统治区的行政官作大规模的训练”，“凡被选充任委任统治区内行政的候补军官都要先学布朗所讲的‘比较社会学’及‘殖民行政’两课”，而且“试验结果，成绩颇著”。“他所创办的《大洋洲季刊》，规定以土著民族与西欧文明的接触以及统治土人的实际问题的研究为该刊物的主要政策的一种。”吴文藻总结他对布朗的称道说：“现在英国殖民地内，如非洲黄金海岸及奈加利亚、巴布亚与新基尼委任统治区等处，都有人类学专员的派遣；在牛津、剑桥诸大学，且有专门训练殖民地服务人员的设备。这种种新的建设，不能不说是由于功能学派人类学自始即并重纯理的与应用的的结果。”^②

吴文藻对于布朗一派人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这种了解并没有弄错。为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服务，就是他们的“科学研究”的明确目的。他们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等无不为了他们的这种目的所决定。我们还可以拿这个布朗自己说的话来证明。他是这样说的：

“有一问题，即对殖民地行政人员应授以何种人类学知识方可使之胜任愉快，余以为体质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皆无若何

①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辑的《社会学界》第9卷，第18页。

② 同上书，第19—20页。



价值，尤以再造历史之民族学对殖民地行政毫无实际价值。普通对殖民地官吏有明显之助力者为土著语言文字之学习，次为对土著社会组织之深切的了解，即明了各种社会制度、习俗之意义与功能。此种了解仅可由比较社会之研究中得之。

“一般殖民地行政教育长官多感觉人类学在治理及教育土著时并无若何实际效用，然彼等所研究之人类学乃种族分类之人类学，寻求制度起源的史前考古学及社会人类学。此种研究除学术价值以外对实际应用很少贡献。十年来余曾试验一种课程，包括普通比较社会学之全部，继之以实地作文化之功能的研究，再辅之以殖民地行政政策及方法之比较研究。如斯实验未及一年，已发现其能充分适合学生之需要，即可供给学生以统治、教育土著之科学的基础。吾大英帝国有亚非澳各洲殖地上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其一为对各土著之系统的研究，故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于土著文化有系统之认识，其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

“人类学在今日世界事务中已博得相当地位，在不同文化或民族发生之冲突问题中，尤有特别之贡献。二十世纪之伟大工作在联合世界之各民族成为一有秩序之大社区，而此种工作有待于人类学者甚大。”^①

显然，在布朗看来，要研究什么，不要研究什么，是有很明确的标准。对于帝国主义统治政策有用的，就要研究；无用的，就不要研究。因此，体质人类学、史前考古学是没有价值的，因为那对于

^① 见布朗：《人类学研究现状》一文，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辑的《社会学界》第2卷。



“殖民地行政长官”毫无实际效用。他们所要研究的是在这些“长官”治理下的落后民族的社会组织、各种社会制度、习俗之“意义与功能”。他们特别着重于“功能”这一概念(所以叫做“功能学派”)。所谓功能就是“用处”的意思。对什么有用呢?就是对殖民统治有用处。他们从他们所要加以统治的民族中,搜索它所特有的风俗、习惯、社会关系等等,看这些东西对于实行殖民统治有无用处,凡有用处的就可以加以保留和利用。这就是他们的“科学研究”的任务。

布朗这个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家自 1926 年后在澳洲的工作,受到了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的津贴。由 1931 年起,他受美国的芝加哥大学之聘,“指导美国学生作实地研究”。这也正是大英帝国的统治全球的妄想渐渐地移交给了美国的时候。仅仅依靠对“澳洲土人”的研究不足以满足现代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需要了,所以资产阶级的社会人类学又把研究范围扩大到了中国。用吴文藻在 1935 年介绍布朗的文章中的说法就是,“比较社会学的研究的范围不只限于‘后退文化’中残存土著民族的简单社会……布朗氏自前年起已向东亚开发比较社会学的新园地。”^① 在那时候,为美英帝国主义服务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要加强对中国的“研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些中国的“学者”明明知道这种研究是为了殖民统治的目的,为什么要那样兴高采烈,拍手欢呼,这岂不是很奇怪的事情么?

吴文藻当时说:“近年来,我们自己已有应用功能社会学实地研究法来考察中国现代社会之拟议,所以一听到布朗东来的消息,即用海电聘请他来华讲学。”布朗到燕京大学后,提出了一个“中国

^①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辑的《社会学界》第 9 卷,第 32—33 页。



乡村生活的社会调查计划”。吴文藻欢呼说：“从此，庞大的中国，也变成了他的比较社会学的试验区了。”

根据这些材料，我们不能不感到，在 20 年代所谓新派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输入中国，并且按照这种“学说”来进行关于中国社会的调查研究，其意义是不能完全用学术来解释的，是具有超出学术以外的目的。

1957 年 11 月

原载《哲学研究》1958 年第 6 期。



两本工厂史

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正在编写关于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的书，这里要介绍的是它们已经出版的书中的两本，这两本书不仅提供了许多第一手的生动资料，而且在对这些资料进行加工和分析方面，可以看出，作者们是用了一番功夫的。

上海的大隆机器厂创办于1902年。它的业务最初只是为外国的轮船修配机件，创办人也是买办出身。那时这家工厂对帝国主义有较多的依附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有了一些发展。可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民族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是不可能顺利发展的。《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一书对这点给了生动的说明。

大隆厂主严氏资本家可算是在旧中国经营机器制造业最成功的资本家中的—一个。在旧中国，机器制造业虽然很不发达，但是大隆厂还是经常遭到产品没有销路的危险。经营大隆厂的资本家依靠所谓“铁棉联营”，即同时投资经营纱厂的办法，才部分地解决了产品出路的问题。本书中指出，这个资本家的资金调剂主要是靠在上海经营房地产的投机生意，而这种投机生意是和帝国主义的“洋行”有密切联系的。本书还详细说明了大隆厂内所实行的“学徒制”，这实际上是加强对工人剥削的一种带有封建性的手段。当时



“大隆”学徒的人数在工人中的比重，一般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书中指出，这些做法，虽然使得这家企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并未能使它摆脱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厄运。

解放前的 10 多年的时间中，从能制造成套的棉纺机器到解放前夕，“大隆”总共生产了 14 万锭的整套棉纺机器，可是它当时具有年产 4 万至 5 万锭的生产能力，平均每年都有 70%—80% 的生产能力不能使用。

本书中根据实际材料所作的分析，有力地证明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力图解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束缚，谋求独立发展，但是，它是无力解决这个矛盾，是找不到独立发展的出路的。大隆厂的资本家在残酷地压榨工人的同时，又求救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靠它们给一点残羹剩饭维持生存。大隆厂的资本家和官僚、地主、流氓头子、帝国主义分子有着频繁的联系，抗日战争时期大隆厂的资本家还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实行妥协。

《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一书，用不可驳倒的事实证实了，只有在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之后，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以来，中国的机器制造业和其他工业部门一样，才有了真正迅速的发展。解放以来，大隆厂产品的品种大大增加了，它不仅可以制造棉纺机，而且还可以制造横臂车床、卷扬机、空气锤、齿轮车床，以至制造精密度要求很高的石油机械配件。这个工厂解放前的产值平均每年只有 300 万元，1958 年的跃进指标则为 7330 万元，为解放前的年产值的 24 倍多。这一段新生的历史，也是富有代表性的。

《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一书，是在 70 年前创立的中国



最早的一家棉纺织厂的演变史。书中告诉我们,在旧中国的时期,这家工厂在它的发生、发展和衰败的过程中,也和大隆机器制造厂情况一样,一方面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有过矛盾和斗争,另一方面又与它们在一定范围的利益上发生过某些结合。恒丰纱厂的资本家聂氏家族,在经营纱厂营利的时期,又不断以其盈利所得的一部分大量收购洞庭湖滨的土地,从事封建剥削,因而长期在运用资金上收到相互调剂的效果。所以,聂氏家族资本具有浓厚的封建性,恒丰纱厂的经营管理上也就特别腐败和落后。这本书充分反映了旧中国民族工业的那种灾难重重,不可终日的处境。只是到了解放以后,这家工厂才和大隆机器制造厂一样,得到了欣欣向荣的发展。

这两本书以具体的事实材料,使读者得到关于我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过程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殊性格的具体知识,可以帮助人们更进一步领会党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系列的政策的正确性。

在这两本书中,关于大隆机器厂的一本,编著者用的功夫看来是更多一些。关于恒丰纱厂的书,对有些问题的分析不够深入,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不够紧密,取材也有不够精练的地方。这两本书都着重旧中国时期的历史,关于解放后的部分,与该书的前半部分比较,显然有些逊色。其实对于这些企业在解放后的改造过程也是应当认真收集材料,进行研究的。这两本书虽然注意了各个时期工人阶级所进行的斗争,但是有关这一部分的材料,以及对这些材料的分析,与其他部分比较,显得无力。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这仍然是两本好书,这两本书的作者所做的这种工作是值得提倡的。

详细地占有材料,认真地进行科学分析,由解剖一个“麻雀”而说明许多“麻雀”,这是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基本方法。马克思



说过：“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①多少年来，毛泽东同志一再地教导我们必须建立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很多从事研究工作的同志，也在向这个方向努力，但是目前调查研究工作还是相当薄弱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少数理论工作者，还缺乏勤勤恳恳、刻苦踏实的学风，甚至满足于“概念游戏”，这种风气是应当纠正的。

《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1958年10月出版,124页),《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1958年9月版,152页)两书都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原载1959年3月1日《红旗》1959年第5期,署名施东向。

^① 《资本论》第2版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3页。



为了追求真理

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对于同一个问题发生了不同的看法和争论,这是常有的事情。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客观真理。追求真理的道路,从来不可能是平坦的;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从来不可能是轻而易举的。

前人在科学研究中所达到的正确的结论,当然是我们所必须接受的。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重复前人的结论,而是要在前人所没有或不可能接触到的领域内,在前人所没有做出正确的或完全正确的结论的问题上求得真理。在进行这样的工作的时候,前人提出的正确的结论,可以对我们起引导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少犯一些错误,少走一些弯路,而重要的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来做艰苦的努力。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原则,是我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所必须依靠的指南针;依靠这个指南针我们就可以不犯大的方向错误,而在实践的基础上发展真理。但是有了这个指南针,并不能使我们在还没有解决的科学问题上不费吹灰之力而达到正确的结论。因此,就是人们确实依靠马克思主义为指南而向前摸索真理,也会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

要在任何科学问题上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就必须详尽地掌握有关的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在越是复杂的问题



上,就越是需要穷年累月的努力,才可能有真正的成就。但是,经过努力而仍然得出错误的或部分错误的结论的情形也是可能的。

对于学术问题上的错误,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要分辨两种性质的错误。有一种人并没有花过收集材料、认真研究的功夫,只是从感想出发,随便说出些错误的意见。这种错误,应该说并不是在科学研究中的错误,而是根本不进行科学研究的错误。这种错误除了证明人们不应当这样做以外,没有任何意义。另一种人是认真做了研究工作,但是因为方法不对头,掌握材料不完备或其他原因,而作出了不正确的、不全面的结论。这种错误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往往是在达到真理的过程中所难免要经过的过程。科学史证明,在科学问题上提出正确的结论的人固然是有功劳的,而那些勇于在新的科学问题上进行探索,提出终于被修正甚至被推翻了的假设的人,也是有一定的功劳的。各种假设,各种不成熟的见解,各种带有片面性的主张的相互争辩,对于达到正确的全面的结论,往往是一个必要的过程。

所以,我们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要坚持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础上的百家争鸣。毛泽东同志说:“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

我们的共同目的是追求真理,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学术问题上展开充分自由的讨论。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是尊重你的发言权,这是在我们的学术讨论中所应当有的态度。当然,为了辨清是非,尖锐的批评有时是必要的;但是人们都应当采取说理的态度,努力用科学的论证来说明是非。

参加学术讨论的人,都应当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我们的社会,是真理能够开花结果的社会。但是有人却会因为自己的意见不被



多数人赞同而动摇。如果自己的意见确是有错误,以至不被人赞同,那就应当修正自己的意见。但如果是正确的意见,即使只有少数人,甚至一两人同意,也应当坚持。在学术讨论中,真理有时并不在多数人的手里,而在少数人的手里。当然,只要的确是真理,那么少数人的意见也一定会慢慢地变成多数人的意见。

我们在有勇气坚持真理的同时,又必须有虚怀若谷的态度,要能够向一切人,包括向自己的争论对手学习,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修正自己的错误。缺乏坚持真理的勇气的人就会随波逐流,没有主张。不虚心听取别人意见的人就会自以为是,坚持错误。这两种态度都是应当反对的。科学本身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它要求人们以老实的态度对待它。讨论的双方既然都是为了探求真理,发展科学,那么把对手那里正确的见解接受过来,纠正或补充自己的见解,有什么不好呢?

学术讨论,是长期或短期研究成果的展览和比赛。有些讨论,半途搁浅,无法深入,这种情形正是反映了在所讨论的问题上,大家还缺乏比较深入的研究。比较复杂的艰难的问题也往往不是一次讨论所能够完全解决的。经过一次讨论以后,虽然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问题的症结可能暴露出来,我们自己之所以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弱点也可能暴露出来。这都是很有好处的。这就会促使我们更好地、更有目的地进行研究工作,努力收集我们所必须具备的材料,去掌握我们所还缺乏的知识,去解决阻挠我们前进的疑难。这样,我们就能使讨论一步步提高。浅尝即止,对于科学事业是永远不会有好处的。

学术工作者应当勇于参加热烈的争论,也要甘于“寂寞地”进行切切实实的研究工作。不然,就容易形成“赶浪头”的现象。有一个寓言里说:有个木偶,听说海里有数不尽的珍宝奇葩,宛若仙境,



于是便为自己安排了一次旅行。但当它在海面上漂浮很长的时间以后，却大失所望，因为他所看到的大海，除了一片汪洋以外，一无所有。我们最好不要做这个木偶。要获得“宝藏”，就得在真理的海洋里深入下去！

原载 1959 年 5 月 16 日《红旗》1959 年第 10 期，
署名施东向。



认真地多读些书

我国书籍的出版和发行工作,在这几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书籍出版的品种、数量之多,已经远远超过了旧中国时代。爱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读书,已经不像在旧社会那样,只是一小部分人享有的特权。广大劳动人民在学习了初步的文化之后,开始体会到了读书的益处。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也越来越感到有多读些书的必要。在文化学术方面做工作的人,不用说,更加需要认真地多读些书。

我们之所以要读书,是因为书籍能够传播先进思想,能够传播科学技术各方面的知识;通过读书,可以使我们扩大眼界,扩大知识领域,并且提高思想能力。

思想和知识的来源是实践。在人类历史上,一代代的人通过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包括阶级斗争)的实践,不断地使科学知识向前发展。后来的人因为可以接受前人已经取得的知识,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依靠新的实践而求得新的知识,所以就比前人更加聪明,具有比前人更进步更丰富的科学知识。如果只是接受前人的知识而不能在实践中继续加以发展,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不去接受前人已经取得的知识 and 已经达到的科学成就,那么人类知识的发展也同样会停滞下来,当然也是不对的。要接受前人已经取得的知识 and 已经达到的科学成就,要使一个人的知识不仅限于个人经验所



及的范围内,就应当多读些书。

历史上一切有成就的科学家、理论家,没有一个不是孜孜不倦的苦学者。马克思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是最有天才的人,但他也是最勤奋的读书的人。他不仅攻读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法学这些方面的书,而且在语言学、数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方面,也是博览群书,并且在很多方面达到了很高的造诣。有一次当他生病不能从事研究工作的时候,还阅读了好些生物学的书。当然,马克思并不是死守着书本知识的人。如同毛泽东同志所说:“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论创造。”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马克思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创造者,是与他从刻苦读书中获得的渊博的学识分不开的。有志于做马克思的一个小学生的人,应当在学习方面,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努力养成刻苦读书的精神。

我们有些同志,并不真正了解认真读书的意义。有人似乎以为,认真读书就是迷信书本,就会脱离实际,读书多了就会变成教条主义。这种错误想法,无论对于学术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或者对于实际工作者,以至对于青年学生,都是非常有害的。

固然有些人,在读了一些书以后,变成了书呆子,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可是他们犯错误,原因并不在于他们读书太多,而在于他们的读书方法是错误的,他们对待书本知识的态度是错误的。他们把书本知识看成万应灵药,企图用它来“以不变应万变”,脱离了实际。用这种态度去读书,多么好的书,多么有益的书本知识,在他们手里,也会成为有害的东西。但是,如果用相反的态度和方法去读书,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去读书,用一种分析的态度去对待书本知识,那么,应当说,书读得越多,人会变得越聪明,而绝不会越读



越呆的。高尔基曾经做过这样生动的描写：“几乎每一本书都似乎在我面前打开了新的、不知道的世界的窗口”，“书越读得多，书籍就越使我和世界接近”。凡是善于读书的人都会有这种体验。教条主义不是读书的必然结果，更不是读书多的必然结果。事实上，我们这里有些教条主义者，并不是读书很多，而是读书很少的人。知识偏狭，往往是某些犯教条主义错误的人的通病。这种知识上的偏狭，也助长了他们思想的片面性、主观性。当然，读了很多的书，书本知识比较丰富的教条主义者也是有的。

我们党一向是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但是，我们党却从没有也永远不会因此而不重视书本知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向来是一方面指出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书本知识的错误，一方面又一贯强调要用正确的方法学习书本知识。不仅学术工作者，而且一切实际工作者，都应该认真地多读一些书，以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使自己善于分析和总结经验，以便把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减少行动中的盲目性。

“迷信书本”和“不要书本”，是两种不同的片面性。但犯这两种片面性毛病的人有个共同之处，就是都不真正了解书本知识的性质和作用。“迷信书本”的人，似乎把书本知识捧得很高，但实际上他们不懂得书本知识归根结底来自直接经验，不懂得它是要不断补充和发展的，尤其不懂得书本知识是服务于解决新的任务的工具，因此他们做了书本的奴隶。“不要书本”的人，则把书本知识看成是教条主义的渊藪，为了避免陷到那里面去，却因噎废食，对书本知识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事实上，如果有人想用“不要书本”的办法来反对“迷信书本”，用不读书或少读书的办法来反对教条主义，那是不能战胜教条主义的。只要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读书的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读书的人又积极地



关心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那么，我们就能够成为书本的主人，而不是书本的奴隶。

读书，需要有时间，需要坐下来。有人说，我虽然想读书，但实际工作紧迫，没有时间。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的确有这种苦恼。但是如果真正认识了读书的重要性，能够合理地安排工作和生活，总还是可以找到一点时间来读书的。在旧社会里，许多先进的人们，往往苦于没有读书的条件，甚至得不到要读的书。但他们还是千方百计，克服困难，非常认真地读了很多书。我们今天的读书条件，无论如何，比他们好得多，我们应当珍惜我们的时间。这一点，对于许多青年同志恐怕是更应当提出的。人们在青年时代多读一些好书，只要方向正确，就能够有长远的好处。

读书这件事，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被重视过，书本知识从来也不可能像我们现在这样发挥它的力量。只有在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伟大时代里，书本知识才真正从少数人的手里夺过来，变成亿万人民追求真理，寻求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的锐利武器。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未来的共产主义建设，都要求人们有高度的文化科学知识。正因为这样，共产主义者是历史上最积极的读书的倡导者和亲身实践者。这是历史上任何“贤明的”君王和任何统治阶级的文人学者所根本无法比拟的。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那篇著名报告里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时，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应当努力成为这样的共产主义者。

原载 1959 年 6 月 1 日《红旗》1959 年第 11 期，署名施东向。



关于写文章

写文章,是交流思想、传播经验的一种方法,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是,还应当指出,写文章同时又是整理我们的经验和思想,使之明确化、条理化的一种方法。

古时候,中国人对于写文章有两个基本要求,叫做“有物有序”。“有物”,就是要有内容;“有序”,就是要有条理。

要写一篇文章,总是在作者的头脑里已经有了一些值得写出来的东西:或者是在工作中积累了某些经验,并且认真地考虑和总结了这些经验,或者是对于某个问题做了研究,达到了一定的结论。但是写文章并不只是把在头脑里的思想搬到书面上去的一个简单过程,而且又是这个思想逐步成熟、逐步完善起来的一个过程。

一般说来,一种思想只是在自己头脑里的时候,还不一定十分明确。把它说出来让别人听懂,这就比较明确了。写成文章,那就是更进一步了。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以至每一个标点,都摆在纸上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到底是清楚还是模糊,是深刻还是肤浅,是严整还是杂乱,立刻都明白显示出来了。要写好一篇文章,就要讲究章法,也就是要考虑如何开头,如何结束,如何分层次,分段落,这实际上就是整理自己的思想,取得必要的条理。有时为了表达一个意思,要费许多周折,这往往是因为这个意思在自己头脑里本来还



是比较模糊的，而在找到了最恰当的字眼和语句来表达的时候，这个意思才真正明确起来。

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写不下去的情形，这是好事，因为这就暴露了需要解决的矛盾。写不下去的原因，有时是因为我们对于书面语言这个工具还没有很好地掌握。但有时，并不是因为缺乏表达能力，而是因为我们的思想还不够成熟。自己虽然觉得已经弄通了，但其实这种思想还是比较杂乱，比较暧昧的，或者还只有个粗糙的轮廓，其中细节还很不周到。在这种情形下，当然写不成好文章。但是，如果不写，也许还不能发现这种情形。

遇到这种矛盾怎么办？最好不要急于写下去。这时候，就应当进行各种必要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看书，和别人讨论等等），继续酝酿，继续思索，继续研究，使自己的思想脱离那种暧昧、混乱和粗疏的状态。材料充分了，观点明确了，论据完备了，条理清楚了，然后才能写好改好。有时我们研究一个问题，起初未必能预见到它的广度和深度到底如何，到写不下去的时候，才意识到它的复杂性。所以写作过程常常能引导我们的思想进入新的境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苦恼和喜悦，在写文章的过程中是常常会经历到的。

“下笔千言”，“一挥而就”的情形也许是有的，但如果不是粗制滥造，那至少要有这两个条件：第一是对书面语言这种工具十分熟练，能够运用自如。第二，更重要的是，所表达的思想已经预先酝酿得十分成熟，连一切细节都考虑到了。但是，事实上对于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的要求是无止境的，即使一次能写成的文章仍然可以继续加以修改。通常我们写成一篇文章，总是要经过反复的推敲、修改，甚至几次重写。这是为了使我们的思想取得最



适当的表现形式，而且还是为了使这种思想愈来愈明确和完备。

这样看来，把一个思想用文章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过程，如果用个比喻来说，就好像一块生铁反复地经过锤炼一样，——结果就成了熟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用写文章的方法来锻炼我们的思想，提高我们的思想能力的原故。当然，必须是用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写文章，才能收到这种效果。如果马马虎虎、随随便便，那就既起不了锻炼思想的作用，当然也谈不上交流思想、传播经验了。

所以，我们反对不严肃的写作态度。如果不管自己有没有值得写出来的东西，也不努力使自己的思想明确化、条理化，只是硬着头皮写下去，而且写出来就要发表，这种连作者自己也不知道是说些什么的文章，只能使人看着头痛，看罢后悔，是毫无可取之处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提倡大家来学习写文章，并且努力写出好文章来。不要因为自己的思想能力不高就不敢写文章，而应当用写文章的方法来训练自己的思想。一个人如果不努力把自己所有的某种思想清清楚楚地写出来，甚至也不努力把这种思想清清楚楚地说出来，那么这种思想实际上只是处于混沌的状态中。

为什么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应当尽可能把经验总结写成文章呢？除了要把经验告诉别人以外，还因为写文章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总结经验，以至使经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

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当然更是离不开写文章。他们应当把研究成果写成文章，而且应当通过写文章来检查自己的成果，并且督促自己不断地提高研究水平。

好文章是在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经过踏踏实实的研究才能写出来的。这种文章在义理、考据和辞章等方面，总是经过认真努力的。当然，要把文章写好，需要一个过程。起初写的文章不一定就



很好,但只要经常地认真写下去,总是可以写好的。

原载 1959 年 6 月 16 日《红旗》1959 年第 12 期，
署名施东向。



义理、考据和辞章

从前有人说，做学问，写文章，要从三个方面下工夫，那就是义理、考据和辞章^①。我们现在可以借用这种说法来谈谈写文章的问题。

义理和考据，是属于文章内容方面的问题。在我们说来，讲究义理就是要求观点正确，论据充分；讲究考据就是要求材料准确。辞章是属于文章形式方面的问题。讲究辞章，在我们说来，就是要求适合于内容的完美的形式。

义理、考据和辞章虽然是三个不同方面的要求，但是这三个方面是密切地相互关联着的。

观点和材料的统一

在义理、考据和辞章这三者中，义理应当是灵魂，是统帅。因为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而材料是要由观点来统率的。

^① 清朝学者戴东原曾提出把“义理、考据、文章”这三者结合起来的说法（见《戴东原全集》中《与方希原书》和段玉裁所撰《戴东原年谱》）。章实斋有“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证实存乎学”之说（见《文史通义》、《说林》）。桐城派文人如姚姬传也常以义理、考证和文章三者为标榜。但他们所说的意思和我们所说的，并不完全相同。



如果一篇文章，有的只是华丽的词藻，有的只是庞杂的材料，却并不打算说明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人们读过以后，根本不知道作者是在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那样的文章，人们通常就称之为“没有观点”的文章，也就是没有灵魂的文章。

真正的好文章，一定要鲜明而有力地拥护那应当拥护的东西，同时也一定要鲜明而有力地反对那应当反对的东西。这才会是生气勃勃的好文章。

正确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客观实际中来的。我们在研究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都要从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给以科学的分析，然后才能在这问题上形成正确的观点。因此，我们要把正确的观点传达出来的时候，也是离不开材料的。

在这点上，我们讲究义理，显然是和前人的说法在原则上不同的。从前写文章的人说到义理时，往往只是指“古圣先贤”已经说过的道理。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虽然是人类的实践经验的科学的总结，是我们研究一切问题的指南针，然而也不能把它当成教条。正确的观点，不是简单的教条，不是空洞的观点，而是和具体材料结合着的正确的结论。

教条主义者以为他们既已从书本上接受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们就可以用简单的推理来获得关于任何问题的正确观点。教条主义的文章表面上看起来也是在拥护什么，反对什么，但是因为它缺乏对具体材料的具体分析，往往只好装腔作势，大声喊叫，以此代替科学的论证；其实，越是这样，越是反映出这种文章的思想贫弱。

也有这样的文章，一方面提出了若干观点，一方面也举出了若干材料，然而不能通过这些材料使人信服地承认这些观点。原



来这样的观点并不是从这些材料的科学研究中必然达到的结论，这些材料不过是为适应这些观点而任意拼凑起来的装饰品。结果当然会弄成材料是材料，观点是观点，正如水是水，油是油一样，不能合成一家。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鲜明和有力量，就在于它是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事物的逻辑，使人看到，什么是我们必须拥护，也不能不拥护的；什么是我们必须反对，也不能不反对的。所以，观点和材料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对写文章的一个根本要求；我们所要求的义理，不是搬弄一些空洞的观念，而是观点和材料的统一。

材料的准确性

在研究问题时，需要掌握大量的材料，但是在写成文章时，当然不可能，也不需要把所接触到的材料全部搬到文章中去。如何选择最恰当的、完全可靠的材料，对于一篇文章的成败，常常有很重要的关系。

对文章中使用的材料有什么要求呢？

第一，要求所是用的材料对于所说明的论点是足够的和必要的，并且是作了具体分析的。堆积一大堆不能说明问题的材料，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要求所使用的材料是完全准确可靠的。不论是引用事实的材料或者文献的材料，或者是在批驳错误观点的时候引用的错误论点的材料，准确可靠都应当是一个起码的要求。

对于材料的准确性进行必要的审核，这可以算是考据工作。前人讲考据，多是指对古文献的字句文义的考订。我们所说的考据，范围要广得多。当然，我们并不赞成无目的地在文献的考证中转



圈子,但是我们必须在使用必要的材料来论证自己的论点的时候,要求材料的完全准确,一直到材料中的每一个细节。

有人也许认为,只要不妨害所要表达的义理,材料的细节有点出入是无所谓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即使细节的出入对于全部论证不发生直接影响,也会使人对于材料的全部可靠性发生怀疑,以至伤害了论证的说服力量。有时看来是无关大体的细节上的马虎,却会造成关键问题上的错误,那当然是要警惕的。把细节弄清楚或者作适当的交代,是可能的。对于可以做到的事不去做,这是一种懒散的作风,和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严肃认真的作风是不相容的。

不久前,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的编者为了提醒撰稿人注意引文的确实,特别写了一篇文章说,最近在该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引文完全确实的难得有一篇、两篇。有一篇题目叫《柳宗元的诗》的文章,全文才两千字上下,引文不确实却有11处之多^①。引文要核实无误,这当然不是什么难以做到的事情,但是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如果不在文章写成之后,仔细核对,这类错误是很容易发生的。

对于在全部论证中带有关键性的材料,当然更是应当花气力去考究一番。一个认真的作者总是要反复地考虑:他所引用的事实材料是否确实可靠?他所引用的文献材料是不是恰如原意?不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材料,只要是他引用的,他就对它的确实性负责。为此他就要尽量搜集和引用第一手材料,决不贪图方便,随便录用第二手、第三手材料。一个材料,经过几个转手以后,可能与本来面目大相径庭。对于比较复杂的事实材料,他总是要花一

^① 见《光明日报》1959年6月7日第6版。



番气力加以审查，或者把这一材料和另一些材料相核对，或者亲自作调查，解剖一个麻雀，来验证一般材料的可靠程度。

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作风是我们的模范。在拉法格的回忆录中写道：“马克思……引证的任何一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权威人士的实证的。他从不满足于间接得来的材料，总要找原著寻根究底，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大英博物馆去一趟。”^① 恩格斯为了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不只阅读了大量文献，而且亲自访问了很多工人。恩格斯在他的书的标题下，还特地加了一句话“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

列宁的作风也是如此。克鲁普斯卡娅曾指出：“列宁并不靠自己的记忆，虽然他的记忆是很好的。他从不凭记忆‘大致不差地’来叙述事实，他叙述事实是极确切的。”“他对地方自治局统计材料的研究及整理作过很多的工作。在他笔记簿里仔细地写了很多的统计表。当涉及有巨大意义和巨大比重的数字时，他连已公布的数字表的总计也加以检查。仔细地检查每一事实，每一数字，是他始终用的方法。他的结论都是根据事实来作的。”^②

要有好的形式

如果一篇文章所讲的道理错误，引用的材料虚假，即使在形式（辞章）上如何漂亮，也决不会被我们认为是一好文章。

但是，好的内容要求有好的形式，拙劣的辞章必然使内容受

①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 77 页。

② 《向列宁学习工作方法》，第 3、2 页。



到损害。以为形式不需要讲究，形式好不好无关重要，是不对的。

我们所说的辞章涉及语言、章法和风格等方面。一个作者力求掌握丰富的词汇和多样的句法和章法，目的是为了运用自如，能够把内容传达得准确而生动。把内容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是对文章形式的基本要求。用词不妥帖，造句不合文法，行文缺乏条理、拖沓冗长，就会把意思弄得含混晦涩，令人费解甚至误解。在准确之外，还要求文章写得生动。在辞章拙劣的文章中间，人们所读到的永远只是干瘪的词汇，刻板的句法、章法，即使这种文章把意思大体表达出来了，也会因为它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使人不愿意亲近。所以古人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真正严肃地对待文章的内容的人，一定也在文章的形式方面提出严格的要求。李卜克内西回忆说：“马克思在语言和风格问题上十分考究，有时到了咬文嚼字的程度”，“他对于语言的简洁和正确是一丝不苟的”，“马克思是个严格的修辞家，他常常花很多时间力求找到需要的字句。”^①

也许有人要担心，用心追求文章形式的完美，会不会犯形式主义的错误。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形式主义是用形式方面的追求来掩盖内容的空虚和谬误。形式主义者并不是为了准确地、生动地表达所要表达的内容而讲究形式的人。

我们提倡写文章注意修辞，当然是从切合内容的需要出发。如果作者本没有什么新颖独创之见，却勉强去雕砌一些警句、格言之类来等着读者喝彩，那就是舍本逐末的作法，同形式服从内容的要求相违背，是我们所不取的。

^①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第104、108页。



事实上，辞章问题虽然是个形式问题，却不只是单纯的技巧，而是同作者的思想作风有密切关系的。语言的丰富多采，往往就是思想的丰富多采的反映。一个思想僵化、粗枝大叶的人，很难写出生动活泼、严密周到的文章来。因此，不从训练自己的思想着手来加强辞章修养，是很难有大的效果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总是严格地要求自己，尽最大的努力使文章形式作到准确而优美，那也会有助于我们的头脑日趋精密和活泼。

有人认为，文章以朴素为贵，只要能把一个意思讲得清楚明白就行了，不必费气力去打扮。对这种意见要分析一下。如果是说文章的修辞应当先求准确，应当恰如其分，不要矫揉造作，以辞害意，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如果以为随随便便写下去就叫做朴素，实际上使朴素变成了简陋和寒伧，那是我们所反对的^①，真正的朴素的风格并不是不费气力就能达到的。

当一个人长期运用文字工具到十分纯熟的程度之后，他在用词、造句、布局等方面就有自己一套特殊的习惯，这种表现方式上的独特性，是形成文章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的好文章朴素，有的好文章色彩绚烂；有的文章以含蓄取胜，有的文章淋漓尽致。同是向反动派作斗争的文章，鲁迅的风格和闻一多的风格就很不一样。在我们的文坛上，应当使不同的风格百花齐放。

要把文字工具掌握得熟练，是很不容易的。这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学习。毛泽东同志说过，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语言，要下苦功学，要学人民的语言，学外国的语言，学古人的语言，从这些语言中吸取一切好的有用的东西。为了把文章写好，就应当

^① 茅盾先生的《夜读偶记》中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很大一部分青年作者的作品朴素到了简陋，或者寒伧的地步了。”见该书第70页。



这样地努力。

原载 1959 年 7 月 16 日《红旗》1959 年第 14 期，
署名施东向。



一个在人民中间的人

——纪念韬奋逝世十五周年

翻开《韬奋文集》，读到这样一段话：

“十几年来在舆论界困知勉行的我，时刻感念的是许多指导我的师友，许多赞助我的同人，无量数的同情我的读者好友；我常自策勉，认为报答这样的深情后惠于万一的途径，是要把在社会上所获得的信用，完全用在为大众谋福利的方面去。我深刻地知道，社会上所给我的信用，绝对不是我个人所造成的，是我的许多师友、许多同人以及无量数的读者好友直接间接所共同造成的。因此也可以说，我在社会上的信用不只是我的信用，也是许多师友、许多同人乃至无量数的读者好友所共有的。我应该尽善地运用这种信用，这不只是对我自己应负的责任，也是对许多师友、许多同人乃至对无量数的读者好友所应负的责任。”^①

这段话说的很朴实、真挚。韬奋一生的行动可以证明，这段话的确是他的由衷之言。

从30年代初开始，韬奋的文章在读者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广。韬奋自己，从在旧社会里想做一个正直的诚恳的好人这样的立

^① 《韬奋文集》第3卷，第82页。



场,从爱国的、民主的立场出发,逐步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共产主义者的道路。他的文章在当时也特别影响了一大批本来同革命文化比较不接近的读者群众,起了推动他们进步起来的作用。当时,大量的读者团结到了韬奋的文章和他主办的刊物的周围,对韬奋表示很大的信任,并且愿意用自己的力量来支持韬奋的事业。

韬奋的读者从韬奋的文章里看到了一个自己的代言人,也看到了一个自己的亲切的朋友。韬奋在反动势力压迫下,处于毫无保障的地位,奋不顾身地说出了当时一切爱国的人民所要说的话。他所说的话是他的读者完全能够理解的。读者看得出来,他所说的,的确是从他心底里说出来的话。

韬奋的文章,现在的读者看起来,也许不觉得有很多特别出色的地方,但是有一个特点是很明显的:他不装腔作势,没有那种在旧社会中的所谓“舆论权威”的名流腔调。他把自己摆在读者中间,和读者进行亲切的谈话,而不是高高在上,教训读者。他有许多作品,包括旅行记、回忆录一类的文章,都谈到他自己。他如实地记述自己的经历,自己的各种所见所闻,不粉饰,不夸张地记录自己的各种感受。读者看了,完全觉得他是许多普通人中间的一个人,是真诚的,可以信任的一个人。

韬奋文章的这个特色,的确是反映了他为人的作风。韬奋虽然是经过多年个人的努力而才取得了社会对他的巨大信任,但是他从来没有自命为多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当然,在千方百计压制他的反动派看来,韬奋一个非常倔强的人;可是他的朋友和他的读者只觉得他是个很谦虚的人。

在过去的舆论界中,得到过群众的信任的人,也不止韬奋一个。但是有一些人,虽然在一个时候说了群众要说的话,因而在群众中取得了某种程度的信任,但一转眼间,他就拿这种社会对他的



信任当做自己的资本，去谋个人的利益了。反动派曾经以为韬奋也不过是这样一个人，他们竭力设法来收买韬奋，并且制造流言蜚语来破坏群众对韬奋的信任。结果，他们完全失败了。韬奋是一丝毫不打折扣地“把在社会上所获得的信用，完全用在为大众谋福利的方面去”，一直到死。

群众是宽厚的，凡真是为群众做了好事的人，群众总是报以信任。但是群众也是严格的，只要一旦这个人把群众的信任当成谋个人私利的资本的时候，他就在实际上离开了群众，而群众也必然要离开他。

韬奋，正如一切忠诚地为人民服务的人一样，始终保持着光明磊落的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因此他始终和人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始终是在人民中间的一个人，因此也就始终受到人民的爱戴。

原载《光明日报》1959年7月24日。



独立思考和服从真理

我们提倡服从真理,同时又提倡独立思考。二者并不冲突,而是互为条件的。

客观事物的本质,它在发展中的内在规律性,反映到人们头脑里来,才成为人们所掌握的真理。在客观事物比较复杂的情况下,真理并不是一目了然的,要区别正确的观点和错误的观点,有时不是很容易的。为了辨明真理,就需要在实践中开动脑筋,经过一番独立思考的功夫。

对一个真理,有了真正的了解,弄清楚真理之所以为真理,以及真理和谬误的区别,才能有坚定的信念,才能热爱真理,并在实际行动中贯彻执行。在真理面前不动脑筋,采取人云亦云、囫囵吞枣的轻率态度的人,不能成为真理的自觉的战士。如果一个人并没有学会区别真理和谬误,也就很难保证他所服从的,究竟是真理还是谬误。

宗教的信条要求人们盲目信从,因为它经不起人们的独立思考;当人们根据实践经验,用清醒的理智寻根究底地追问下去,宗教迷信就站不住了。科学的真理和宗教的信条不同,是同盲目的信仰根本不相容的。

马克思主义不但经得起独立思考,而且要求独立思考。它之所以经得起独立思考,因为它是科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它之所以



要求独立思考,因为它的目的是改造世界,而改造世界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自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就是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独立思考。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对于“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时候,总要经过独立思考,才能真正把它变成自己的思想。这是因为,我们由于自己的社会出身、工作经历、所受的教育和周围环境的影响等等,往往一方面具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有利条件,一方面又在自己的思想中存在着某些与马克思主义相抵触的东西。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就是一个人整理和提高自己的经验,并且批判和克服自己头脑中的错误观点的过程。帮助一个人接受马克思主义,重要的也是要启发他进行独立思考。

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才能真正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要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就需要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独立的思考。毛泽东同志曾经写道:“凡事应该用脑筋好好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们党内浓厚的盲目性,必须提倡思索,学会分析事物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①

为了培养和提高独立的思考的能力,就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丰富自己的实际经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注意吸取别人已经达到的正确结论。同时,思考的能力,也是要在不断思考的过程中才能提高的。

^① 《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48—949页。



独立思考当然不是向客观现实闹独立性，向真理闹独立性，而是要以符合现实，也就是以服从真理作为最高原则。主观和客观的一致不是很容易就能达到的，然而逐步地达到是可能的。主观上的正确和错误是有客观标准的。这是我们主张独立思考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的各式各样的敌人，有时标榜“独立思考”的口号，他们的所谓“独立思考”，其目的无非是使人们离开马克思主义，离开客观真理，而成为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奴仆。

在独立思考的过程中，有时会犯错误，但是我们不能为了不犯错误而做思想懒汉。在自己的实践中遇到新的问题时，自己不动脑筋，坐待别人作出正确的结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已经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做指导，但是我们的任务是要运用这普遍原理来解决不断地出现的新的问题，在每个具体问题上，仍然要经过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的知到比较完全的知的过程，甚至要经过从犯错误到改正错误的过程。

独立思考当然也不意味着一切问题都只是靠个人的经验和智力来解决，恰恰相反，善于独立思考的人总是估计到个人的所见所闻可能有片面性，因而总是严肃地对待前人和别人的经验，注意吸取前人的智慧。“三个牛皮匠，变成一个诸葛亮”，是以三个皮匠都能独立思考为前提的。他们都努力从自己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又承认自己的见解可能有片面性，因此他们能够取长补短，相辅相成，共同达到正确的结论。只要服从真理是独立思考的基础和目的，那么，独立思考的结果就不是造成分歧，而是造成一致，造成在共同认识了客观真理的基础上的高度的一致。

善于独立思考的人，是十分勇敢的。他敢于和任何陈腐的传统决裂，向一切错误的观念“宣告独立”；当他看到真理是在那里的时候，他就勇往直前，毫不返顾。但是，他又是十分谨慎和谦逊的。他



总是不断地根据实际重新审查自己已经得到的结论,反复考虑和自己不同的各种看法,当他一旦发现自己的见解并不符合客观实际,而真理是在另一方面的时候,他也最能毫不踌躇地放弃自己的见解。所以独立思考固然不是随风飘荡,模棱两可,但也决不是自以为是,固执己见。

原载 1959 年 8 月 1 日《红旗》1959 年第 15 期,
署名施东向。



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

毛泽东同志历来教导我们：“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①

我们党所领导的一切事业，无论是革命或者是建设，都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人民群众的事业，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自己来做。党的政策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来实现。所以，在我们的任何工作中，都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使广大群众熟悉和了解党的政策，这是在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的一个关键。

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和接受我们党的各项政策，因为我们党的政策总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我们党的政策，集中表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在比较复杂的工作中，我们党的政策必然要包含比较复杂的内容。拿农村工作来说，过去在土地改革中，既要依靠贫雇农，满足贫雇农的要求，

^①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8页。



又要坚决地团结中农，不损害中农的利益。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既要积极地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又要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经过互助组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现在的农村人民公社中，既要充分发挥人民公社的大集体的力量，又要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把着重发展队有经济作为发展人民公社经济的中心环节。革命工作总是不断向前发展而又划分为不同的阶段的。在各个阶段中，既要求在这一阶段为下一阶段做准备，又要求认真做好当前阶段的工作，不许可把下一阶段的工作移到现在来做。对于党的政策所包含的这些复杂的要求，群众是不是都能够理解和接受呢？无数的事实证明，党的这些政策不但能够为群众所接受，而且能够为群众所掌握。我们党的政策总是界限分明的，哪些是许可做的，哪些是不许可做的，哪些是现在应当做的，哪些是将来才能做的，都规定得清清楚楚。只要把这些都明确地告诉群众，群众是完全能够理解的。

毛泽东同志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曾经生动地说：“报纸工作人员为了教育群众，首先要向群众学习。同志们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往往不懂事，对于实际事物往往没有经历，或者经历很少。你们对于一九三三年制订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小册子，就看不大懂；这一点，农民比你们强，只要给他们一说就都懂得了。”^①农村阶级分析问题中包含着许多复杂的政策问题，但是农民群众很容易理解，这是因为党关于农村阶级分析的各项规定都是切合实际的。我们党的任何政策中所包含的内容，不管多么复杂，都不是虚构出来的，都是来自实际生活的实

^①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20页。



际经验的总结；凡是在我们政策中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内容，都应该使群众知道。如果以为群众只能懂得政策中的这一方面，而不能懂得政策中的那一方面，只能接受这一方面，而不能接受那一方面，那无疑是错误的。事实恰恰相反，如果不全面地交代党的政策，那就会引起群众的怀疑，当然也会把群众的行动引导到不正确的方向去。

党的政策是群众的实践的总结，是群众中正确意见的概括和提高，它不是从群众的经验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党在一切工作中都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人民群众要在自己的事业中取得胜利，绝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党把群众的智慧、经验，集中起来，形成政策，再交给群众，使政策为群众所掌握，这正是党的领导的一个具体表现。

就一方面说来，党的政策是群众所能够理解的。就另一方面说来，群众要完全懂得党的政策，又往往需要经过一个过程。这是群众的觉悟程度逐步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干部进行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把党的政策原原本本地交给群众，并且通过实践使群众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党的政策的正确性，群众就能够纠正由于经验的局限而产生的某些片面的错误和认识，他们的觉悟程度也就逐步提高。无数的经验证明，党的政策向群众交代得越清楚，群众的觉悟程度就越能提高，他们在工作中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就能够发挥得越充分。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群众的觉悟水平提高到党的政策的水平，使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实际行动。群众中通常总是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有些人对党的政策接受比较快，有的则比较慢。我们在工作中要善于发现积极分子，并通过积极分子去带动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群众。对于积极分子，也需要不断地提高他们的觉悟。在



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群众的觉悟水平出发来进行工作。当群众对党的政策还不很了解的时候，必须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善于等待群众提高觉悟，切不可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强迫群众行动，而成为命令主义。当然，同时也要善于区别群众中的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切不可迁就错误的意见，而成为尾巴主义。毛泽东同志说：“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①我们每一个干部，都要力求很好地掌握这项领导艺术。

我们的党通过各级干部而同广大群众联系。各级干部正确地理解党的政策，坚决地在工作中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并且使党的政策为群众所掌握，同群众一起执行党的政策，这样，就使党同群众密切地相互联系在一起，我们的事业就能够无往而不胜利。

很明显，如果以为只要干部懂得政策，而不需要让群众也懂得政策，是错误的。毛泽东同志曾经对一些不能贯彻群众路线的同志提出批评说：“他们做一件事情，总不愿意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他们主观上也要大家动手动脚去做，但是不让大家知道要做的是怎么一回事，应当怎样做法，这样，大家怎么能动起来，事情怎么能够办好？”^②

我们的多数干部具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作风，总是反复地把党的政策向群众交代，遇事同群众商量。这样，他们就能够使群众自觉地投入工作，并且在工作中想出许多好主意，拿

^{①②}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19页。



出许多好办法。在党的政策的指导下，群众的力量和干部的力量拧成一股劲，工作就进行得顺利，事情就能够办好。事实证明，这样做，也是干部提高自己的政策水平和保证自己在工作中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的一个方法。

为了要把党的政策全面地、清楚地交代给群众，首先就需要干部自己能够深刻了解党的政策。如果干部自己还不理解政策，当然不可能做到把政策正确地交给群众。教育者自己首先要受教育。当我们还不能把某一个道理使群众清清楚楚地理解的时候，有些人以为这是群众的理解能力低的缘故，但虚心的人能由此看出，其实是我们自己还理解得不透彻，因而没有把道理说清楚。教育别人的过程往往同时就是教育自己的过程，帮助群众逐步深入理解党的政策的过程，往往同时就是干部自己逐步深入理解党的政策的过程。也有这样的情况，干部由于缺乏群众所具有的某些方面的实际经验，对党的某项政策一时还不能有深透的理解，而群众由于有某些方面的经验，却对党的某项政策理解得比干部更深切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在把党的政策交代给群众的时候，更加需要向群众学习。

我们的多数干部在工作中总是同群众打成一片，主动地把自己的工作放在群众的监督下面。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就便于群众根据党的政策来监督自己的工作。我们每天处理许多事情，有些对我们说来还是新的事情，我们对党的政策的认识和掌握的能力，也要经过实践才能逐步提高，因此，工作中产生一些缺点、错误，是难免的。群众的监督，可以帮助我们避免缺点、错误，或者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群众明白了党的政策，就能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



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① 我们的干部在工作中有了缺点或错误的时候，就要采取向人民负责的态度，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并且把政策原原本本、不折不扣地交给群众，虚心倾听群众的批评和意见，和群众一道来克服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这样，群众的积极性就会更加高涨，工作就会出现新的局面，而干部对政策的认识和掌握的能力也就会随着提高。

至于如何根据具体情况来正确执行党的政策，那就更需要同群众商量了。党中央规定的统一的政策，各个地区、各个公社以至各个生产队都必须执行。但是，由于各个地区、各个公社、各个生产队各有不同的情况，要有效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还必须从具体地区的具体情况出发，采取切合情况的方针、步骤和方法。干部如果不同群众商量，不了解实际情况，主观地出些主意，往往是行不通的。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认真地同群众商量，这样就能使党的政策得到贯彻执行。

党的政策本身也是通过群众的实践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毛泽东同志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

^①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28页。



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① 把政策交给群众，率领群众一起来贯彻党的政策，通过群众的实践来考验和丰富党的政策，这是毛泽东同志一向提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方法。我们党在以往的任何时期都是这样做的，今后我们也永远要这样做。

原载 1961 年 1 月 16 日《红旗》1961 年第 2 期，署名施东向。

^①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899 页。



在学术研究中坚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中,提出问题,发表不同意见,进行自由讨论的风气有了发展,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在各种问题上进行的讨论,有些比较深入,有些还只是初步接触;讨论的结果,有些已经取得了结论,有些还未能达到结论。不管怎样,在任何一个学科中,有了争论,有了相互交换意见,相互批评,就有了活跃的空气。这种活跃的空气对于科学的发展,对于科学工作者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对于青年一代的科学工作者的成长,是极为有益的,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党坚持在学术和文艺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在说明这个方针时曾指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① 无数的事实证明,为了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3—784页。



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就必须实行这样的方针,而决不能实行与此相反的方针。

科学的任务是探求客观真理,真理是有客观标准的。有许多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否认真理的客观性,照他们看来,真理是因人而异的,只要“言之成理”,就算真理。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认为,科学上的是非不决定于主观上是否“言之成理”,而决定于是否符合于实际。在任何一个科学问题上,不能同时有几个客观真理,而只有一个客观真理。但同时,我们又认为,使我们的主观认识达到客观真理,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的,而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当客观的科学真理还没有为我们掌握的时候,就必须容许人们从各种不同方面经过各个不同途径进行探索,进行各种不同的试验,提出各种不同的假说,并且进行自由争论。这样,我们就能够一步步地接近客观真理。我们主张在学术上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基本上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的。

科学工作不能只是复述前人已经达到的成绩,重要的是要在接受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经过独立的工作,解决前人所未有解决或者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进入前人所未有进入或者没有完全征服的领域。在解决新的问题和征服新的领域的过程中,难免要经过曲折迂回的道路,错误也是可能发生的。如果因为怕犯错误而不敢接触新的问题和新的领域,就不会有创造性的科学工作。在科学的发展中,会不断地遇到新的问题;不应当认为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都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而要勇敢地向新的领域探索,容许人们由于进行新的探索而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同时,我们的科学工作当然也不应当停滞在还不成熟,还不是完全正确的、以至错误的意见上,而要造成一种条件,使正确的意见能够起而代替错误的意见,使完备的结论能够起而代替比较不完备的结论。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就是符合于这样的要求的。

在科学研究中,对于比较复杂的对象,为了求得完全的认识,往往需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去处理。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整体,整个社会也是一个整体。对自然界的整体和社会的整体中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分别进行研究,就有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各个学科。如果不是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我们就不可能对自然界和社会得到完整的知识。在不同学科之间,当然不应当尊此贱彼,互相排斥,而应当互相支持,共同发展。在社会主义的有计划进行的科学事业中,应当使所有的学科的研究工作都有适当的安排。在对自然和社会的研究中,有些同当前的物质生产和社会主义事业较少或很少直接联系的学科,被人认为冷门;但只要它们对于作为整体的自然和社会的研究也从某一个方面有所贡献,那么在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安排中也应当有它们的适当的地位。这也是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的要求。从不同的学科的研究出发,对于共同有关的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进行讨论,也是必要的。这种讨论对于从事这些不同学科的人说来,都有扩大眼界的作用。通过这种讨论,可以互相吸收正确的意见,取长补短,可以使由于某一学科的局部范围而有时难免形成的某种片面性得到克服,并且使问题得到比较全面的解决。

在同一学科中的不同学派,一般说来,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在不同学派之间,有的学派是正确的或基本上是正确的,而别的学派是错误的或基本上是错误的。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学派和唯心主义学派的对立就是正确和错误的对立。在这种不同学派之间,应当通过自由讨论和科学实验来辨明谁是谁非。站在正确方面的学派应当在同错误作斗争中克服错误的主张,发展正确的主张,也要吸取对方所提供的某些有用的思想材料。另一种情形是,不同的



学派分别在不同的条件下,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同一的对象,在它们之间,并不是正确和错误的对立,它们在不同方面对于探求真理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医和西医的区别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这种情形。它们在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的同时,也可能各有某种片面性和缺陷。它们之间,在个别问题上也会有是非的争论,但总的说来,这种性质的不同学派完全可以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在科学史上,这种性质的不同学派发展的结果,并不是这一个学派克服了那一个学派,而是在各个学派所提出的积极贡献的基础上,使科学的发展进入更高的阶段。

在资产阶级学术界中,“门户之见”不但存在于各个学派之间,而且往往还存在于各个学科之间。某一学科的研究本来只是以自然现象中的某一方面、某一部门为对象,但有些研究者却竭力夸大这一学科的重要性,企图使其他学科服从这一学科,自以为这一学科的研究成果已经可以解答自然界的全部奥秘。从这种不切实际的夸大中只能得到荒谬的结论。某一学派本来只是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对它的研究对象做了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结论,但如果企图垄断这一方面的研究,不准别人从其他方面、其他角度进行研究,不承认别人的研究也有自己的贡献,那就不仅是不利于这门科学的发展,也会不利于这一学派的发展。资产阶级的错误的唯心主义的哲学、社会学的学派或其他坚持错误主张的学派取得了垄断地位,那就更加是有害于科学的发展了。我们所要执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同这种资产阶级学术界中的反科学的“门户之见”相对立的。

我们科学工作的目的不仅在于认识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有正确有错误,有深有浅。在改造客观事物的实践中所采取的方法也有正确有错误,有好有差。在如何改造客观世



界的问题上,特别表现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当然,只有在科学地认识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在实践中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也常有这种情形,为了达到预期的某一目的,可以采用这样的方法,也可以采用那样的方法。两种或更多种的方法虽然都有某种客观规律性的依据,但是其中的一种方法,因为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性的更深的认识的基础上,因为是更充分地利用了有关的各种客观规律性,所以比别的方法更好更有利。在科学技术上常常可以遇到这种情形,在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问题上也有这种情形。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就是为了更好地利用科学的力量来改进我们的实践,不让我们的实践停滞在已经达到的水平上面。

以上这些都表明,在我们的科学事业中,应当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广阔的天地。如果以为承认客观真理就不能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显然是错误的。

由此也可见,我们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我们的各门科学研究中都起着指导作用,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不应当和不需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马克思列宁主义使哲学、社会科学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在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域内,人们如果不是自觉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那就几乎不可能真正解决任何一个实质性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正确性也在自然现象的科学中得到证明。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领域内,研究者如果能够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也一定能够大大地促进自己的工作。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各门科学中的这种指导作用的人,在我们的学术界中已经一天天更多了。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代替每一门具体科学的研



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作用，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基本理论和方法，依靠这种理论和方法，科学研究工作者还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大量地收集材料，独立地进行思考，才能在某一个具体问题的科学研究中得到成绩。恩格斯说得好：“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挥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①

因此，我们不能以为，只要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追求科学真理就是轻而易举的事，就不会经过曲折和艰难，就能保证不出任何差错，就不需要有任何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同时，我们也不能以为，简单地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原则，就能判断科学争论中的是非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科学性和高度革命性相结合的理论。必须联系具体实际，全面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才能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威力。如果任意摘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原则、个别语句，而不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就来判定什么意见对，什么意见错误，这种判断一定是靠不住的，而这样的做法往往只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一种片面性的东西。

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并不等于已经能够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人们要想熟练地掌握某种武器，就必须反复地使用它。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武器也是这样。研究具体科学问题，进行自由而充分的讨论，这就能够真正看出究竟是否已经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理论和方法彻底决裂，是否正确理解了马克思

^①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7页。



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是否在所研究的问题上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并且能够使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所以百家争鸣正是为学术界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提供了一种条件。有些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虽然在思想上经过自我改造,承认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但是一到具体的学术问题上,他们的旧的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立的观点又会流露出来。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有些争论,只是由于某些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理解和运用不正确而引起的,但是,就是这样的讨论,也是有意义的。在努力学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具体科学研究中去的过程中,发生差错是难免的,对于这种差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不能熟视无睹,但是这种差错同反对和有意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有区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任务不是简单地斥责这种差错,而是认真地进行讨论,有说服力的纠正这种或那种不正确的理解。

在政治上承认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一件事;在学术上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是另一件事。这两件事显然是互相有关的,但又并不就是同一件事。有这样的人,在政治上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在学术上仍然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例如,有这样的自然科学家,他们在学术理论上仍然受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束缚,看不到这种世界观同实际科学工作之间的矛盾,他们不知道,即使是不承认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科学家,如果能够在科学研究上真正做出成绩来,就不能不是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自发地倾向于唯物论,并且在某种程度内倾向于辩证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团结一切在政治上承认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的学术工作者,并且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同他们一起为我们的科学事业的发展而努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不否认和排斥一切还不能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科学家所作出的科学



成绩,而要通过自由的讨论来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于各个学科的研究工作所具有的指导意义。许多从旧社会来的学术工作者在政治上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已经有无可辩驳的鲜明事实说服了他们;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学术上真正确立指导地位,就必须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学术上做更多的工作,在学术的讨论和批评中起积极的作用。

在我们的社会中,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不但在学术问题上,而且在政治上,企图用资产阶级的理论和方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理论和方法的人当然还是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固然也会被他们所利用,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不因此而害怕实行这个方针。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①

毛泽东同志在说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时还说:“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②

由此可见,对我们说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社会主义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86页。

② 同上书,第787—788页。



社会中的科学事业的一个积极的方针，是不断地巩固和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学术界中的领导地位的一个方针，是充分表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性的一个方针。我们的学术界应当继续贯彻执行这种方针，共同为我国的科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而努力。

本文是 1961 年 3 月 1 日《红旗》杂志 1961 年第 5 期的社论。



调查研究是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

整整 20 年前,在 1941 年 5 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篇报告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文献。

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说:

“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外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①

这种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是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内一贯倡导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报告对于把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801 页。



这种作风普及于全党起了巨大的作用。

20年前,在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中,曾经存在过一种坏的作风,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主观主义的作风。这种作风表现在研究工作上,就是“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这种作风表现在实际工作上,就是“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这是完全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针对这种坏的作风,当时毛泽东同志反复指出,必须认真注意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这样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这样才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和作风。

我们党的历史证明,当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领导着全党的时候,我们党的事业就能够发展,革命就能够取得胜利。我们在任何一项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中,都应当采取从实际出发的态度,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态度。个人的能力虽然有大有小,但只要不沾染上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作风,只要勤勤恳恳地注意研究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就能够在研究工作或实际工作中得到积极的成果。反之,如果只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那就必然一事无成。这也是为无数的事实所证明的了。

—

人们的思想必须符合于客观的实际,一切原则、原理必须在研究客观存在的事实之后才能得到,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关于这点,恩格斯曾经很明白地说:“原则不是研究



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的观点”^①。

恩格斯说这段话是为了批驳一个德国哲学家杜林的错误观点。照杜林说来,哲学包含着一些最高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纯粹是从主观思维中来的,而不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这些臆想的原则应当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而自然界和人类则应当适合于这些原则。

恩格斯的观点和杜林的观点针锋相对:一个是唯物主义的,一个是唯心主义的。

历史有许多唯心主义哲学家自以为“创造”了某种“伟大的体系”,其实他们不过是虚构出来了一些原则和公式,硬说这些原则和公式已经包罗尽世界上一切业已发生和还未发生的事情。而且照他们看来,既然他们的体系已经给一切问题准备下了现成的答案,所以别人和后人的任务就只是把这些原则和公式简单地安置到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上去罢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彻底摒弃这种唯心主义的创造体系的把戏。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根本上同这种唯心主义体系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是研究了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和社会历史,总结了人类历史的经验,特别是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并且综合了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成果,然后得到的。他们的理论是从客观实际中来的,他们也不准许别人从他们的理论中寻求对一切具体的实际问题的现成答案,把他们的理论当成呆板的公式简单地套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①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8页。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研究的历史材料,当然只可能是在他们当时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他们所掌握的自然科学的材料,也不能不受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但是深入地研究了这些材料,抓住了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中最本质的规律性,因而得出了普遍性的原理。这些普遍原理能够成为我们研究一切问题、进行一切工作的可靠的指南。这就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正确的原则,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这些原理的指导下研究新的实际,研究前人所没有解决过的新的问题,就不至于迷失方向,就有可能达到正确的结论。但是如果以为在解决具体问题和新的问题时,只要依靠普遍性的原理,用不着再花气力根据具体的材料进行具体的研究,那就是完全错误的了。

一切科学的概念和对事物的规律性认识,都是从对具体事物的反复考察和研究中取得的。人们考察和研究某一类事物,深入认识了它的内在的本质,抛弃了它的某些外在的、偶然的現象,这样才能获得对这类事物的科学的概念,把握这类事物的规律。一个科学概念的确立,一个客观规律的发现,标志着人们对某一类事物的认识过程的一个阶段。以后,人们要研究属于这类事物的任何现象,就可以而且必须利用这一科学概念和这种规律性的认识。例如,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发展历史的大量材料中得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概念,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样的规律。人们如果抛弃这些科学概念,背离这一规律,就不可能对于今天和今后的社会发展历史进行科学的研究,作出科学的说明。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某一类事物的科学概念和规律性的认识,并没有、也不可能把这一类事物在现象上的复杂多样性包罗无遗。科学概念和规律性的认识,因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



的反映，所以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也正因为如此，同现象比起来，它们是比较单纯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规律把握住静止的东西——因此，规律，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并且说：“现象比规律丰富”^①。举例说，任何社会的基本矛盾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在不同社会形态中，在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阶段中，显出的具体形态是十分复杂的。有时，这二者间基本上相互适应，有时则发生激烈的冲突；它们之间的相互适应和相互冲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又具有种种不同的具体形态；它们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受到社会上层建筑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等等。很明显，如果人们只是简单地套用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不去具体研究特定条件下、特定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那么就不但不能获得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而只会使自己的认识贫乏和简单化，并且在实际上使普遍性的原理变成枯燥的和僵死的东西。

所以，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不但一切普遍性的原理都是从客观实际中得来的，而且在用普遍性的原理做指导去解决具体问题时，也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因此也可看到，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建立他们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的时候，再三要使人注意他们的体系在性质上同唯心主义的体系根本不同。他们的体系不是提供人们一整套答复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提供了研究一切问题的科学的方法；不是要人们停止进行研究，而正是要人们开展真正科学的研究。恩格斯曾经十分尖锐地批评那些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研究方法而是当成公式的人。他说：“无论如何，对于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

^① 《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127页。



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①。

我们必须采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要求的这种态度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就是这种唯一正确的态度。

毛泽东同志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②

毛泽东同志曾着重论述了人类的认识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这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他强调指出,一般真理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东西,不是人们所不能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同时又指出,人们在认识了事物的共同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这是因为,客观事物是复杂多端、千变万化的,客观事物比一般原理要丰富得多。一切事物有它们的共同规律和本质,但同类事物中的每一个别事物又有它的特殊规律和本质。反映事物共同规律和本质的一般原理,没有也不可能把已有的和尚未发生的各种事物的一切特殊规律和本质完全反映出来,从而没有也不可能为人们提供出解决一切实际问题的具体方法。

① 《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2页。

②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6页。



这是一个极其明显的道理。例如，马克思主义从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的相互关系、阶级斗争实践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的阶级关系的深入的分析，发现了各个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得出了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我们掌握了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它去观察和解决社会问题，就不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所迷惑，就可以认清各个阶级的本质和它们之间发生的必然关系。但是，各个阶级社会、各个国家具体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情况是不同的。拿中国来说，中国有一切国家都具有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共同规律，又有它的特殊规律。只有对中国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和阶级斗争情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认识了它的特殊规律，认识了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联系，才能得出在中国处理阶级关系、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的具体政策和办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一般规律，是我们认识中国社会、解决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的许多问题的武器，但它不能代替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分析，更不能指出处理中国阶级关系的具体办法。对于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方针政策，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发展的总的情况和一般规律。但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阶级关系也各自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只有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才能规定出当时当地正确处理阶级关系的具体办法，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

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指出人们的认识发展的辩证规律时这样说：“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



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认识不致变成枯燥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①

二

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报告中,深刻地阐明了这个道理。他说:“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有情况的了解,然后才会有好的处理。”^② 这也就是说,不论做理论、学术的研究工作,还是做实际工作,都必须严格地遵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原则。

一切从实际出发,重视调查研究,这就是要尊重事实,对事实采取客观的、科学的态度;就是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了解事物,找出事物内部所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

^①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9—31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2页。



我们的调查研究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指导下进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指导我们透过事物的现象寻求事物的内部联系、事物的本质，根据事物发展中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过程，把握它的发展规律性，而获得科学的预见。因为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所以我们对待客观事物的态度和狭隘经验论者根本不同。狭隘经验论者只是匍匐在个别的、片断的现象材料面前，在尊重事实的名义下把自己和别人的眼界限制在极其狭窄的范围内，因而只能得到某种同客观事实不相符合的、片面的主张。

只要正确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任何情形下，都不会发生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同事实不相符合的问题。有人觉得，有时好像会发生这样的情形：照理论上说来，应当是如此，而事实上却偏不是如此。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是最概括也是最全面性的理论，它不允许把它的任何一个原则理解为片面性的、僵化的“条令”；它充分估计到任何一个原则表现在客观事实上，同错综复杂的多方面条件相结合就会呈现无限的多样性。例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出发点。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原理不但不排斥，而且确认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并且认为社会意识、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时候、一定条件下，甚至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具体考察社会生活的发展时，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就在于使我们如实地考察社会生活的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而又不至于为这种多样性所迷惑，以致看不到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任何情形下都不会要求我们否认这个或那个事实，而只是帮助我们科学地了解这些事实，并



从客观事实中得出应有的结论。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个别问题上的结论是可以改变的。由于条件的改变，形势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原来适合于客观情况的个别的原则和结论要被新的原则和结论所代替。但是作为我们的研究工作的指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理并没有改变，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于这一社会发展条件得到了这一结论，而运用于另一社会发展条件得到了另一个结论。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看成脱离实际的片面性的东西，就会导致否认和抹杀某些事实，同样也会导致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者、形而上学者以及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修正主义者，都常常首先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提出他们所谓的某些事实材料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以为，他们举出的这些事实材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无法解释，只好回避的。其实，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回避任何事实，而是对于任何事实力求给以科学的说明。唯心主义者、形而上学者和修正主义者，如果不是捏造事实，也只是把某些在发展过程中的片断的非本质的事实材料加以夸张，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罢了。老的修正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都是用这种伎俩装出一种很“客观”，很“注重实际”的模样，利用某些眼前事变，某种细小的政治变动，企图迷惑视听，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理，而为资产阶级效劳。

我们进行调查研究的，总是抱有一定目的的。事先抱着一定的目的，是否会妨碍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客观事实呢？

如果人们预先抱着一种主观臆想的、或者歪曲事实的成见，进行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替自己的这种成见找“证据”，这样的目的当然只会产生主观主义的态度，使人不能如实地、全面地考察客观事实。这种目的是同客观的、科学的态度相对立的。但是



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调查研究不需要抱有任何目的。我们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我们不是为调查而调查，调查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因为有了要解决的问题，才去调查研究。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发现其中的规律性，是为了使我们的行动有正确的向导，使我们能够在实践中有效地推动事物的发展。在革命中，我们的调查研究是为了促进革命事业；在建设中，我们的调查研究是为了促进建设事业。这样的目的本身就是从客观实际的发展中提出来的。抱着这样的目的去调查研究，不但不妨害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客观事实，而且是进行客观的、科学的研究的必要前提。

科学地认识客观事物是要花苦功的。要搜集大量的材料，看到事物的各方面的联系，既看到这一方面，又看到那一方面；要不为任何假象所欺蒙，一定要揭开假象，揭露事实的本来面目；要不为任何根据某些个别材料所已经达到的判断和结论所束缚，如果出现了新的材料、新的实践，就要舍弃或修改那些不完全、不恰当的判断和结论，如此等等。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为了要达到符合于实际而有利于实践的结论，无非是因为一切不合乎实际的结论不能在实践中达到推动我们的工作、发展我们的事业的目的。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谈到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关系，谈到了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的结合。实际精神使革命气概得到充实的内容；只有科学地认识世界，才能有成效地改造世界。也正因为抱着改造世界的革命气概，才要一丝不苟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所以，把高度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科学性结合在一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调查研究工作的特征。



三

在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很多人注意了调查研究、掌握材料的工作，因而在研究工作上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至今在一些同志的研究工作中还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一种不良的作风。当一个问题摆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事实如何，而只是书本上所说的某一个定义。他们的研究工作，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定义出发。他们根据现成的定义来进行推论，所用的方法不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而只是演绎法。

毛泽东同志曾经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这样说：“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①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必须认真执行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

为什么从定义出发是一种不正确的方法呢？

任何科学的定义，同一切科学的抽象一样，都只能概括某一事物的主要内容，不可能把事物的全部内容包括进去。任何一个科学定义，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列宁在他的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驳斥了考茨基对于帝国主义所作的错误定义，并且指出，考茨基的错误定义是他全面离开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53页。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那整套思想体系的基础。针对考茨基等人的机会主义观点,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的科学定义。但是列宁又指出,他所提出的每一个定义都不是绝对的。他说:“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①但他随即又说,这样简短的定义虽然概括了主要的内容,但还不能使人特别明显地看出它所说明的那个现象的各个重要的特点。因此,他又给帝国主义下了包括帝国主义的五个主要特征的定义:“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全球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②可是即使这个定义,列宁也不认为是绝对完备的。他说:“如果不仅注意到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上述定义就限于这些概念),而且注意到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同一般资本主义相比所占的历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那么就可以而且应当给帝国主义另外下一个定义。”^③由此可见,我们固然必须排斥错误的、不能反映事物本质的定义,但是也不能死抱着某一个简单的科学定义,而以为一切尽在于此。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对各种概念提出定义的时候,都是以大量的事实材料为根据,都是结合着对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而决不是要求人们仅仅记住一个简单的定义。但是从定义出发进行研究工作的人,却往往是使这个定义变成了一个空洞的、死板的躯壳,因而在实际上是剥脱了这个定义所具有的科学意义。而且,

①②③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01页。



我们既然在进行研究工作，就绝不能仅仅限于知道某一已有的定义的内容，使自己的认识停留在原有定义的限度内。我们进行研究工作是要进一步深入地认识事物，是要认识新出现的事物。已有的科学定义能够给我们以帮助，但我们也只能把已有的定义当做进一步向具体事物进行探索的方法和基础。

从定义出发，是“省力”的方法，然而不可靠的方法。采取这种“省力”的方法的人，如果不是闭眼不看事实，一味进行概念的游戏，那也常常会因为无法把丰富的事实装进被他们的理解弄得狭隘的定义的框框里去而陷入混乱。

研究工作从实际出发是艰苦的事情，要付出辛勤的劳动。但舍此别无他法。

从实际出发，还不能说就一定会立刻得出科学的结论。有时，人们虽然搜集了丰富的实际材料，但还作不出完整的结论来。这或者是由于事实的发展还没有把所要处理的问题的本质的东西充分显露出来，或者是由于在研究工作上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客观的事实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也总是从比较不完全的认识逐步发展到比较完全的认识。因此，我们就要不断地注意新出现的事实材料，并且在已有的认识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调查研究工作的水平。总之，只要真正搜集了反映实际的材料，加以分析研究，而且继续不断地努力，总是有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报告中告诉我们，研究一个问题，既要研究它的现状，又要研究它的历史，要对它的正确的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如果只是随意地找一些个别的、片断的事实材料，就急忙得出结论，形成观点，那是靠不住的。如果只是用个别的事实材料，去适合从别人那里搬来的、没



有经过自己消化的、或者自己凭空设想出来的观点和结论，那也同科学的研究毫不相干。列宁曾这样说：“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那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①

我们说要掌握事实的总和，并不是说，在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不着边际地去搜罗过多的材料；更不是说，在说明问题时，要把一切在研究过程中接触到的材料都罗列出来。为了研究一个问题，必须占有和问题的各个侧面有关的足够的大量材料，而且往往难免要接触到一些在经过研究以后看来是不必要的材料。不经过对大量的有关材料的研究，就无法形成正确的观点，也无法选择能够说明问题的典型材料。经过认真的科学研究，就能对材料有所取舍，从而用必要的典型材料来论证所要说明的观点。这是材料和观点的辩证统一：材料形成观点，观点又统率材料。只有一大堆材料而没有形成明确的观点，或者只有观点而没有能够说明观点的必要材料，都不能正确地说明问题和解决问题。

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这个具有伟大意义的报告的根本精神，就是要我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

^① 《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364页。



实际运动结合起来，要我们时刻注意克服理论和实际相脱离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报告和其他许多著作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强调地指出，要做到这点，必须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进行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掌握丰富的、详细的实际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研究。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为了做好我们的一切实际工作，为了加强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实行这个方法。

原载 1961 年 5 月 1 日《红旗》1961 年第 9、10 期，署名施东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绳全书 第二卷/胡绳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

ISBN 7-01-002573-8

I. 胡…

I. 胡…

Ⅲ. 近代史-中国

IV. K25

胡 绳 全 书

HU SHENG QUAN SHU

第 二 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1/32 印张:13.75

字数:313千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01-002573-8/Z·85 定价:25.00元